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主编 傅殷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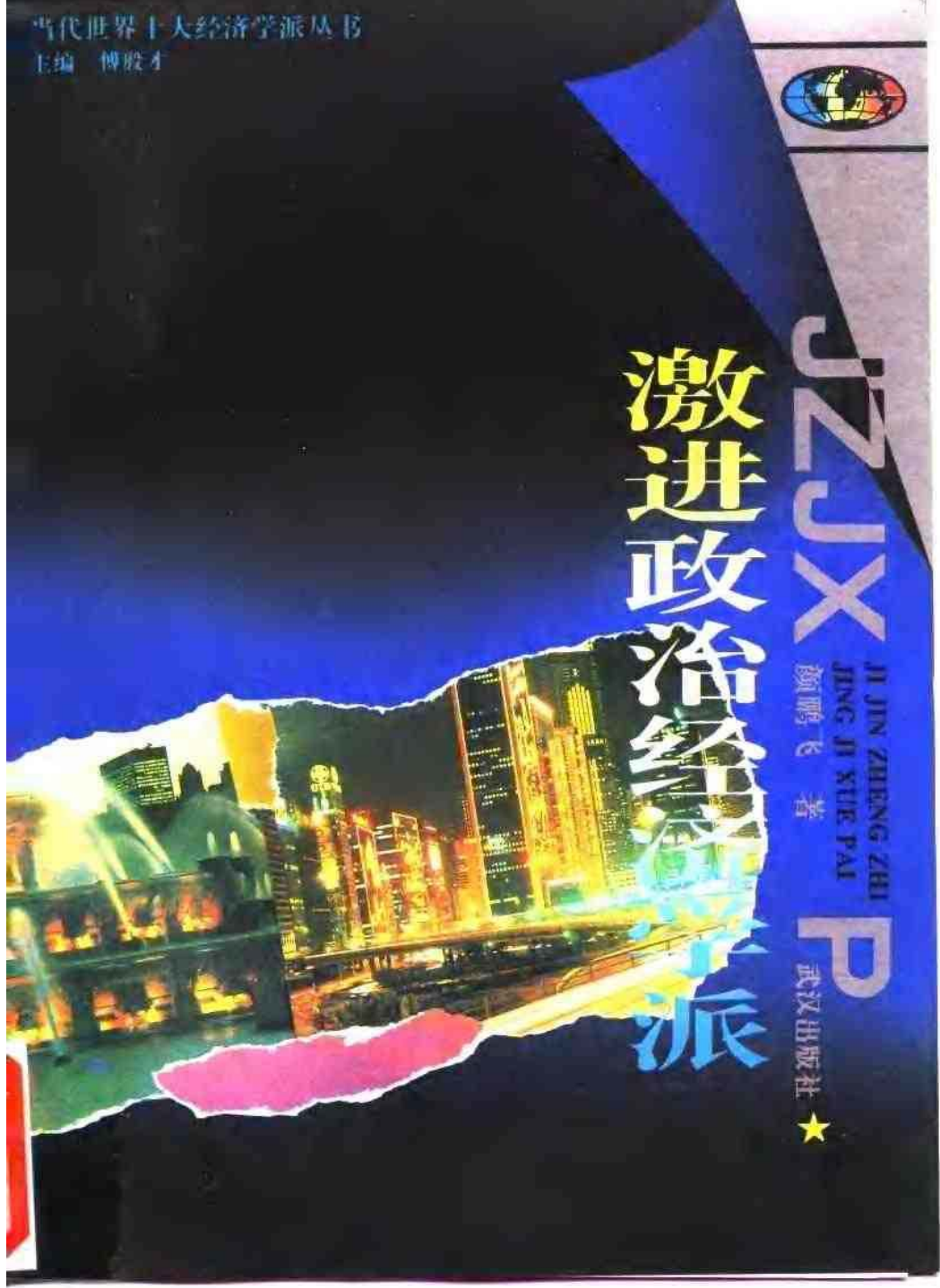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JZJX

JIN JIN ZHENG ZHI
JING JI XUE PAI
颜鹏飞 著

P

武汉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

JZJXP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颜鹏飞 著

(鄂)新登字 0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傅殷才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2

ISBN 7-5430-1466-1/F·162

I. 当… II. 傅… III. 经济学派—世界—丛书—当代

IV. F09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774 号
.....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傅鹏飞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5 插页 字数 194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98.00 元(全套十册)

ISBN7-5430-1466-1/F·162

SJXP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

顾 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涤源 陈岱孙 宋则行

宋承先 胡代光 张培刚

陶大镛 高鸿业 谭崇台

主 编 傅殷才

副主编 刘 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冰 方兴起 尹伯成

文建东 王 健 华桂宏

刘 凡 吴易凤 杨玉生

梁小民 傅殷才 谭力文

颜鹏飞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SJXP

主编 傅股才

凯恩斯学派
制度经济学派
瑞典学派
货币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
供给学派
伦敦学派
弗莱堡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总序

傅 殷 才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通篇贯穿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我国发展的光辉前景,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纲领。这套《丛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我们希望它能开拓读者的眼界,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加强管理经济的能力,以期促进这一宏伟纲领的实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议》中关于 15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提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这套《丛书》正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各家各派中,着重介绍和评论它们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供参考、借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当前,在世界各国,学派林立,“新”论点、“新”学说不断出

现。各种思潮、各个学派和各个学说之间,各思潮各学派内部,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分歧。乍看起来,简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似乎是许多概念、理论、学派和思潮杂乱相处,极为混乱,没有什么规律性。实际上,当代世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在其发展中有一定的规律性,有其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它们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上各资本集团的利益和矛盾。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学派中,根据它们对待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自由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我们这套丛书的头三册,说的是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和瑞典学派,它们属于自由派,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缺陷和矛盾,主张修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传统教义,认为市场机制已经失灵,只有借助于国家积极调节社会经济过程,才能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接着的六册,讲的是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它们属于保守派,继续坚持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把资本主义看作能够自行调节的“最理想”的制度,主张自由经营,否定国家干预经济。最后一册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它站在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立场上,厌恶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批判传统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大多推崇马克思主义;它既抨击自由派关于国家调节可以拯救资本主义的说教,也批评保守派关于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但是,它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窠臼。

在当代世界的经济学派中,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自由经营和国家干预两大经济思潮。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时而是这种思潮占统治,时而又是一种思潮占上风。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两大思潮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论争,都标榜自己,攻击对方,真是难解难分。一般说来,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自由派鼓吹国家干预论,保守派宣扬自由经营论。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自然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必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不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那就太简单化了。因此,在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的理论中,每一派都或多或少论述了市场经济或国家干预。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知道有哪些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理论或模式,有哪些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的理论或模式,有哪些既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主张国家调节的“混合经济”理论或模式。

既然学派很多,模式不少,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们呢?

从理论本质来看,这十大学派(除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有所不同)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宣扬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个人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有效率的”、“协调的”、“永恒的”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些“缺陷”或“弊病”,却是可以“纠正”和“医治”的;它们以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们都只是在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联系上兜圈子,而不研究其内在规律及其实质;它们都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把供求论、生产三要素论、阶级调和论等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在所有这些基本问题上,不管什么学派,无论是自由经营思潮,还是国家干预思潮,是没有分歧或基本上没有分歧的。我们对这些基本理论应当揭露和批判,那种对之顶礼膜拜、全盘

接受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从实际的专门研究来看,不管什么学派,无论是主张自由经营的思潮,还是信奉国家干预的思潮,为了替垄断资本家谋取最大限度利润,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的有关问题,反映经济过程中某些具体的、局部的规律性。例如,自由经营思潮中有某些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国家干预思潮中有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某些经验。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提出的某些经济政策主张,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程度不同地带有某种合理性或科学性。它们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了较详尽的描述,作了数量的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所有这些,都凝结着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利用这些科学的、合理的部分,不能简单地视为引进资本主义,看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明确指出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1992年1月在南方考察期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澄清了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顾虑,为我们大胆引进外国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

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理论,多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撰写《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就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是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专家、学者对其学术专著通俗化阐释的一次尝试,其目的是使广大读者易于了解繁杂的西方经济学,并使之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武汉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之际,慷慨应允并积极组织出版这么一套有价值的丛书,是十分有眼光的。这套丛书的问世,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特别是刘凡主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10月8日

于武汉大学

第一章 激进政治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思潮历来就有激进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派别。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化,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正统派经济学(辅之以保守派经济学)构成了主流(Mainstream)或权势(Establishment)经济学的主体。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包含着正统经济学的否定因素、变革因素,以及新经济学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构成为新旧西方经济学相互转化的过渡点或枢纽点,因此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节 定义、研究范围和基本特征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又称持异见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sent),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的总称。“激进”一词,最初视为与“自由”、“保守”相匹配的政治术语,具有追根究底、反传统、要求改革的涵义。而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现行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力图改变新古典经济学

和新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这种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极力主张改造现行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阿佩尔鲍姆,就把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乃至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都划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持异见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麦克法莱恩,则把18、19世纪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霍吉斯金(1787—1869年)、汤普森(1785—1833年)、西斯蒙第(1773—1842年)、凡勃伦(1857—1929年)、乔治(1839—1897年)等人视为西方早期激进经济学家。

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说明: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对立和转化是经济学说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

在一部分西方文献中,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在于:它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尔曼所持的理由则是激进派有共同的理论渊源或思想传统:“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包括三个或四个老的传统:第一,有古典的传统,其中重视大卫·李嘉图和新李嘉图的传统,尤其是皮罗·斯拉法的著作。第二,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它作为一种有力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第三,有左派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作家,如琼·罗宾逊的传统。第四,激进范例受索尔斯坦·凡勃伦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影响。所有这些传统都在某种程度上汇集在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里,体现在不同作家的不同著作里,程度各有

不同。”^①

持类似观点的有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在他看来,激进政治经济学可以有多样化的研究途径,其中包括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和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等四种主要的研究方式。而麦克法莱恩则把新剑桥学派视为广义激进经济学派中最重要的成员,并力图证明它既区别于正统经济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拒绝把新剑桥学派划入激进派阵营,尽管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如边际生产率分配论)进行强有力的批判。

狭义的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60年代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这一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尖锐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其中大多数人物还抨击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极力主张改造现行制度甚或向社会主义过渡。西方经济学文献大多认为,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并无根本性区别,因此,往往称之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主义”,有的称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用以区别“官方”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新左派运动”是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直接根源。这一学派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60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成员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

^① 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页。

张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间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左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经 70、80 年代的冷遇期之后,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又出现再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一整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激进政治经济学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西德,日本等国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学派或组织,例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日本学派,以及一系列出版物,其中包括著名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社会主义评论》、《新左派评论》、《资本和阶级》和《政治学和社会》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下定义并非易事。因为除了共同的批评对象之外,它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往往侧重于对其某些特征或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描述和概括。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在著名论文《美国激进经济学:1970 年概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确定激进经济学干些什么,较之确定什么是激进经济学要容易得多”。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鲍尔斯和爱德华兹主编了二卷本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90 年),实际上是论文集。他们围绕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或争论焦点——经济学说中的激进范式、劳动过程、家庭、增长和不稳定性、帝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史——收入一批有代表性的论文。并且在该书前言中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了下述概括: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方法的相对一致的学术团体,其研究方法既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又区别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

而弥补了这二者的缺陷。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科书《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指出：激进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的一种多方位的研究，其强调的研究重点系收入分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学（并非静力学）性质、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利用一类经济问题。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87年）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则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流派，它既没有形成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赞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突出了有关阶级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课题。对于从经济学史到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问题，都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这一角度进行了重新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承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又用现代的激进世界观，重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亦即重建与马克思主义并存而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非教条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很难给激进政治经济学下一个精确的完备的定义。

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乃至庞杂，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也有一定的侧重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和老左派那里吸收营养，他们基本赞同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阶级和阶级冲突、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矛盾等基本原理；同时也有选择地运用正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模型，并得出十分激进的结论。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弊端、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有的还提出了用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口号。

美国学者雷蒙德·富兰克林和威廉·泰伯对这一时期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作了详尽的描述和概括。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

1. 社会结构变迁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结构是会变化的,并力图构筑社会变迁的理论基础。他们把垄断资本主义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分散式的计划,公有制,不再为追求利润而生产,并且实行真正公平意义上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既不把他们的理论视为终结,也不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致力于探寻理论的实质性变化或者阻碍这种变化的障碍。而正统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自由主义主流派经济学家)则欣然接受现存制度的约束,并致力于其辩护理论的精巧化。

2. 中央集权计划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批判了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计划观。后者认为计划导致独裁和不民主。前者认为出于个人利益目标,资本主义企业计划具有等级性、自发性和某种非计划的不自觉性,而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公共计划大大提高了计划在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和公共管理范围。但是,他们害怕中央集权式计划,不管这种计划的制定者是大企业、工资管理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是计划委员会,并大力主张分权式计划。

3. 政治和私人的经济权力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强调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与他们的经济权力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政府一般避免直接的干预,而是间接地影响或推进物质利益和经济权力的集中。

4. 收入和财富分配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用大量数字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相联系,并且阻碍经济制度认识和纠正自身缺陷的能力,影响政府的政治价值取向、目标和政策。正统派经济学家不能理解这一制度缺陷的真正含义——它是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自然产物;不了解政治权力与经济集中的关系,而是归咎于议会里缺乏“明智之士”或“坏”总统做“错事”,因此激进派认为正统经济学这种所谓“纯经济学”是“贫乏”的社会科学。

5. 群众参与

群众参与决策、平等分享社会收入和财富,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刻意追求的目标。与此相关连,这种社会观强调集体主义,以及经济激励中的道德因素和团结原则。与主流派经济学鼓吹的私有制和个人利益动机相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生产中的集体主义倾向有利于人类发展。他们还否认正统派经济学的“效率”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歪曲为只有在纯粹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才成立,并把劳动激励归结为必需品占有上的不平等。认为“效率”在“好”社会里应有比经济意义更多的含义,至少应表明劳动者通过劳动过程而完成自我实现;而主流经济学只简单

地归结为狭隘的经济利益刺激,因而缺乏对人类社会独特的情感和价值的分析。既没有认识到人的真实潜能,也缺乏对经济问题的社会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牺牲人类的联系,从而使人的本质堕落和异化为代价,甚至把人变成“一维化的动物(One-Dimensional Creature)”。

此外,帝国主义,市场结构和分层,城市问题,消费和 GNP 狂热,通货膨胀问题,以及价值、价格和工资的关系,种族和性别歧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和实质等问题,也是激进派涉猎的特定领域。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已发展成为有某种一致性的团体,其研究范围、主题或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激进派全面地系统地批判正统经济学,拓宽了研究范围。

这一时期全面系统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鸿篇巨著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克·林德撰写的《反萨缪尔森论》(1974 年),“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87 年)和英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1989 年),则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系统阐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教科书。这三本代表作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在某些方面还超出主流派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反萨缪尔森论》几乎逐章逐节逐段地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折衷主义代表作《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首先阐述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四大思想来源,它与正统派经济学的 11 点区别,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 10 点分歧,其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剖析,内容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与不平等,即价值与分配理论;资本主义的运行,即歧视、异化

与污染问题；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失业危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最后还阐述了前苏联、东欧传统的经济体制，并提出关于可行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的构想。《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的涉猎范围包括：劳动（劳动过程、劳动市场）理论，竞争、抗衡和厂商理论（涉及公司资本主义），价值、价格、工资和利润理论（涉及斯拉法经济学和收入分配论），国家政治经济学（涉及福利国家问题），失业、增长和失衡理论（涉及通货膨胀、投资、技术变革、不平衡增长、中心和外围等问题）。

索耶还把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概括为六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强调社会权力结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组合等等，是该社会经济得以运行的重要因素，即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必须考虑该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质，其中包括制度组合、法律结构等因素，以及各个个人或组织的信仰和观点。以下五个主题分别是剩余增长和发展、社会阶级分析、收入问题、权力等问题。与此相联系，贯穿全书的另一个重大主题是关于国家、市场与企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激进政治经济学在涉猎范围、研究重点和理论取向上的第二个变化，是明显显露出“重新研究”（Research）、“重新思考”（Rethinking）和“重新塑造”（Reshaping）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立化倾向。他们中间一些人因而强调其与流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的”、“传统的”或“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谢尔曼对此作了概括：

（1）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运动的一套通行法则，它们表明每一件事是怎样发生变化，相互作用和发展的。

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辩证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就关于社会中的变化以及社会中的冲突提出某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在这里,社会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2)在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经济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思想仅仅是经济的反映。激进主义者认为思想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再则,经济本身被看作是人的关系和冲突的场所,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力量。

(3)官方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把劳动价值论看作是商品交换(包括劳动力的交换)的一套法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能加以接受,而不能进一步探讨。激进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陈述是可以改进的,他们认为该理论主要是提出了一套人的关系,而不是商品间的技术经济关系。

(4)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种族和性别问题仅仅看作是从属于基本的阶级理论的。激进主义者把阶级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他们把种族和性别问题看得与阶级同等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要比阶级更重要。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断言,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社会主义会自动消失,而激进经济学则认为,社会主义为反对那些邪恶奠定了一个更好的基础,但必须进行持续的斗争。

(5)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认为,政府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政府在美国代表资本家,而在苏联则代表工人。鉴于苏联的工人支配他们的政府,那么这就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相反,激进主义者认为,在美国的政府里,充满着各阶级的斗争,当然,通常是资本家阶级占统治地位(但常常分为许多敌对的派别)。重要的不仅是阶级结构,而且还有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缺少民主的政治机制,那么苏联就只能是对人民的专政,或者说是劳动者阶级(如果愿意用这样的说法)的专政。

(6)官方马克思主义把现行的所有主要社会都归为两类,即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激进主义者发现,苏联类型的社会是属于另一类,谢尔曼称之为中央集权主义。

(7)传统的或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劳动价值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不愿意把其社会理论与世界的其他实际问题放在一起,因此,他们否认垄断的存在,而像新古典主义者那样,认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认为美国经济中充满着垄断。

(8)同样,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者都承认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也就不会导致周期性失业。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固守关于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绝对规律的刻板概念(低于零以下还能持续下降多少呢?),用它来解释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激进主义者承认生产利润方面的问题,但也承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利润实现方面的问题。

(9)官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激进主义者相信,中央计划必须与市场一起实行,而同时由工人来控制企业。

(10)官方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件事从来都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解决争论。激进主义者推崇权威,总是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每一个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思考或重构,以及对所谓“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含有某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诸如重视市场作用),但是在许多方面(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背离或曲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80年代末至9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研究范围和重点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内部仍然普遍,例如是否抛弃简化主义(Reductionism)而崇尚非简化主义的激进分析,正统派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能否有选择地置于激进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以及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等。而价值和分配理论、剥削、帝国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仍然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积累和危机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其中包括中心—外围理论)。

其次,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的探讨和论战,格外引人注目。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一是前苏联、东欧等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威廉暨玛丽学院的布鲁斯·罗伯茨和汉普顿大学的苏珊·法勒尔在他们主编的《激进经济学》(1992年)一书“导言”中强调指出:“一个共同的任务置于所有激进派成员的议事日程之上,尽管学术界内外争议纷纭,但都而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好吧!假若你不要资本主义,也不想简单地赞成国家所有制或中央计划体制,那么你到底想用什么来代替呢?因此,关于界定和构筑与激进价值相符的体制这一类的实际的策略性问题,将引起激进派普遍的关注。”^①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论战有80、9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多次论战,以及1993年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讨论”。而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社会主义、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

^① 罗伯茨和法勒尔主编:《激进经济学》,第13页,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2年版。

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改造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在诸多社会主义模式或方案中则较具代表性。

一般而言,广义的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是对正统派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当然这并不否认其中绝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是改良主义者,并从正统派经济理论中吸取营养。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或“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除具备上述特征之外,其成员大多以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还力图主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详而言之:

第一,对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持批判态度。这里讲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进行自由竞争的、能够自动调节的、阶级关系和分配关系和谐的经济体系。20世纪4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代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关于总需求总是等于充分就业时的总收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行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的基本论断。50、60年代以来,尤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滞胀”现象的产生,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活跃,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新古典综合”。自80年代以来,其宏观经济理论又吸收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某些主张,进行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从而成为当代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

应该指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成员十分复杂,各自具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渊源。至少,李嘉图和新李嘉图的理论(如斯拉法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老左派的理论(巴兰、斯威齐、多布的学说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左派凯

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琼·罗宾逊)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在某种程度上汇集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言论和著作之中。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大体上从上述几种理论中吸收营养,而各自可能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唯一或者基本的相似之处是对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各派别之间则有更多的相似之点,即他们都认为有必要重新重视、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必要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乃至重新构筑社会主义的模式和蓝图。这一点与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中以激进姿态出现的非正统派非主流派的新李嘉图学派、制度学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有所区别。毋庸置疑,他们大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观点掺杂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其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必将呈不断分化和重新改组的趋势。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对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的有力的挑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激进政治经济学与主流派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主要表现为:

(1)后者侧重于均衡、平稳以及局限于某一结构之内渐进变化的数量分析,拒绝考虑变化是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的格言是“自然界没有突破”。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则拒绝承认改革社会组织能够消除基本的经济问题,而乞求于价格体系。他们的保守主义特征实质上是强调所有的人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统一的理想(这种分析的核心是达到最佳均衡市场作用的自我调节机制),因而得出否认任何形式的阶级对抗的存在的结论。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则从

动态角度强调对抗、演变和质变。

(2)后者仅考虑一种制度关系内的增长变动,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既考虑一个制度内的增长变动,又考虑一个新制度的完全变化,从而通过完全的变革最终实现“可行的”社会主义。

(3)后者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把它与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与对抗分离开来。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拒绝把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看作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则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作泛化处理,认为如果脱离开人的关系就无法了解经济,而人的关系是与政府、家庭等相联系的。

(4)后者没有关于剥削的理论,而是把包括分配在内的整个经济看作是完全和谐的,把均衡作为其主要的分析工具,把“边际生产力论”(即在资本主义完全竞争制度下工人和资本家所获得的收入刚好等于他们各自提供的“边际产品”)和福利经济学作为其分配理论的基础。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经济看作是对抗的舞台,一些人被另一些拥有强权的人所剥削。

(5)后者在对性别、种族和异化等问题进行分析时,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可以自动消除所有的歧视和异化现象,从而把这些问题与整个政治经济的阶级关系分隔开来。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竞争以及资本家使利润最大化的做法(通过分而治之)看作是导致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根源。

(6)后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多元论”的鼓吹者,把政府定义为不同利益集团决定的总和,是由大量的选举人选举出来的,如同消费者用美元作选择一样,政府还被赋予公断者的职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则把政府看作是冲突的舞台,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级通常在政府事务中居统治地位,亦即把政府视为资产阶级在

其中居统治和支配地位政府。

(7)后者没有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科学理论,而是把每一次危机看作是对自动充分就业的偏离,这种偏离趋势是由错误的政府政策所导致的,或者仅仅把这种趋势作为不合理的变形(货币主义者语)。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内部的带制度性的基本矛盾,而并非仅仅是由政策性的或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

(8)后者把垄断看作是对纯粹或完全竞争的小小偏离。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则把垄断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大公司居支配地位,许多经济规律都发生了变化。

(9)后者宣扬“纯粹”和“完全”的竞争性经济活动将导致各种资源的最优化分配和使用的论点(主流派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因而把环境破坏问题看作是对亚当·斯密所预言的那种各方面的最佳结果(通过竞争实现)的小小偏离。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企业外部的负效应(私人获利并不考虑对环境的破坏)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10)后者总是力图从个人的本性出发,构筑其经济理论体系,而把人又视为利己主义的、善于趋利避害、具有惰性和个体性或有限的合群性倾向的人,因此,各种经济问题(如种族主义、资源配置)都归结为个人的偏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则把个人的偏好放在社会结构里加以解释,强调种族主义一类的经济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11)后者鼓吹斯密的市场万能神话,把竞争的市场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而把任何集体计划(如免费医疗制度、教育)看作是降低效率和个人福利的祸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承认

市场的优点及其缺陷,并认为在许多方面(诸如教育和医疗保健项目)都需要用合作和计划来代替市场与贪欲。^①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主流派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对我们分析和研究后者具有参考作用。但他们中间有的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若干主流派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其思想影响。激进政治经济学虽然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没有取代当代主流派的实力(在现有制度下也不可能问鼎主流派宝座),至多对它们发起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成功地削弱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对新李嘉图主义也持批判态度,并从20世纪70年代起展开了一场论战。他们赞同新李嘉图主义者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但对他们放弃劳动价值论、过分看重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强调用商品生产商品而不是用劳动生产商品而深表惋惜,并认为他们缺乏对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矛盾以及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正确分析。此外,他们也不赞成崇拜市场力量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

第二,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立场,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的分析批判,是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方面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是利用工资契约来组织劳动力,从而体现了这一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占有资本货物及原料(即生产资料)的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以异化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认为

^① 参阅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第1章,M. E. Sharpe 出版公司1987年版。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实际上可进而划分为阶级,而阶级主要的是在拥有生产资料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之间,在生产“剩余价值”与控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能根据自己的意图支配“剩余价值”的人们之间划分的。并且这种阶级分化不可避免地演化为阶级冲突,其结局最终推动社会进化。

其次,激进政治经济学不仅宣扬阶级冲突动力学,而且从更深一层的原因去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化的原动力即资本积累。他们否认主流派经济学家鼓吹的所谓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心理偏好,而认为是受资本积累原动力的不断驱使。因为资本所有者(不管他们是小店主,还是公司巨头)之间的竞争使不进行积累的资本家势必被致力于积累的资本家所淘汰。而资本积累必然使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但有的激进经济学家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力的极度膨胀使得为分配剩余产品而持续进行的阶级冲突显得毫无道理。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本来能够生产足够的产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收入和闲暇。^①

他们还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或“核心制度”(即“体制性制度”)作了界定。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日常生活内容方面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制度;以及对于不同经济利益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结局起限定作用的那些制度。并指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就是“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对待,劳动力的分派以出价高低为准绳的劳动力市场;拥有并支配资本的人们控制着生产过程,工人则因而失去在工作时间内自主活动的自由;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法定所有

^① 参见戴维·戈登:《政治经济学问题:城市前景》,第5页,D. C 希思出版公司1971年版。

制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由于使用了所有者的生产要素而向他们支付报酬;‘经济人’(即人的经济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而且实用的个性特征体系,个人利益刺激制度尤其包括于其内;以及把‘现实’加以概括和归纳,以便维护并帮助其他典章体制实施的思想体系。”^①他们认为,这五种制度彼此相辅相成,并具有支配其它非核心制度(诸如教育、家庭、宗教等等)使之服从本身需要的倾向,而资本主义国家归根结底是为旨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这种体制性制度服务的。

揭露资本主义运行的弊端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批判的重点。他们把产生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异化、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城市贫困化(即生活质量下降)与就业不足、周期性失业危机和滞胀等弊端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赫伯特·金提斯在60年代写的《异化和权力》一文是异化论的代表作。他认为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心理状态。他讲的社会制度,则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的私有制;劳动市场;土地市场;由市场力量决定对“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生活必需品、食物、住房、社会保险、医疗设施的市场交易;资本家以及作为资本家代表的经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谢尔曼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则指出,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人利润制度,代之以一种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主办的刊物,则出版关于经济危机的最新经验性论文专辑(1986年),从而表明他们的危机理论有走向多元

^① 爱德华兹·麦克尤恩:《经济学中的激进学说》,载《美国经济评论》学术论文与会议文献汇编,1970年,第60期,第353页。

化分析的倾向,诸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灭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度论等。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由此得出最终消除资本主义运行不稳定状态及其各种弊端的途径,就是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批判的又一重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格、工资和利润范畴和体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人、社会与阶级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剥削和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一致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因为后者强调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利润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从而把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视为一种无质的差别的纯技术关系。但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者虽然在对导致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的说明上,有广泛一致的意见,但对如何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量的方面的理论(即对剥削关系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却存在分歧。有的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有的认为用劳动价值量度来说明剥削要比斯拉法的商品量度更易于理解,但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某些修改。斯拉法主义者却对边际生产力论和劳动价值论都持批判态度。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还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承认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应根据新的经济现象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其中包括国家干预的空前加强的新趋势;大垄断资本主义公司在经济生活中乃至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行为(如垄断价格行为、追逐高额利润)增加不稳定的危险性;跨国公司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对各国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积累跨国化趋势(这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心”资本主义剥削“外围”资本主义即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使后者处于从

属和依附的地位,以及世界体系论等。这无疑为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第三,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区别于其它激进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结束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挽救、改良和稳定这种制度。他们倡导“历史动态学”,并通过对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合乎逻辑地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并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70年代初,林德贝克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框架作了初步的概括。在他看来,所谓经济制度就是用来就某一地区内的生产、投入和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它涉及决策结构,以及提供情报、分配资源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机制;财产所有权的定义;个人与公司对于刺激和命令的选择;决策者(竞争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是个人还是公司;整个制度与外部世界(制度的“开放性”)之间的关系。详而言之,第一,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决策的选择。激进经济学家一般支持分散化经济决策(就各个生产单位内部决策而言),或分散的计划方法(或称“民主参与决策”),但也赞成制订宏观的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无政府状态。第二,市场与行政管理两种机制的选择。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两种传递情报、分配资源和协调决策的方法均加以反对。事实上他们的立场多少有些含混而又自相矛盾,即既拒绝市场制度而又多少赞成分散化决策。第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选择。他们普遍赞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大多偏爱集体所有制形式(如公社、合作社),而不喜欢易导致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所有制。第四,刺激与命令

机制的选择。他们都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并极大依赖利他主义的道德力量,反对各种经济刺激和行政命令。第五,竞争与合作的选择。他们几乎普遍厌恶竞争。第六,国际化与自给自足的选择。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明显一致的意见,但对把各国国民经济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做法持批判态度。总的来看,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初期对未来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体制的构想是粗糙的,莫衷一是,甚至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少数人主张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方案或市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非市场制度,甚至无政府主义方案。但他们其中大多数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实行公众参与有关各种公共事务的决策,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准私人占有利润,真正均等地再分配收入和财富,非集中化的计划制度。

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一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苏联的“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主义”,得出了无论是中央计划还是市场都不是好的经济制度的结论,并在努力探索市场与计划的最佳结合问题,从而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内部开展了关于“可行性社会主义”(Feasible Socialism)与“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的论战。前者以亚历克·诺夫、谢尔曼为代表。他们对可行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目的作了下述规定:这种政治和经济结构可以产生民主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可以解决好微观经济问题(如效率)和宏观经济问题(如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而对企业实行的有效程度的政府控制和工人控制,则可取得民主、效率、宏观均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最佳结果。但是他们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论证。后者如曼德尔、安德森、查托帕德海伊等人,都对诺夫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如曼德尔认为民

主计划优于苏联经济的官僚计划(独裁+中央计划+政府所有制),因而赞同民主计划即公有制+中央计划+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场论战表明,一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已完成从厌恶市场到利用市场的转化。谢尔曼甚至提出“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的术语,认为,在完全的共产主义中,虽然没有工资、没有价格和没有竞争的市场,对奢侈品和全部生产物质继续利用市场仍然是有必要的。约翰·罗默还对未来社会主义即“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诸模式”作了下述理论概括:工人管理企业的模式,保留传统管理模式但应着重考虑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模式,以及不实行所有权的大规模变革,只是通过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管理结构来逐步实现收入平等的模式。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虽不乏借鉴因素,但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趋同论。一般而言,大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继承老左派经济学家的传统,反对易滋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尤其反对崇尚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新古典复辟思潮。

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的问题上,有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在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找到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力量,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主要是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推动,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从“外围”开始。有的则主张社会改良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可以通过公民合法选举的途径产生出来,亦即通过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党实施社会主义纲领,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与此相反,一部分激进主义者则坚持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寻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有的(如保罗·斯威齐、艾伯特·西曼斯基)寄希望于工人阶级、产业工人或蓝领工人,

但有的(如斯托德)认为“新工人阶级”即白领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是未来革命的动力,有的(如法国的爱伦斯坦)则力主用“工资阶级”取代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上述观念大多具有空想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下半期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美国最早竖立起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旗帜,1968 年成立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英国在 1970 年成立“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在一些西欧大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也有类似的流派组织、代表人物,并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刊物或出版社。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布朗芬布伦纳(自称为“折衷主义者”、“自由派”,曾任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早在 1964 年,就撰文号召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予以重视,并在《美国激进经济学:1970 年概览》一文中,对此作了全景式的概述。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的《新左派经济学》(1971 年)较早地对他们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西方经济学界对该书十分重视,曾为此举行专题学术讨论会。萨缪尔森为该书作序,并不得不承认激进政治经济学乃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无怪乎西方经济学界得出“睡犬觉醒了”(Sleeping Dogs Awaken)^① 的结论。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尽管它在 70、80 年代有过一段短暂的“沉寂”或“冷遇”时期),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也是对居主流派地位的庸俗经济学失去信心的一种反映。他们对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新问题、新现象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

^①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美国激进经济学:1970 年概览》,第 747 页,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0 年 9 月号。

可贵探索,虽有不足之处,但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不仅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并对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美国是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这一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

一、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概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斗争,如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公司歧视黑人乘客的运动(1955年)、歧视黑人入学儿童的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1957年)等。60年代以来,美国各地掀起的反对侵略越南战争的群众性反战运动,以及受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以美国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要求改革、要求进步的激进学生运动(史称“新左派运动”)。

这里讲的“新左派”,是区别于20、30年代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革命经验的“老左派”或老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后者如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多布、曼德尔、马尔科斯、威廉姆斯、米尔斯等的思想是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新左派运动的高潮是60年代下半期。其标志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事件。这是以巴黎大学生搞反战示威为导火线,一场

持续二个月的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这给予美国新左派运动以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从整体上看,70年代是新左派运动的衰亡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左派运动,因其在理论上的空想性质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而接近尾声。然而,美国新左派运动在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的背景下,却愈演愈烈,从而直接促成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壮大。

美国新左派运动在60年代中期,已逐渐形成一批松散的没有严密组织的左翼团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学生争取社会民主协会(SDS)、新大学联合会(NUC)、教师争取社会民主协会(TDS)、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SSC)、争取社会民主运动(MDS)、非暴力协调大学生委员会(SNVCC)、旨在与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抗衡的新政治科学委员会(CNPS)、中大西洋历史学家激进团体(MARHO)、激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联盟(Union of Marxist Social Scientists),以及成立于1968年,欲与正统的美国经济学会相对立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简称URPE)。这些社会团体是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派别,即左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在内的混合体,提出了范围广泛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主张。因此,这些组织大多最终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结局。例如,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成立于1964年,它成功地召开了一系列年会,1965年年会有1,000余名会员出席,1966年年会已逾2,000名,1967年年会有3,000名成员,1968年、1969年、1970年三届年会分别为600名、800名和600名。1971年该组织解体。

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主体是大学校园的学生、研究生、青年知识分子,由此又被称为“校园马克思主义”、“左派学院马克思主义”或“北美马克思主义”运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献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其特点是:这一运动波及各个学科领域,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教育学、语言学、法学、文学等学科学术领域的教员和学生,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本学科的正统理论重新进行审视、批判和反思,“开始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发生作用(它为谁服务得好,为谁服务得差),它如何兴起及其发展趋向的解释”^①。仅美国各大学哲学系就开设400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其次,各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此外,全美已涌现出20多种激进的学术刊物或出版机构,还有跨学科的左派杂志等。

美国新左派运动或校园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尤其经济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等。这与沉溺于纯哲学、纯抽象思辩方法的西欧“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但总的来看,它远没有发展到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程度,还没有酿成工人运动中相应的政治发展。这与新左派或激进派注重学术界的争论、学院氛围或书斋气息浓重有关系。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在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场“和平的民主革命,主要是以著述和讲演来进行斗争”^②。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是从这场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在校园站稳了脚跟,并以“研究、发展、应用激进

^{①②} 奥尔曼主编:《左派学院:美国校园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第1卷,序言。

政治经济学作为在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作为这一联盟的宗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探寻走向“一个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1968年12月19日至21日,他们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全国性会议,并于1969年3月由密执安大学会员结集出版了大会论文集,作为该联盟出版物的创刊号。他们明确宣称: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是由自愿献身于研究、发展以及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一工具,旨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所组成的协会,其功能是为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然而自愿聚集的人们提供一个论坛。它的成员主要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年经济学者、研究生和大学生。哈佛大学、新社会研究学院、美利坚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其各个分校等著名大学都有该组织的会员。70年代中期,激进经济学联盟成员已逾1850人,其鼎盛时期扩大到2500人。

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60、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这是由于他们的基本立场的一致,即批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推崇马克思主义,明确宣称要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这个联盟又是一种能容纳各种不同观点的“伞形”组织。各种理解和见解处在不断的分化、撞击和发展之中,从而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学派本身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他们主要以大学校园为阵地,从最初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扩大其影响,发展到著书立说,并加强和充分利用《每月评论》杂志和每月评论出版社等出版阵地。他们从不定期集会发展到定期召开年会,并且通常在正统派把持的美国经济学会召开年会的同时召开自己的年会,用以表示其与正统派经济学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从随堂宣传激进经济学,争取到合法开设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

美国伊诺河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激进经济学、法律和战争经济学：经济学阅读指南、课程大纲、测验答疑》(1985年)，是一本专供大学生和研究生参考和复习的工具书(其资料来源于全美72所著名的学院和大学)，激进经济学也赫然列入其间。无怪乎1973年2月11日的《华尔街时报》出现下述标题：“激进经济学家的非正统观点赢得越来越多的听众”。而《商业周报》(1972年3月18日)也撰稿指出：“激进派已独占鳌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并赢得新听众的青睐，激进派的学术地位蒸蒸日上。”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经历一段沉寂期，会员人数下降到1000名。这个组织在70年代是以激烈宣传阶级斗争、尖锐批评美国社会为特征的激进政治讲坛，而现在已成为一种影响力急剧下降、温和的学术论坛，萨缪尔森甚至认为“他们的理论在向保守方向发展”^①。但在90年代又呈现复兴和繁荣的景象。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和每月评论出版社为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

《每月评论：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创办于1949年5月，并向西欧各地发行。老左派保罗·斯威齐和利奥·休伯曼任主编和发行人，休伯曼(1903—1968年)逝世后由马格多夫接替。经费来源于非营利性机构“每月评论基金会”。该刊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以及国内外重大事务等问题，“揭示资本

^① 路易斯·尤奇特勒：《80年代的激进经济学》，载1987年9月1日《纽约时报》。

主义如何运转以及演变的可能性,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工具分析现实问题,阐释诸如经济和生态危机、工人争取民主运动以及社会转变机制一类的问题。50多年来,《每月评论》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原则”。^①这份月刊的“发刊词”强调:它有助于加强读者与欧洲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直接接触,以及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我们将跟踪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但着重点置于国内社会主义而不是海外社会主义。我们坚信:美国资本主义愈能迅速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愈益造福于美国人民和全人类。”而《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实际上成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主办的杂志。每月评论出版社则由斯威齐创办于1951年,为在西方用英文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激进派的著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三家出版机构实际上成了美国左派的理论宣传阵地。据80年代初的统计,《每月评论》杂志发行量为1.3万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订阅量0.3万份。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在许多专业学会资助的条件下,订阅量才达到2.6万份。每月评论出版社硕果累累。仅1991年春季、夏季出版的新书和重版书就不下81种。

二、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1. 斯威齐、巴兰

斯威齐和巴兰是美国“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者,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马克

^① 《每月评论出版社1991年上半年新书和重版书目》,第19页。

思主义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

保罗·斯威齐(1910年—)出生于纽约,193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翌年进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193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与休伯曼创办《每月评论: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两年后又创办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受到美国司法当局的“审查”。50年代以来,先后担任过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新社会研究学院和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197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1983年获印度尼赫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主要著作有《1550—1850年英国煤炭贸易中的垄断和竞争》(1938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42年)、《社会主义》(1948年)、《作为历史的现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文和评论》(1953年)、《垄断资本》(1966年,合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四次演讲》(1981年)等。

保罗·巴兰(1910—1964年)出生于乌克兰,先后移居波兰、德国和美国。192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32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起在斯坦福大学执教。1951年任该校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垄断资本》(1966年,合著)、《更长远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集》(1969年)。他的成名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经济剩余理论。他还是西方第一个从事当代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和巴兰的著作成了年轻一代美国人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教材,因而成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斯威齐的成名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本著作也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这本书在战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复兴”(resurgence)以及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起过重要的作用。斯威齐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世界上迄今尚未出现过一本用英语撰写的合理地综合地分析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这本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思想整体”作出了贡献。

该书由导论和正文四篇组成。导论规定了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即研究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个人的总和)关系，弄清楚这些关系是什么，它们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位置，以及从属于所要阐明的哪些学科。斯威齐强调本书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并把“从马克思那儿有所发现”规定为本书的最低的宗旨和目的。

第1篇《价值和剩余价值》，主要阐述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及其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历史特征；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阐释了价值的质和量的关系，价值和竞争、供求的关系，价值和价格、生产价格、垄断价格的转化关系。此外，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剩余价值的起源、剩余价值率、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利润率等范畴。

第2篇《积累过程》，主要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诸如资本主义过程的性质、利润率下降规律、劳动力后备军与资本积累的内在联系，以及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等问题。

第3篇《危机和萧条》，主要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基本原理，诸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和必然性，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联系，经济危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联系；对形形色

色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论,但并不反对比例失调危机理论,并且对消费不足危机理论采取肯定的态度。

第4篇《帝国主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国家和国家职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涉及资本集中、股份公司、银行垄断组织理论),垄断与价格、利润、积累、分配的关系,世界经济关系,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国家和战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改革的前景,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衰退等问题。

斯威齐在大量引证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长期存在的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激进见解,对当时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部书对“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以及“新左派”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斯威齐与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也是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先驱者的代表作。这本书提出了激进的垄断资本理论,并力图以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本书的重要特点是用“经济剩余”概念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术语,并在实际上显示出“重新研究”、“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取向的端倪。西方评论家对《垄断资本》一书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一部杰作;很长时期以来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奠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因为它第一次力图体现和阐释把马克思的竞争资本主义模型扩张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有些人则认为,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理论基石,即剩余价值理论,并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正统结构,舍弃了利润率这一中心范畴和利润率趋势下降的规律,并明显地刻有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的烙印。

全书共分导言和 10 章正文。《导言》阐述了该书的宗旨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甚至不能辨认重大的事态发展,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不前”及其“落后的生命力和成效性”。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原理和运动规律的研究中依然属于最高统治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到底依然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资本论》体系中“竞争模型”的“补缀和修改”上,而应该致力于建立以垄断为“分析工作的最中心”的新的理论体系。^①

正文各章的标题依次是:巨型公司;剩余增长的趋势;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剩余的吸收;努力销售;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史;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不合理的制度等。作者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理论概括: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不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真正的替代物。作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观念——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

^① 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第 11、12 页,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少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同这个制度结合成一体。从内部去推翻这个制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巴兰、斯威齐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从而导致国内的社会革命。

2. 马格多夫

“老左派”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8年)以及他和斯威齐共同撰写的《日益加深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1977年)等著述是《垄断资本》一书的重要补充。这些书虽然有重大的缺陷，但仍具有积极意义，对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特征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并且对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3. 马克·林德

马克·林德是美国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反萨缪尔森论》(1974年出德文版,1977年出英文版)是70年代美国激进派对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认真而有力的挑战。马克·林德60年代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曾是美国左翼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现执教于丹麦罗斯基里大学。该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著名主流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作者总结了当年学生运动失败的根源,认识到,“我们的目的在于:不是通过抽象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是通过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当今的资本主义,才能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① 他

^①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上册,序言,第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之所以以《经济学》为批判的靶子,则是鉴于《经济学》一书是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的综合)的奠基之作,从而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并且是畅销于西方世界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教科书。它迄今已再版13次(1948—1989年),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发行量已逾300万册。萨缪尔森还被吹捧为“经济学的爱因斯坦”,并获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反萨缪尔森论》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说体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认真而有力的挑战。

《反萨缪尔森论》一书分6编共27章。大致与《经济学》的分编相一致。第1编“基本理论概念”,相应批判《经济学》第1—9章及39、40章。林德对萨缪尔森有关方法论、市场机制、分配和三大社会基本组织(企业、工会和国家)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批判。他着重批判了这些经济学基本理论概念的超历史性和超社会性,萨缪尔森正是以此作为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工具,他所使用的实证方法——即把这个社会的存在理解为既定的,既不研究它的起源,又不研究它在未来是否可能被另一种社会(社会主义)所代替,其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问题”及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可能的解决方法上——的实质,恰恰正是把“支持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人,即“他的理论是按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方式形成的,这又意味着,他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探求对资本主义没有威胁的解决办法”。^①因而这种方法论具有虚伪和不诚实的品性。

^①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上册,序言,第5页。

林德对“稀缺性概念”(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产生于稀缺性)所显示的反历史主义、反阶级分析的错误的分析批判,是一个典范。萨缪尔森认为稀缺性具有超历史的绝对性,即以不存在社会阶级这一假设为基础的,但又企图解释其相对性,因而产生两个重大错误:“第一,把稀缺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基础意味着,私有财产产生于土地缺乏所引起的贫穷(关于人口过剩的同样想象构成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但是,实际上私有财产不是产生于‘稀缺性’,而是产生于超过按某种传统消费水平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剩余。因为这种剩余使一个不干活的所有者阶级的存在成为可能,而财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后的发展阶段,即西欧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我们就会看到,对农民直接的(而且往往是暴力的)剥夺并不是稀缺性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剥夺引起了(绝对的)土地稀缺,从而导致了这些失去自己土地的人的生活资料的稀缺。因此,不研究历史—社会状况,就无法理解人的‘需要’与自然禀赋的丰富或稀缺之间的关系。”^①

第2编:“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相应批判《经济学》第10—14章关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论述。林德以大量篇幅补叙萨缪尔森所忽视的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并批驳了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方法论实质:高度折衷主义、强调主观心理因素以及否定阶级分析。除了指明国民收入理论的两大基本假设的错误,以及用非资本主义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之外,林德尖锐地指出:在国民收入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乘数理论重复了二百年前“斯密教条”的

①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上册,序言,第18页。

错误,即忽视了不变资本补偿问题,其根源之一在于偏重消费、需求和流通领域而忽视生产领域。

第3编“货币与信用”相应的批判对象是《经济学》的第15—19章。林德在这一部分着重分析批判萨缪尔森的货币、信用及通货膨胀理论,指出其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后者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和货币理论。他既批判财政货币政策调节万能论,同时又注意吸收其合理内核。他说:《经济学》第16章“银行制度与存款”的“客观作用是在资本信用活动周围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以使读者相信:联邦储备银行是万能的,我们老百姓无需再惧怕我们的经济会失去控制。我们的目的是摒弃这方面的神秘色彩,揭示这些调节的合理内核及其局限性。”^①

第4编“价值和价格理论”,批判《经济学》第20—26章中所阐述的微观经济学核心理论,其中包括供求论,边际效用论,成本、收益与价格分析,竞争和垄断理论。林德一开始阐述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边际效用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批判边际效用论的“心理基础”,以及边际效用递减律和边际效用等同律等。指出,萨缪尔森把价值视为“心理效用行为”,从而引入价值的主观标准,其目的在于使价值与生产的特定社会过程脱离,最终也使经济学本身被纳入不考虑社会—历史差别的一般行为理论。在林德看来,萨缪尔森关于其他经济理论(如垄断理论)分析的特点,也是拒不考虑“对于构成现代垄断基础的生产社会化过程”,“垄断理论仍然是与整个经济过程相脱离的,仍然局限于对单个厂商或商品的研究。”^②

①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下册,第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同上,第159—160页。

第5编“生产要素”，批判《经济学》第27—31章所论述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林德指出，这种建立在边际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他引用资产阶级左翼分子埃里克·普赖斯尔的评价：边际生产力的主要缺点是它认为主要由自然与技术因素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以及它忽略了首先解释流入各个社会阶级的收入的相对量的社会条件，并补充指出，“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特征就是把完成生产后就占有其成果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混淆了。”^①

最后一编“世界市场”着重批判《经济学》第33—38章中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其中包括世界货币、汇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等问题。

《反萨缪尔森论》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有的认为它“对现代主流派经济学的那种与历史和政治毫不相干的狭隘性是一副有用的解毒剂”^②。林德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剖析和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并抓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实质，如形而上学，折衷主义，超阶级、超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在现象上兜圈子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尽管《反萨缪尔森论》是一本论战性和跟踪性批判著作，因而并未建立起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在某些方面有欠缺之处，但毕竟是对资产阶级正统派经济学的首次有份量的开火，从而为建立激进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下册，第180—18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罗伯特·戈登：《反萨缪尔森——来自左派的抨击》，载《纽约日报》（1977年9月11日）。

4. 保罗·阿特韦尔

保罗·阿特韦尔(1949年—)的《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是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作,他对60年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实际上是一部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说史著作。

《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由导论和6章正文组成。导论阐述了写书宗旨和该书的篇章结构,作者把“校园新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新政治经济学派”、“左派知识分子”视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同义语,但在实际上留下一堆“复杂的术语和混乱的晦涩难懂的文献”,大有梳理和提炼的必要。阿特韦尔因此规定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和评论这场“理性运动”(即新左派运动)及其激进政治经济学著述,并根据激进思想史一般模式来考察和评论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并且力图从“知识分析社会学”角度加以总结,从而把新政治经济学或激进政治经济学置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这一更宏大的框架内。作者把理论聚焦点放在四个主要领域: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过程和厂商理论;经济危机分析;以及关于帝国主义和依附的文献。可见,这本书是关于60年代以来激进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史著作,有的激进理论的源头甚至追溯到19世纪。

第1章“激进的学术界”描述了激进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其主要人物、著述和出版物作了简要的阐释,并对美英激进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研究。

第2章“经济分割和贫困理论”阐释激进派贫困理论,产业分割理论或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理论正是在与其对立派即正统经济学派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第3章“劳动过程与厂商理论”，阐述了劳动过程的历史发展，以及厂商企业结构的演变。

第4章“危机理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危机、商业周期、通货膨胀的理论，并系统地勾勒了西方危机理论学说史。

第5章“帝国主义和依附”考察了帝国主义和经济依附理论，对激进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说的产生和演变（其中包括从激进的依附理论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发展，后者被作者视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从而被纳入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

第6章“结论”，重申在导论中所确定的任务：即描述和评述新政治经济学家或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创立知识分析社会学并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框架；粗线条勾勒激进政治经济思想史。作者认为本书为确定激进政治经济学与知识社会学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好的起点。此外，作者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作了理论概括。

阿特韦尔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在若干重大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整理分析和历史的回顾与总结。这是奠定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前期理论准备工作，从而为奠定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5. 谢尔曼

霍华德·谢尔曼是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编委之一。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曾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畔分校)经济学教授和系主任。其主要著作有《宏观动态经济学》(1965年)、《初级综合经济学》(1966年)、《美国的利润》(1968年)、《激进政治经济学》(1972年)、《滞胀》(1976年)、《比较经济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1984年,与安德鲁·津巴利斯特合著)以及《激进经济学基础》(1987年)。代表性著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被视为美国激进学派的主要教科书之一。谢尔曼把此书献给“激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保罗·斯威齐。

全书共分5编。第1编“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阐述激进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框架和基础,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四个思想来源或传统,即李嘉图或新李嘉图主义(即斯拉法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左派凯恩斯或后凯恩斯主义。作者不仅批判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它现在包括一种凯恩斯经济学的保守主义的变种),而且还批判了前苏联前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即所谓“官方马克思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心理决定论”,提出了激进主义或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和描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结构(包括思想与制度)是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函数;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函数;就像数学中的一组联立方程一样,在同一时间,两类函数关系是可能存在的。

第2编“资本主义”,则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演进和种种弊端,深入探讨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富而另一些人穷呢?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而另一些国家不发达呢?为什么导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呢?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产生污染?为什么产生失业?

第3编“中央集权主义”，考察了前苏联和前东欧中央集权主义的传统体制

学派创始人加尔布雷思被称为“一个在过去 30 年中高声批判资本主义并构成对新古典正统理论挑战的人”。^① 加尔布雷思也公开宣称自己属于斯威齐为代表的激进派和左派,并大力批判主流派或传统派经济学,指责美国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应由“新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或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 School)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它经历三个演变阶段:

(1)旧制度主义时期(20 世纪初期至 30 年代),代表人物有凡勃伦(1857—1929 年)、康蒙斯(1862—1945 年)和米切尔(1874—1948 年)等人。

(2)旧制度主义向新制度主义转化时期(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代表人物有贝利、米恩斯、艾尔斯、约·摩·克拉克。

(3)新制度主义时期(60 年代中期至今)。格鲁奇在 1972 年建议把第二代制度经济学宣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是加尔布雷思,其代表人物有贝尔、科姆、鲍尔丁、海尔布罗纳、沃德、格鲁奇,以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法国学者别鲁等人。

主流派经济学家大多忽视和贬低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宣称它在 40 年前就已“凋谢”。其重要论据之一是,西方文献中的基础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以及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鲜有涉及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而为数甚少的经济思想史文献只提及制度主义创始人,而忽视其后继者乃至整个学派。唯有 E·亨特的《经济思想史》(1992 年)是一个例外。作者用半章篇幅论述制度学派,指

^①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 12 版),第 1283 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出,制度主义仍然是具有活力的当代经济学派之一。总的来说,制度学派处于非主流派经济学地位,但自60、7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因其无法解决经济滞胀问题而陷入理论危机,新制度学派在西方国家的影响遂有渐增之势。该学派拥有一批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自己的学会组织以及致力于阐述和发展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经济问题杂志》(演进经济学会主办)。80、9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聚集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下,或对既定社会制度本身提出否定的疑问,或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某种程度的修正和改革;或遵循凡勃伦—米切尔传统,倾向于对经济制度作宏观分析,其中佼佼者如加尔布雷思,以及创立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的A·艾奇纳、C·威尔伯和P·詹姆森;或接受康蒙斯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予以考察,其中颇有影响者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诺思、威廉姆斯,以及产权学派、交易费用经济学等,西方学术界一度因此掀起制度研究或“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克莱恩在1977年美国演进经济学会年会的会长演说辞《美国的制度主义:夭折与持久的复兴》中说:“我们已经为制度主义或演进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明确的、有意义的地位。”与此同时,缪尔达尔也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危机和循环》一文中指出:经济学研究在今后十年或十五年会发生急剧转向制度经济学的根本性的变化,并颇具信心地预言,制度经济学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

作为广义激进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激进派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它有什么特征呢?其共性首先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在制度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是保守的,不合时宜,甚至是有害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也是与社会现实不符的,并且还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颇有微词。因此,主流派经济学的代

表人物萨缪尔森把制度学派划入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攻击主流派经济学的五大派别,即崇尚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学,新左派或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等。其次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改造其“二元结构”,从而实现所谓“新社会主义”制度。

其个性具体表现如下:

(1)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着重考察物与物或人与物的关系,着重数量分析,而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及其演变和结构改革。在他们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制度是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制度是诸如家庭、国家、垄断、工会一类的社会现象。M·戈登撰写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1980年)一书则指出:制度主义经济学将社会秩序看作一个变动的过程;环境条件在变化,人类的生理在变化,技术在积累,有关获取资源的知识在发展,已经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在变化;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些变化过程的一部分;人们将自己的价值作为这种变化过程的一部分加以修正,而这种自我矫正的价值判断也影响这一变化过程。无疑,这种制度观从本质上讲是唯心主义制度观。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远远超出主流派经济学的范围,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它们把研究对象扩大到一切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似更接近社会学,并且不把重点放在关于实际生产关系的研究上,而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既定的前提条件。

(2)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与主流派经济学对立的。他们倡导演进的整体的方法,亦即反对传统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反对把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着重于“集体行为”;反对传统的脱离实际的抽象法,主张研究各国的具体历史资料;反对传统的关于经济制度永恒不变的说法,提出所谓历史起源的方法;反对以均衡分析方法标榜的“新古典派模式”或“体系”,提倡研究变化、研究因果动态过程,用“演进”概念取代“均衡”概念;反对数量分析,强调质的分析、结构或制度因素的分析,等等。但从总体上看,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唯心成份居多的分析方法。

(3)主流派经济学重点研究财富或财富的分配,长期以来很少研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因素。所谓“边际生产力”和“收益递减”论,都是以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的。制度学派却强调,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它在当代衍化为以运用和发展技术为特征的“机器操作”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即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制度)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主要制度。并从中引出“新工业国”、“后工业社会”、“新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还从“技术决定论”或“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中,引出形形色色的空想的改良主义方案。固然,新制度学派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科学技术的“权力”没有也不能代替垄断资本的权力,相反,垄断资本使科学技术从属于自己,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科学技术革命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革命化,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但不能自动地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尤其不能自动地破坏私有制的基础。

(4)批评把自由竞争视为生产和经济均衡的调节者的传统思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乃至“统制”或“监督”经济,并且提出

激进的改良措施和政策主张。诸如国家直接控制工资和物价,调节总需求,消除环境污染,实行计划化,但应限制垄断组织(即计划系统)的权力,从而加强市场经济成份(即市场系统)的地位,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矛盾或弊端。

(5)制度学派宣扬资本主义“质变”理论,并提出未来社会的设想,即“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后工业社会”、“新社会主义”,用以解决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计划系统与市场系统的矛盾,从而抹煞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无疑是一个空想的、改良主义的方案。“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的设计者加尔布雷思也竭力表示自己是“改革论者”,并非“革命论者”。

1. 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年)是70年代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集大成者。而《经济学的贫困》(1983年)则推出了新制度学派的最新变种——“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这是制度学派的两部代表作。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场主家庭。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1934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翌年获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幸福》杂志编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哈佛大学教授(1946—1975年),美国驻印度大使(1961—1963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等职。著述主要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一种价格管制理论》(1952年)、《1929年的大崩溃》(1955年)、《丰裕社会》(1958年)、《经济发展论》(1965年)、《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和

公共目标》(1973年)、《货币》(1975年)、《不确定的时代》(1977年),等。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是加尔布雷思最重要的代表作。全书共5篇31章。第1~20章是作者以前两本重要著作《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这两本书在西方经济学刊物中被评为可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相匹配的著作)的浓缩和修正。第21—31章阐释其社会改革学说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因此该书集中地反映了加尔布雷思理论的特色和政策主张。

“公共目标”是全书指导思想。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公共目标亦即经济制度体系的目标,是对人民所需要的作最大限度的供应。而正统派经济学则把经济增长作为公共目标,导致对“物”的注意,超过对“人”的注意,因而造成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型化、环境污染、城市腐化和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烦。因此,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众的幸福,而只会是社会的祸害。因此要恢复被正统派经济理论异化了的“公共目标”,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的“目标更换理论”。它与“新目标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注意微观目标(即企业目标),即把企业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旧目标转化成“稳定”、“技术兴趣”和“发展”这三大新目标。

两元系统论是该书的基本理论。在作者看来,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是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两部分组成的“二元体系”或二元结构。“计划体系”是由1000家左右的巨型公司组成;“市场体系”是由1200万个小企业、农场、小商贩、小建筑行、个体经营者组成。前者有权力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实行的是“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采取的是“操纵价格”,所以这部分经济又称作“计划系统”,后者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反而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所以这部分经济可以称作“市场系统”。

这两个系统在社会经济中是互相依赖的,但在交换中双方的权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计划体系用“操纵价格”来剥削市场体系。作者以很大篇幅分析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大公司、大经济与小企业、小经济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因此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常常只有利于计划体系,而不利市场体系,从而加剧了前者对后者的剥削,甚至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更为厉害。因此,加尔布雷思实际上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病的根源归咎于二元体系的存在及其造成的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这就是制度学派的制度因素分析(尤其是结构因素、权力因素分析)的可笑样板。

结构改革论即“新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方案和具体建议,占全书 1/3 的篇幅。加尔布雷思将他为当代资本主义开的药方命名为“新社会主义”：“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比计划系统相对低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开始,缩减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我们把这个叫做‘新社会主义’。”^①在他看来,唯有新社会主义才能从公共利益目标出发,通过国家干预使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二者的缺陷得到补救;新社会主义是环境逼迫的结果,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也无须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并且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设,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制,消除收入不均等;政府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直接的管制,遏制通货膨胀;把消除环境污染视为现代立

^①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第 217—218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法机关的重大任务；增加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和利益的国家预算拨款；保证各部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以及实行大公司的国有化，等等。无疑，这些政策主张和改革方案，并不触动垄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因而是一种激进的宣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趋同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改良主义模式。

2. 后凯恩斯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威尔伯和詹姆斯

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圣母玛利亚大学的查尔斯·威尔伯和肯尼思·詹姆斯的主要著作有《现代经济史的重新考察：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1974年）、《地球是上帝的：托管人职责文集》（1977年）、《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78年）、《经济发展的方向》（1979年）、《供给学派经济学：增长与收入分配》（1980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1981年）、《一种新的趋同：美国的拉丁美洲化？》（1982年）等。

影响较大的是他们合著的《经济学的贫困》（1983年）。

该书共分引论及3编10章。作者重新检验了18世纪中期以来至今广泛受人注意的各种经济思想的经历，系统的阐述了它们如何崛起、如何陷入困境和如何为新的经济学思潮所代替等问题。强调指出，当代美国经济问题只有以美国经济的制度发展以及经济学家们力图阐释的经济的整个历史为背景方能理解。这是全书的基本出发点。此书还开拓出渊源于凯恩斯和美国制度主义者的“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艾奇纳反对传统的主流派经济学，指出，经济学的任务与稀有资源的分配无关，而是研究一个经济体系如何通过生产和分配社会剩余来不断增加产量；在体系意义上对经济理论效率的严峻考验，则是其理论的实施是否奏效。

“引论”部分从经济史角度阐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尤其是 70 年代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第 1 编《流行的正统观念》和第 2 编《两个挑战性的批评》,从经济思想史角度,介绍和评述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凯恩斯主义、周期波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同时阐释了它们各自对现实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即自由放任经济学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凯恩斯主义都是失败的理论,因为目前的经济困境就是对它们有力的申诉。它们都无法解决目前美国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无数问题。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理解目前危机和未来方向方面,提供了进行有效观察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美国的情况不太相宜,很难成为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虽指出可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一些现存经济的弊病,但它是如此地激进,以致不得不对社会作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必然威胁到经济中现存重要力量的生存,所以它实际上不可能作为一部分自觉的政策来贯彻。第 3 编《可供选择的方案:后凯恩斯制度主义》寻觅到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即“后凯恩斯制度主义”,指出“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研究如何分配稀有的资源,而是研究一个经济体系如何通过生产和分配社会剩余来不断增加产量;在体系的这一意义上,对经济理论效率的严峻考验是某些行动(或政策)是否会产生预期的结果。”^① 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了美国经济的结构与运行方式、发生故障的原因,以及如何使其运转灵便的思路,并提出经济改革纲领。

这种改革方案和政策主张包括:

^① 查尔斯等:《经济学的贫困》,第 166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

(1)新的社会经济模式为达到“生计维持、尊重和友爱、自由和机会均等”这三大目标,必须是既非自由市场的调节,亦非官僚主义的控制,因此必须吸收市场配置机制(易产生市场缺陷)、官僚主义配置机制(易产生极权主义)和友爱配置机制的长处,旨在保持集中(全国性计划体系)和分散(工人自我管理)之间的平衡,并把民主、合作、自尊和友爱作为激励机制。

(2)鉴于经济运行的弊病源于道德危机,从而对其后果即社会冲突的控制无力,应形成新的道德规范(即公平分配和公民的合作心)和新的社会契约。

(3)四点具体政策建议。即实施国民经济计划纲领;采取特殊的收入分配政策,以解决收入分配方面的社会冲突;利用工人的自我管理和严肃地考虑主要公司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用以解决大公司营运中的问题,以及承认第三世界发展的必要性和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者对上述改革构想的成效持谨慎态度,但宣称它较之左翼激进派的“社会完全改革论”有更大可行性,较之新经济自由主义派所冀求的社会更为人道。显然,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社会改革方案,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乌托邦。

毋庸置疑,号称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激进派的制度主义,从总体或性质上看,是在激进的幌子下兜售改良主义的货色。但在某些具体问题和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第三节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一、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概况

1970年成立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是英国最大的激进派机构。这一组织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于英国正步入长期滞胀的局面,正统派经济学家已找不到一剂根治缠身多年的“英国病”的灵丹妙药。英国又是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发源地、新古典经济学和左派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并有浓厚的社会主义传统。而直接的思想渊源则是英国老左派如多布、米克等人及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CSE)拥有自己的专门杂志《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通讯》,1977年春季更名为《资本和阶级》(季刊)。为更名发表的“编者按”声明:该联合会力图用这种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者促进和深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提供论坛,新改名的杂志旨在推动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剖析。更名后的第一期收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1976年年会的三篇论文(这次年会的研讨主题是“劳动过程”问题)《资本和阶级》编辑委员会由巴巴拉·布雷德拜伊、黛安·埃尔森、本·法因、伊恩·高夫、约翰·哈里森、约翰·霍洛韦、休·希梅尔韦特和索尔·皮奇奥托等人组成。

另一家激进杂志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这家

双月刊杂志创办于1960年,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出版,其宗旨就是力图提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促成与工人阶级的革命联盟。“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宣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与人民在一起,与那些受欺凌、不满现状的人一起,去揭露这个社会,与此同时,使社会主义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中具有直接的意义。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时事、政治、经济、文艺等领域,尤其关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犀利的抨击。它还组织讨论和评价包括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上百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活动,并联合新左派图书公司大量翻译出版这些思想家的著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罗宾·布莱克本、爱德华·汤普森、佩里·安德森等人,曾任这家杂志的编辑。

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资本和阶级》编辑部以及《新左派评论》编辑部所开展的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讨论会,当属1978年11月在伦敦联合《剑桥经济学派》杂志、维尔索出版公司和新左派图书公司共同发起召开的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会。英国、美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一批激进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维尔索出版公司和新左派图书公司结集出版的《价值问题的论战》,则是这次讨论会的结晶。

二、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其先驱者莫里斯·多布、罗纳德·米克,以及本·法因、鲍勃·罗松、德赛、金、马尔科

姆·索耶、杰弗里·皮林、艾里斯蒂斯、霍奇森、朱南卡、格林、萨特克和菲、麦克莱伦、米利班德,还有斯拉法主义者伊恩·斯蒂德曼等等。

1. 多布和米克

多布(1900—1976年)和米克(1917—1978年)是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精神领袖。多布是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复兴的最主要的代表,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一个小商人家庭,1922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4—1967年先后获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并任剑桥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1928年出版了《1917年以来俄国经济的发展》,这是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撰写的第一部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名著。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基本理论,力图以“正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并且是最早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多布在经济史尤其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造诣很深,如自1948年起就与斯拉法合作编纂了11卷本的《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主要著述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37年)、《经济学家马克思》(1943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1946年)、《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年)、《经济增长与经济计划论文集》(1960年)、《经济增长和不发达国家》(1963年)、《福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1969年)、《亚当·斯密以后的价值和分配学说》(1973年)等。

他在30年代反对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论战中,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结构中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在他看来,任何科学知识研究的历史,都是从对一种比较模糊的、未加区分的领域内的事物的描述和分类开始的,并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够得出某种有限的普遍原则。这种普遍原则虽然有局限性,却能使人们决定整个体系的构造。因此,这种普遍原则不仅要达到一定的综合的程度,而且要达到一定的精确的程度。他认为,包括价值理论在内的某些经济理论,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知识体系中,能够取得这种普遍原则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具有描述和分类的功能。

多布进而探讨和阐释了具有描述和分类的功能的所谓“充分的”价值理论所应具备的若干条件。

在他看来,首先从形式上看,一种充分的价值理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程组”中处于起关键作用的所谓“自变量”的地位。多布针对在经济学说史上某些价值理论滞留在循环论证的“怪圈”而无法自拔的现象,强调价值这种“自变量”是一种独立的、在因果关系上起决定作用的“自变量”,即它不仅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能不依靠其他的“自变量”而得出自己的数值,而且它所体现的某种数量关系不能是价值本身。他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解决了构成价值“自变量”的实体问题,从而再由价值这一“自变量”解开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方程组”。

其次,从内容上看,多布从多种角度论证“充分的”价值理论所应具有的可预测“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在他看来,价值必须转化为在事实上能够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实际的维度”,即劳动因素,而不是主观价值论者所倚重的非实在性的心理或欲望因素。在他看来,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体现在抽象层次上,而且

通过“适当的修正”返回现实世界时,也应正确无误。他针对劳动价值理论反对者所宣扬的关于《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近似法”规律,指出,利润在《资本论》第1卷中表现为第一近似规律所决定的量,它取决于剩余价值量亦即劳动力价值和制成品价值之间的差额;第二近似规律是以第一近似规律为基础的,并且在本质上同第一近似规律并不矛盾;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其生产价格作为“第二近似规律”作用的结果,不仅没有违背价值规定性,而且还赋予它“实在性”的品性。在他看来,价值理论通过劳动和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相联系,因此价值理论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于人们为取得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同自然进行的斗争的不同生产方式之中。

多布尽管在早期发表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进步》(1925年出版)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在后期推崇斯拉法主义中的李嘉图—马克思经济学传统,但他在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仍不失为一位较坚定的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同不同观点的较量中显示其活力,指出,“他是完全正确的。在经过一个世纪激烈的、有时尖锐的、但通常一点也不理解的批评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逻辑结构以及从第一卷的价值理论高度直到第三卷中价格理论的这种分析的展开,一直是完整无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推动力的质量特征表述方面,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其他学派的经济著作未曾提供过的

洞察力,这还能有很大疑问吗?”^①

米克(1917—1978年)是5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发展处于低潮时期的最主要的代表。他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1949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多布指导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先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莱斯特大学从事经济学说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8—1978年)。主要著述有《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1956年)、《重农主义经济学》(1962年)、《经济学和意识形态》(1967年)、《斯密、马克思和后继者》(1977年)。他在《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这部代表作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核心,详尽地考察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有力地批判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家们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歪曲和非难,有助于澄清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解,从而表明:“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在马克思时代是真正的科学,就是在今天来讲也是真正的科学。”^②

《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共6章。前三章主要考察马克思以前的圣典学派、重农学派和斯密、李嘉图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第四、五章主要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在米克看来,劳动价值学说是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工具,但是如果认为它具有一定的伦理或政治观点,那就是把经济学和伦理学混为一谈了。他指出,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结合是马克思价值学说的重大特点,这对发展和理解劳动价值论有着重要意义。第六

^① 多布:《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载《科学与社会》1967年秋季号。

^②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原序,第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章评述了马克思逝世后围绕着劳动价值论所展开的批判和反批判的论争,批驳了帕累托、伯恩斯坦(宣扬价值和价格的矛盾,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变成了“抽象的影象”)、林赛、克罗齐(劳动价值学说不是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工具)、兰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方面所体现的优越性并非源于劳动价值理论,后者是造成前者在许多方面蹩脚的原因)、施勒辛格(劳动价值论重质而轻视量的分析)、琼·罗宾逊(劳动价值理论充斥虚构、神秘和形而上学)等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曲解,认为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清除掉劳动价值学说,倒不如说是从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中清除掉马克思主义。第七章对“边际革命”提出了批评,认为边际理论对经济现实并不能给予更有意义的解释,并探讨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问题。

米克和多布一样,他在《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虽然批评琼·罗宾逊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却赞同罗宾逊的“沟通论”——罗宾逊是凯恩斯主义者中力图主张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人——并应对以“桥梁说”。这表明,米克和多布并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深深打上了新剑桥学派理论的烙印。这也是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新剑桥学派理论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2. 杰弗·霍奇森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纽加塞尔—泰因工艺学院经济学首席讲师杰弗·霍奇森撰写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1982年),是80年代初期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阐释其基础经济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具有鲜明的斯拉法马克思主义

的色彩。

这本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基础性分析,因而并非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剖析,而是集中阐释几个基本的理论范畴,即价值论、货币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剥削和利润论以及资本积累和危机理论。作者强调:这种基础性分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多布、斯威齐、金和鲁宾等人的著作)、左派凯恩斯(包括琼·罗宾逊和卡莱茨基的著作)、斯拉法主义(包括斯拉法和斯蒂德曼的著作)的传统或影响。作者既是斯拉法主义者斯蒂德曼的学生,同时对琼·罗宾逊和卡莱茨基这两个人评价甚佳。霍奇森在“前言”中指出:“假如没有这两位理论家创造性的努力,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就会薄弱得多。”因此,这种折衷主义色彩十足的基础性分析的后果,就是炮制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价值理论和不依赖于劳动价值论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新概念,霍奇森认为这正是该书阐述的内容称之为“激进理论”的原因,并冠之以应超越凯恩斯、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激进政治经济学,用以区别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所谓“教条”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全书共分4篇20章。第1、2篇“基础”、“劳动论”阐述价值理论,目的在于同正统派经济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并接受斯拉法主义关于没有劳动价值论的新价值论观点。在作者看来,主流派经济学缺少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性、实质性和现实性。因此自60年代以来对严重的经济问题束手无策,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遭到挫败。它在“理论”方面蜕变为一种空洞的代数式的形式主义,而在“应用”方面蜕变为一种无生气的天真的经验主义。构造这样一种理论几乎成了

一项单纯的逻辑游戏。作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和方法论有巨大的力量和生命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进程及其内部联系,也为当前对西方发达的经济进行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同时又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很多缺陷,必须依据斯拉法和其他人的著作对其重新估价,并且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口号。因此,作者声称“主要依靠”马克思经济理论,同时“部分”吸收左派凯恩斯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建立了一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价值理论,即价值取决于由实物计算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技术条件,并由此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他承认斯拉法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存在缺陷,但仍然算是一部逻辑严谨的理论著作;它为所有有关价值、分配、积累以及剥削的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框架。他不赞成为斯拉法理论贴上“新李嘉图主义”的标签,理由在于斯拉法和李嘉图的根本区别之一是斯拉法否定李嘉图所维护的劳动价值论。

第3篇“货币”阐述货币及其职能,以及融价值论、分配论与货币论为一体的斯拉法体系。

第4篇“资本主义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概括的分析,侧重点在生产过程、剥削与利润等基本理论范畴。作者提出源于斯蒂德曼的新的剥削概念,既反对主流派经济学否认剥削的观点,又反对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是通过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对货币的剩余的占有;不能通过再分配措施来消除阶级剥削,而必须改造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根本变革而实现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消除剥削。霍奇森的剥削论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而是斯拉法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大折衷的产

物。

霍奇森专辟一章阐述一种系统的和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使之建立在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和罗宾逊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还将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的或传统的经济学作了详细的对照：

项目 \ 类别	激进的政治经济学	传统的经济学
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作为联合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内部一门性质截然不同的学科
分析的主要目标	社会关系社会阶级	事物之间的抽象选择
独特的概念	生产的模式	抽象的个人
课题的目标	说明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	作出经济的预测
分析的原则的可能应用性	仅能适用于一种生产模式	可以适用于各种经济制度
分析的重点	变化,冲突,危机	社会协调,平衡
分析的基本领域	生产	交换
价值论的基础	生产成本	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
主要的课题	劳动过程,货币的作用,经济危机,国家的作用	市场平衡,相对价格,完全的竞争、福利经济学
一般的政策态度	国家的干预,计划,以及(或者)产业民主	放任主义:依靠市场,国家的有限制的作用

霍奇森断言,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最终能推动现代世界摆

脱失业和停滞的厄运,从而过渡(并非平稳的和渐进的)到未来社会。这种理想的未来社会模式或许是国家极权主义形式,或者是阶级合作主义,而最有可能的形式是民主社会主义。

3. 马尔科姆·索耶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取代者》(1989年)是80年代末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力图系统地阐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教科书之一。

作者索耶(1945年—)是英国约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前言中强调指出:该书是为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而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理论基础的、并为高年级大学生编写的激进经济学教科书。在他看来,“激进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的一种多方位的研究”,“所谓多方位则意味着推出多样化的研究途径,其中包括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和斯拉法主义等四种主要的研究方式。我们认为,尽管它们不可避免地彼此大相径庭(并且某些差异会导致激烈的论战),但仍有一系列使其相聚的共同特征。”^①这里讲的“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是一个混成术语,它是用来包括这样一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他们不仅不喜欢主流派新古典派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IS/LM一般均衡说法,而且努力为经济分析提供可替换的紧凑的多种研究方法,因而联合在一起;其思想路线有的可导向马歇尔,有的则通向马克思或卡莱茨基或琼·罗宾逊等。索耶还声明,该书吸收了一大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如艾伦奥维琪和史密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1—2页,Harvester Wheatsheaf公司,1989年版。

斯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81年)、鲍尔斯和爱德华兹的《宽容的资本主义》(1985年)、格林和萨克利的《利润体制:资本主义经济学》(1987年)、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87年)、艾克纳的《论发达市场经济的宏观动力学》(1987年)、雷诺兹的《政治经济学:卡莱茨基及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1987年)等。英国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剥削和价值》的作者杰弗·霍奇森等人也对该书作了审阅和评论。可见,这是一本集大成的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离构筑统一的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毕竟在这方面较之70年代的《反萨缪尔森论》有了长足的进展。

全书共6篇13章。第1篇标题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导论”,主要论述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主题和方法论。第2篇“劳动”则瞩目于生产领域,从这一最能揭示经济本质的领域入手,着重分析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问题。第3篇“竞争、角逐和厂商”,重点阐释厂商、股份公司、垄断资本主义、公司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等概念,批判所谓完全竞争或纯竞争形式,并探讨了关于资本主义运行的合理性等问题。第4篇“价值、价格、工资和利润”,共分三章。其第七章对劳动价值理论史,尤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论战史作了详尽阐述。第八章介绍斯拉法经济学即新李嘉图主义。指出,“它提供了关于经济体系本质性的一种取代性的构想,这种经济体系着重点在于剩余的运用和经济体系的再生性。但用斯拉法理论导出的某些结论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批判。”^①第九章考察劳动收入(工资)、财产收入(利润)以及个人收入和社会集团收入之间的不平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229页。

等问题,重点阐释了卡莱茨基、卡尔多和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对利润率变动规律的不同诠释。第5篇“国家”单辟一章即“国家政治经济学”,探讨20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国家行为的扩张,剖析关于国家行为目标及作用的各种见解,其内容涉及“公平政府论”、“新权力论”、“福利国家论”以及以阶级分析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行为主要服务于资本家利益,并不存在所谓为社会利益运作的“公平政府”。第6篇“失业、增长和失衡”涉及宏观经济分析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平等关系和不平衡发展问题,着重探讨失业、通货膨胀、投资、技术变化和增长、经济活动的周期和长波运动、中心和外围、发展、不发展和负发展等问题,强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存在、持续和再生产,而不是主流派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竞争、普遍均衡、公正、平等和效率,并着重批判所谓市场力量(特别是竞争)减少不平等趋势而不是加强这种趋势的错误观点。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

在作者看来,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具有多方位和多角度的特点,其“研究重点是收入分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学(并非静力学)性质、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利用等一类经济问题”^①,并大体划分为若干主题。

第一个主题强调应注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质,其中包括社会制度组合(如贸易同盟的作用、巨型股份公司的规模、各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关系类别以及国家行为方式)、社会法律结构以及各个个人和组织的特点。在作者看来,“激进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1页。

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制度组合(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的不尽相同的状况或方式,以及这些不同的组织怎样影响经济行为及其运行。”^①

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剩余(Surplus)以及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间的不平等关系。作者认为,利润和地租应起源于工人的“剩余”即产出超出消费的剩余产品。而对剩余的支配权容许资本或土地的所有者榨取剩余,而并非源于新古典学派津津乐道的“节欲”或“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哪些集团支配剩余,谁能作出投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因此关于投资和增长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社会形态或制度,经济发展形式无疑也受其影响或制约。

增长和发展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也是第二主题的直接继续。新古典学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偏重于改进现有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应包括额外资源的创造(通过投资、创造性研究、培训和教育等)、各种各类的变革(新产品、新工种、新劳动组织形式、新产业部门),因而具有不平衡增长(而不是平衡增长)性质。

第四个主题是注重社会阶级分析问题。与主流派经济学把分析标准定格于个人标准正好相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重视阶级分析标准,认为阶级包括不同利益的集团,利益及其冲突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关于劳动过程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就表明这一点。

第五个主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1页。

占有权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收入、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在各个个人和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方式就强烈体现着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应视为一种产生和维护不平等的经济制度”。^①关于这种不平等的探讨贯穿全书。第二、三章涉及劳动力的不平等,第九章考察社会各阶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十三章使用机制这一术语来探讨由此造成的地区及国内的不平等,以及市场机制是否导致削弱还是强化不平等的问题。这与主流派经济学形成强烈对照。后者认为,分配问题——设定用原子式个人社会的术语来表达——应完全置于交换领域中予以解答,并且构成分配问题分析的基础应是无产阶级社会。

第六个主题是对权力问题的考察,其中包括考察生产资料所有权所赋予的资本家支配工人的权力(见第二章“劳动过程”)、国家权力(见第十章“国家政治经济学”)等。

与第六个主题相联系,贯穿全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国家作用、市场作用与企业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与新古典经济学恰恰相反,激进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将加剧而不是减缓各个个人、性别、阶级、地区和国家之间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不平等不在此例),资本主义经济表明,主流派经济学倡导的均衡分析方法难以解释这种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遵循完全竞争,而是在寡头垄断条件下竞争与合作的混合物,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并不是市场运行的一个经常结果。他们的结论是:“市场机制是众多资源配置制度中的一个,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很多资源也是在企业范围内分配的,或由政府或由其他方式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17页。

(如慈善事业)分配,任何特定的市场机制都只能在法制范围内运行,并且有一套特殊的制约市场机制运作的政治的社会安排”;^① 政府和市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市场如何运行依赖于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建立保证合同实现的法律框架到政府承担发展职能”,“政府的干预形式通常是改变与市场有关的结构,它包括行业的重构(如鼓励合并,削减生产能力),改变市场双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就像通常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那样,在这个市场上行业关系法、政府在行业争端中的干预意愿等帮助确定力量的平衡)以及很多其他方式。在现代工业化社会里,问题不是政府该不该卷入经济,而是政府如何干预,为谁的利益干预经济。”^②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是构筑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但并未建成一个统一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可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和起点,塑造激进政治经济学体系已成为某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共识。^③

三、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特点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区别于西方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激进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深受新剑桥学派的影响。前已

① 索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451页。

② 同上,第452,453页。

③ 《新帕尔格雷夫辞典》(1987年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指出:激进经济学派已将构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济学(从历史到一般均衡论)已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高度予以改造,使用的方法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起点,同时将古典马克思主义重新阐述成现代的激进世界观”。

叙及的多布、米克、霍奇森、索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学派的影响。因为英国是新剑桥学派的大本营。西方文献大多把新剑桥学派视为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有的干脆将其划入激进派或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范畴。

新剑桥学派(New--Cambridge School)又称“凯恩斯左派”、“新李嘉图学派”、“意大利—英国剑桥学派”，或特指“后凯恩斯主义”、“斯拉法主义”、“后斯拉法主义”和“斯拉法马克思主义”。它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孕育出来的，这一危机既包括以滞胀为特点的经济危机，又包括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危机。这一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挤入学术观点庞杂纷繁的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光谱带。因其既同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对立，又同正统的凯恩斯学说对立，并且力求沟通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之间的联系，因此，它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力图进行重新评价的一种最为激烈的形式或派别；又因其“温和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它的政策建议和实施纲领又不公开要求在制度结构上进行根本性改造，因此，与超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限的左倾激进派有很大区别。这一学派成员至少是激进派中的右倾经济学家，其成员有琼·罗宾逊、尼古拉·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卡莱茨基以及斯蒂德曼等。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及其基本特征有：

(1)新剑桥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各主要流派的论战中已成为主流派经济学激烈的批评者和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它不仅号召彻底推翻包括新古典综合派在内的新古典派体系，而且强调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已经破产，主张进行“第二次凯恩斯革命”，重新通读、审查、修复、改造和革新凯恩斯理论。

因此,他们公开地坚决地抛弃新古典派体系的主要理论基础,即边际生产力论和边际效用论——主流派经济学关于生产、利润形成、资源利用、价格形成和产品分配的理论,都是在这—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提出自己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一书中重新检验和批判了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修改和发展了李嘉图的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促成了新剑桥学派即新李嘉图学派的形成,并引发西方学术界对边际主义学说的重新检验,其观点还受到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誉。该书致力于建立一种模拟的标准商品和标准生产体系,即投入产出方程组——既不是从“需求”或“边际”概念出发,也不是从价值出发,而是从商品生产的物质数量关系出发——用以考察技术、相对价格、工资和利润率的运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解决李嘉图遗留下来的关于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难题;强调商品之间存在着由一定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即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例,并以此来决定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价值在价格的这个决定过程中成了多余的中间环节或范畴;并且强调,在标准体系中,不论商品价格如何变动,利润率是作为商品的数量之间的一种比例出现的,这意味着一旦知道由生产技术所决定的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例和标准产品中支付工资的部分,利润率就可以确定,从而被认为解决了多年来未被解决的所谓转形理论中价值与生产价格的矛盾问题。

传统的或主流派经济学是不屑于研究由谁创造价值,以及价值如何公平分配之类的问题。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戈尔登在1988届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报告中也不得不对此作了详尽无遗

的批评。按照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他们把价值视为主观的概念,而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按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来取得应得的报酬,企图用以证明这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法。新剑桥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它是以一种纯粹的循环推理为收入分配不均作辩护的理论;强调利润和工资呈反向变动趋势,利润首先取决于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其次是资本家凭借财产所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货币工资率大多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是对立的,决非公平合理,这种失调必然引起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引发通货膨胀等弊病。新剑桥学派在这里实际上已把资本主义看成是阶级对抗的社会,认为不考察包括制度本质、所有权在内的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就根本无法弄清楚国民收入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但是,他们把资本主义一切弊端仅仅归结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实际上是以权力支配收入或生产技术决定收入理论取代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因此,探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在经济增长条件下的变动趋势,解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病症,寻求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政策方案,用以摆脱当前资本主义的困境,大体构成了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体系。毋庸置疑,收入分配理论也就成了新剑桥学派理论的核心理论。

(2)新剑桥学派力图推翻主流派理论体系,但自身体系却具有折衷主义大综合的特征。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尔弗德雷·艾科纳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指南》(1975年)一文中指出:“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成员是经济学内部几种持不同意见的学派的联合,即美国制度学派和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以及

凯恩斯亲密同事们的传统的联合。”他们继承李嘉图的价值—价格理论的传统,故称为新李嘉图主义或斯拉法主义。他们重视制度分析,试图联系社会经济制度中各种体系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

此外,他们中间一些人如左派凯恩斯领袖人物琼·罗宾逊还主张从马克思那里吸取营养。罗宾逊(1903—1983年)出生于英格兰坎伯利,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1年)、《资本积累论》(1956年)、《发展与不发展》(1979年)、《经济论文集》(1979年)等。罗宾逊在凯恩斯主义者中是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人,因而被称为“凯恩斯左派”、“马克思的同情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者”。一方面,在她看来,劳动价值理论充斥虚构、神秘化、教条主义或形而上学,是荒诞的咒文,是一团不值得去花费心思解开的“乱麻”,会引起很多混乱和争论;价值转化为价格的问题是一种虚构,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统一起来的尝试是纯粹的形式主义,无非是徒劳地以魔术师的伎俩把平均与总和颠来倒去;《资本论》第一卷是一种应予抛弃的简单的教条主义,应从第三卷倒过来进行分析,即应以第三卷的价格论为出发点,才能使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走上没有矛盾、首尾一致的道路。但是,罗宾逊另一方面却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而且认为“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已经离开了传统的正统派而向马克思发展”,“双方如不沉湎于无知的谩骂中,一定可以由于试图理解他们的相互批评而有所得益。”^①她力求“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指出:

^① 罗宾逊:《论马克思经济学》,第2,8,2—3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马克思的理论,或至少是马克思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的某些理论,同样是凯恩斯所必需用来补充的,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是马克思所需用来补充的一样”,“凯恩斯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学院派经济学家之间,现在头一次出现了足够的共同立场,有可能进行讨论。”^①

因此,新剑桥学派的发展状况表明:它已初步形成区别于其他学派的“范式”(Paradigm)或理论框架,正处于以大综合为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但还远未形成一种定型的严谨的理论体系。

(3)新剑桥学派提出一套激进的改良主义纲领和政策主张,其实质是主张和完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

“斯拉法马克思主义”派是新剑桥学派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此术语源出何处尚难确证。西方学者米歇尔·德·弗鲁依在《每月评论》(1977年第7期第29卷)撰文在《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陈旧性》中指出:“以前,宣称信奉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又放弃劳动价值论会被认为是一种褻渎……现在,这种做法越来越多,许多明智的青年左派经济学家们论证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作为成功的象征,他们有自己的名称: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斯拉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要重建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例如他们倡导商品价值论,但这种理论也并非彻头彻尾地抛弃劳动价值论,而是把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米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半个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40年代,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斯拉法。他强调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模型和马克思体系的一致性,对斯拉法有过多的溢美之词,指出:“斯拉法模式基本上作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学说预定要作

^① 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第13,5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的同样的一套工作……在质量方面,至少说可以争辩的是,斯拉法的程序所反映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试图用他的劳动学说来表达的这种观点:价格和收入最终是由生产关系来决定的。但斯拉法的程序比马克思的程序更为清楚和有效。”^①他并且认为新剑桥学派“复兴”了马克思经济学,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建立某种桥梁”,从而“有助于开辟一个两派共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争。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的和更有用的分析。”^②《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85年)的作者配克是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用斯拉法主义构筑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霍奇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而撰写《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的斯蒂德曼则是新斯拉法主义者和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急先锋。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区别于西方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激进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深受英国“社会主义”传统(曾首倡李嘉图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党社会主义等)的影响,从而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亦即市场社会主义(Marketing Socialism)思潮。并在8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的“市场马克思主义”派别。其突出特征是证明运用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这种激进的“异端邪说”,不仅与资产

①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2版导言,第50—51页。

② 同上,第3页;原序第5页。

阶级正统或主流经济学相对立,并且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乃至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是早期激进经济学家或老左派)相对立。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是从激进派中分化出来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分支或变种。

市场社会主义又称之为兰格—勒纳机制(Lange—Lerner Mechanism)、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T·科瓦科克语)、竞争的社会主义(O·兰格)、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H·迪金森)、分散的而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C·林德布洛姆)、社会主义的经过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M·伯恩斯坦)、竞争解决社会主义(A·柏格森)、多元化的社会主义(A·格鲁奇)、自治市场社会主义(W·布鲁斯)、合作的或劳动者自治经济体制(P·格雷戈里、R·斯图尔特)、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B·沃德)以及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等。西方学者一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既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①其主要理论特征是“中性机制论”或“资源配置手段(工具)论”、“联姻论”、市场主导机制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综合论等。并强调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从而宣扬折衷主义的“趋同论”。

英国社会主义或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源起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更早一些可上溯到英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87年)，“市场社会主义”辞条。

国早期制度主义者琼斯(1790—1855年),而韦伯夫妇的《工业民主主义》(1897)是英国式历史—制度学派的早期代表作。20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亦即英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并在40年代后半期亦即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占据主流派经济学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合流,形成一种混合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早期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奇特的混合物。这种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①收入社会化。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平等,从而提出分配的公平合理问题,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②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③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有一个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国有化产业边际成本定价所反映出来的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80年代的英国处于各种思潮迭出、并为医治根深蒂固的“英国病”而在理论上寻找出路的思想混乱时期。8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论战。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有伦敦经济学院埃斯特林等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牛津大学米勒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年)、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年)、福比斯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何人的选择?》、霍奇森的《民主经济:关于计划、市场与权力的新观点》以及萨里大学的阿贝尔和布里斯通大学的温特等人的著述。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全

新的界定,并提出了著名的旨在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紧密相连的“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论,从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

但是,这种英国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改良主义的,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工党政府身上,而并不触动其资产阶级政治结构及其基础。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战后实施国有化政策的工党政府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在某些部门(如铁路、航空、发电站、矿山)建立一批国有化企业或公共企业。显然,这是一种混淆资本主义国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趋同论(另一种趋同论则是把市场机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举措,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流)。无疑英国国有化企业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有公有(共)财产,关键在于应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标准,区分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判断公有财产的主人即国家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实际利益。毋庸置疑,英国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也注定不会是一剂根治英国病的灵丹妙药。资本主义可以学习或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机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所有制的“国有化”、“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分配制度的“合理化”或“收入社会化”,但它在实际上不可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可能放弃剥削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否则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

资产阶级传统或主流派经济学对市场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在早期有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

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中,对早期社会主义者大打出手。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1920年)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缺陷是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及其市场价格,因而不能为生产要素规定正确的价格,从而就没有经济核算所需要的确切的选择指数——资源配置必须进行精确的经济核算——因而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他进而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不能兼容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制造的”,“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①

在后期则有伯格森、施莱费尔、维施里等人。他们以变“否认”为“贬损”的手法,强调资本主义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强于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伯格森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再考察》(1967年)恐怕是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竞争解决社会主义”(Competitive Solution Socialism)等术语的文献之一。该文重点考察了南斯拉夫,将其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典型加以肯定,并在结论部分把资本主义制度同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作了对比研究。声称:市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固然优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社会主义,但却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兰格也承认“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危险”,尽管兰格总是辩解性地作出社会主义体制在许多方面(包括效

^① 米塞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第64、6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率)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断;但是,资本主义正在宏观预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技术、计算机计算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改善,其功能已大大优于 30 年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人们怀疑上述这种论断即使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未必是正确的,尽管这种社会主义的市场变体有可能会改善社会主义的运作”,并且“这类社会主义的市场变体所作的改善也绝非是绝对有效的,仅仅具备相对的局部的性质”。^①因此,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1975 年)一书中,宣称伯格森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再考察》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明确无疑的“讣告”。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施莱费尔在 90 年代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民主政府是追求政治目标抑或经济效率目标,成了这次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攻击民主政府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扩大经济效率,甚至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府更缺乏效率。在他们看来,民主政府无论在何种制度下追求的总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效率目标;而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由于掌握了更多的财富,从而更有能力追求政治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就更缺乏效率。而以“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的第五代”自居的 P·巴德汉等人则认为,施莱费尔等人的观点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私有财产是唯一能保护经济不受政府无经济效率的干预的制度;但是,没有理由认为除了私有财产之外,别的制度就不能用来保护经济不受政府的不适当干预。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许多人,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如多布、

^① 参见《市场社会主义的再考察》,载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75 卷第 5 期(1967 年 10 月号),第 670—672 页。

斯威齐、巴兰、曼德尔、贝特兰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市场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主义’一词从措词上讲是矛盾的;东欧的改革者如今即使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在逐步离开社会主义的目标。上述看法博得西方和第三世界部分国家‘新左派’的极大支持。”^① 贝特兰指出:东欧国家的现实(恢复市场调节功能,放弃社会主义计划)与马恩理论之间有条鸿沟,这是倒退到实行阶级统治的道路,并且最终是资本主义复辟。^② 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斯威齐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武器”,尽管市场关系(当然意味着货币和价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始终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一种危险。^③ 新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则认为,苏联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也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存在着加强市场因素的压力,这种压力导致资本主义复辟。^④ 由此看来,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大多把市场视为不祥之物,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根本性变革,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则鼓吹以市场主导机制论为标志的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对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的吸收以及两大社会制度的合理因素的综合。

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其中包括一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思想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一致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广泛引入商品关系,保留市场,同时用计划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1993年初,美、英、法等国学者开展了关于社会

^① 参见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② 参见贝特兰:《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巴黎1970年版。

^③ 参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69年3月号。

^④ 参见《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第276页。

主义新模式的国际性讨论。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主题,刊登了编辑部按语以及部分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是从20余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共产主义”之后能否出现社会主义?》(约翰·罗默)、《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弗·布洛克)、《经济民主——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戴·施韦卡特)、《市场的社会化》(迪·艾尔逊)、《从自治到联合社会主义》(托·安德列阿尼、马·费雷)。这些文章对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理论特征作了新的概括:①这一模式既远离现实但并非空想,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更新而不断变化;②它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③它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经济理论、新古典学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④主张吸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材料。

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约翰·罗默,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经济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在计划制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他提出的拯救方案是实施市场社会主义。其特征是: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②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亦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但不能与货币相交换;③企业利润平等地分配,劳动者凭证券可以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④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所有制,而是平均主义。可见,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具有空想的性质,但是,这一学派的某些观点为我国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第四节 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国际性思潮,美国和英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在其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缩影。但是,英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也各有其具体的特点。

一、西欧大陆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产生于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其诞生地西欧大陆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前者主要是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研究重点集中于哲学和文化领域。后者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学说,也较少涉及经济领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才在改革的旗号下开始了理论研究方向的重点转移,转而注重政治经济学,这是西欧大陆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活动不如美英那么突出的原因之一。但仍然涌现出一批值得称道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这是

西欧大陆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法兰西学派或社会学派在一些西方文献中被划入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他们对传统新古典主义的过分抽象和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机械论的本质,表示不满;他们一方面承认金融寡头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但又宣扬国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起仲裁者作用,即根据“社会福利”的利益来调节力量对比;而学者的职责是制定未来的无冲突社会的模式,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不断地向更好更入道的社会进化,而生产将不按最大利润原则进行,而是从用大写字母写的人的利益出发,亦即从某种完美人类的抽象思想出发。其代表人物有弗郎索瓦·佩鲁、奥雅克、马夏利、布洛克·勒奈等。

法国共产党和《经济和政治》杂志在1966年曾召开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国际学术讨论会,1971年又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1年)。这本书和皮埃·雅莱的《世界经济中的第三世界》(1966年)、《70年代的帝国主义》(1973年)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作了详尽的探讨。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曼得尔的《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他在1962年发表颇有影响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力图以《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为轴心,阐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并提出著名的长波理论。

二、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西方文献关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并不严格,并大多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激进政治经济学中占主体地位。并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的研究领域侧重于马克思经典著作及其基本理论,这是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这一现象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日本是世界上比较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国家之一。第一,从历史上看是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亚洲国家,1927—1933年日本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本),20年代末已涌现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其次,他们在长达10年(始于1927年)的关于日本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形成了讲座派(Kōzaha group Marxists)亦称正统派以及劳农派(Rōnōha group Marxists)。前者原隶属于共产国际日本支部,后因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一书而称为“讲座派”,其主要成员有山田盛太郎、野吕荣太郎、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聪等;后者大都是进行独立研究的知识分子,因出版《劳农》杂志而得名“劳农派”,其主要成员有山川均、猪俣津南雄、向坂逸郎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寂多年的日本激进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得以复兴和繁荣。“日本经济学会”即50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组织,已拥有1000多名会员。讲座派和劳农派逐渐出现趋同的倾向,并且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如从讲座派中分化出来的以井汲卓一为代表的“结构改革派”,以及从劳农派中分离出来的以有泽广巳为代表的“实践经济学派”;此外,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市民社会论派”,以及战后形成的最具影响的、以宇野弘藏为代表的“宇野学派”,其代表人物有铃木鸿一郎、岩田弘、大内力、楫西光速、大岛清、伊藤诚等。这一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在日本社会党左翼年轻一代和一些激

进的学生和工人集团中有较大影响。但由于“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田石介、向坂逸郎语),在80年代,其内部也出现重新检讨和审视宇野理论(尤其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三阶段学说)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40多年来已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400多种,论文4000余篇。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高校普及程度超过欧美国家。《资本论》(或称《经济原论》,始终列为日本高校的必修课程。

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有:

河上肇(1879—1946年),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0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4年获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1917年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捕入狱。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大纲》(1928年)、《〈资本论〉入门》(1932年)等,对马克思理论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成长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都留重入(1912年—),194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参与马克思主义刊物《科学与社会》的创刊工作。曾任日本片山内阁经济稳定本部综合调整委员会副委员长、一桥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56—1957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期间,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计划化理论”。他自称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有《都留重入著作集》(13卷)等。其中,他针对日本面临的经济困难所做的调查和对策,即第一次《经济白皮书》(1947年),对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变了没有》(1958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系由他与

加尔布雷思、斯威齐、丁伯根等人所组织——研究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产物，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争论，并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一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都留重人经济思想体系的特点是力图沟通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联系（他在《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文中提及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五点相似之处），批判传统的经济学，提出和阐释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经济问题。此外，资本主义“变质”理论是其现代资本主义改革方案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他的“剩余社会化”学说，其中包括他以“剩余形式”来判断社会性质，并主张通过改变“剩余形式”来导致资本主义“变质”等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使“剩余”采取利润形式而从属于资本；国家和社会可以采取“流量”（即利润）的公有化，即通过逐步“侵蚀”资本家利润的形式（如“政府管制价格”、“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征收累进率更大的赋税”和“实行最低工资法”等），使其转化为社会所有的剩余，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化社会。都留重人的激进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但其理论实质是改良主义的“分配决定论”。

宇野弘藏（1897—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或新马克思主义者，宇野学派创始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曾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政法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政策论》（1931年）、《经济原论》（1950—1952年）、《〈资本论〉50年》（1970—1973年）、《宇野宏藏著作集》（1973—1974年）和《危机论》（1976年）等，形成被称为“宇野理论”的经济学体系。其特点是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三阶段”理论。这一理论首先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原理论”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并以“纯粹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而以表明资本主

义世界发展过程的“阶段论”为中介。其次提出“阶段论”，即“发生期”（重商主义阶段）、“成长期”（自由主义阶段）和“没落期”（帝国主义阶段）三大阶段，并涉及对财政学、农工商经济政策、法学和政治学等多项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各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最后进入旨在阐明各国政治经济动向及其具体发展现状的“现状分析”阶段，其研究对象是没有终结的纷繁复杂的具体过程。宇野弘藏一方面推崇马克思经济学说。他在《经济原论》“序言”中指出：“作为能够系统阐述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说能够从根基上动摇《资本论》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力图删除《资本论》中“非社会科学的部分”和意识形态要素，“真正”把马克思经济学从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而提出许多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相悖的理论。例如他在1953年10月就已撰文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此外，伊藤诚、森岛通夫（又名毛利西马）和置盐信雄等，也是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日本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积极参加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的国际讨论。伊藤诚是宇野学派的一员干将，他和宇野宏藏一样，推崇马克思经济理论。《价值和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集》（1980年）一书中，阐释了他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资本主义这条死胡同灰暗的前景不等于人类本身发展的末路。毋庸置疑，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一代日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企图从面临的危机中找出另一条出路。马克思经济学最低限度可为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特征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的价格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

济的历史局限性和内部矛盾方面,具有可观的潜力。”^① 斯拉法主义者斯蒂德曼以所谓“纯联合生产条件下出现负价值”为由,以此向马克思的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提出挑战,因为剩余价值(surplus)不可能是负数。伊藤诚运用形式和内容这对范畴,强调流动领域价值形式的变化对价值决定(内容)的反作用,否定流通领域产生负价值的可能性。但对生产领域是否产生负价值的问题未作深入的分析。同时,伊藤诚在探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问题上,一方面承认《资本论》实际上创立了一个完全独特的崭新的危机理论;另一方面又有不完善的一面,必须结合现实的历史条件加以丰富和发展。但是,他把马克思危机理论归结为消费不足型危机理论是一种曲解。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则对斯蒂德曼的所谓没有劳动价值论的新剥削理论作了较有力量的批判,但结合联合生产和多种技术选用等新情况,却主张在不脱离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框架内,运用线性规划方法,修改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剥削论,强调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的平均劳动耗费量决定,而是由最小劳动耗费量决定。并用剩余劳动概念取代剩余价值范畴。这说明他们在关于价值问题的论战中采取改良倾向的折衷主义的手法,并且秉承琼·罗宾逊的“沟通论”,力图在马克思价值论和凯恩斯就业论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由此可见,伊藤诚等人虽然程度不同地接受马克思理论,但又力图“重新改造”和“塑造”马克思经济理论。这正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① 伊藤诚:《价值和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集》,第7页。伦敦 Pluto 出版社,1980年版。

三、第三世界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落后国家,面临着如何解决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欧美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传统的发展理论(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发展理论),着重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又不同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激进主义发展理论或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因此,研究重点侧重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第三世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或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代表人物有创始人即“老左派”巴兰,以及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希腊的阿吉里·伊曼纽尔,圭亚那的沃尔特·罗德尼,巴西的鲁伊·马里尼、多斯·桑托斯和费尔南多·卡尔多索,秘鲁的阿尼瓦尔·基哈诺,智利的恩佐·法莱伦和欣凯兰姆,曾在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的大学任教的弗兰克,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等。

他们提出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但有其共同的特征:

(1)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因此往往被称为宣扬“新帝国主义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

国主义论”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或“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2)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采取批判立场。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过程；把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看成是适合任何国家和任何经济行为的“单一的经济学”，否认各发展中国家发展类型的差异性；并把运行机制中的刺激—反应机制、替代和弹性机制、价格机制同竞争与均衡机制联系起来，用以考察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资源配置过程和经济发展被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们描绘成在上述诸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一个不付出多大代价过程的、平滑的、均匀的、持续地从事边际调节的均衡过程。但是在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看来，这是把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上，因而是一种主观臆想，第三世界国家至今大多处于依附地位和落后状况就是一个证明。而现代化理论把社会发展简化为“传统”（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发展阶段，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3)应把不发达问题置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不发达的根源在于这一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外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而外围不发达国家由于剩余不断流向中心发达国家而陷于贫困的陷阱。

(4)提出激进的政策主张：或者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体系，这需要通过革命；或者执行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脱钩”的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或者外围国家自主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本国技术，订立国际商品协定，最大限度减少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关系，等等。

第二章 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

激进政治经济学人士是基于立场基本一致而走到一起的，但由于内部派别纷繁，理论渊源庞杂，本身又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致赞同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框架、政策主张或社会模式。而仅能就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及其理论或政策分歧进行考察和剖析。

第一节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抨击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罪恶及运行机制的弊端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前者涉及阶级结构、阶级状况、城市贫困化和就业不足、劳动异化、性别和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犯罪等问题；后者涉及经济滞胀、收入不均、经济危机、国际分工剥削、跨国公司扩张等问题。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著述甚多，研究成果突出，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本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要么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要么是资本主义制度加剧的，出路在于“改造”现行社会制度。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费兰克林和泰伯强调指出，主流派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起点，是在

现行市场结构和经济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提出的问题则是如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实现各种目标,才能满足各种需要,而这关系到重新塑造不同的国家方式、不同的劳动过程、不同的团体观和邻里观、不同的社会关系、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在商业贸易、私人财产及其相应的特权和利润失去它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前,这些变化是不能实现的。

一、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亦即穷人为什么穷;什么力量使得贫困根深蒂固,又有什么力量能够根除它?这是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及其对立面正统派经济学家在内的不同领域、不同派别、不同政见的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焦点。

1. 人力资本论(Human Capital Theory)

这个理论是由正统派经济学家提出的。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将个人的教育、技能以及相类似的变量概念化为“人力资本”。在他们看来,人力资本(个人的技能和知识)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如果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培训,劳动技能很低,那么他的边际生产力就低,因此收入也低。由于人力资本少,他们仅能获得可怜的收入。黑人人力资本较白人少,因此收入也少。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从所谓“平等的”工资决定机制的角度来解释贫困的不平等的。这种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工资水平差异论”的辩护性在于:它强调收入差异和贫困是合理地基于每个不同的劳动技能之上的,它与先天

的禀赋和后天不充分的教育和培训有关,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

2. 双元劳动市场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这个理论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目的是用以对抗正统派人力资本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赖特·巴基、克拉克·克尔、约翰·邓洛普、迈克尔·皮奥里、彼得·多林格、戴维·戈登、理查德·爱德华兹和迈克尔·赖克等人。在他们看来,人力资本理论是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及边际生产力的基本假设以及均衡分析的方法,由此引出关于“单一工作市场”的假设,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过剩与短缺自我补偿、自我均衡机制的假设。而这种假设不符合充满自由流动障碍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现实。与此相反,现实劳动市场的特征是有限的流动性,同等人力资本的不等报酬,持续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剩余与短缺。他们指出这是因为现行劳动市场是一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竞争市场,这归因于愚昧、缺乏流动性、工会及企业和企业协会的垄断权、资本家政府对从财政政策到劳动法的干预、国际障碍,以及多元的被分割的劳动市场。

正统派的单一自由流动市场被激进派分割为两大市场,并进一步发展成三大市场模型。第一市场的“上层”,由高科技的、职业性的、经理性工作组成,这些工作包含了工作行为准则的内在尺度;第一市场“下层”,由高收入的工作组成,包括在详尽的工作规则和行政程序下从事的常规性工作;低收入的第二市场,在那里,工作具有严格的人身监督,并且从本质上讲是非常规性的。与三种划分相对,并列了三大阶层“亚文化”形式:中等阶层、工作阶层和低收入阶层;而每一亚文化形式都对特定劳动力市场部分的工作有“支持力”,使每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都具有

稳定性和常规性,因而丧失了劳动的自由流动性。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其中包括制度主义者)以此击碎了人力资本论赖以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把贫困的根源引向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

3. 产业分割论(Industrial Segmentation Theory)

这个理论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巴里·布卢斯通、霍华德·瓦赫特尔和兰德尔·霍德森提出的,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双元劳动市场理论更加系统化。

他们对人力资本模型和双元劳动市场模型作了对比研究。人力资本模型有四个特征:①工人们能够并且确实能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以使其收入最大化;②可观察到的收入水平的不同只存在于人力资本不同的情况下;③一个工人的人力资本越多,他的收入也越多;④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工人的工资是相同的。无疑,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单一劳动市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双元劳动市场模型也有四大特征:①工人不能从一个工作(市场)换到另一个工作(市场)而去实现收入最大化;②即使人力资本相同也可能存在明显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③较多的人力资本不一定必然引致收入的增加,因为个人缺乏流动性来找到那些最充分实现他们人力资本价值的工作;④不论在市场内或者是两类市场之间,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工人可能收入不同。这种模型表明存在着相互分割的多元劳动市场,而每一市场中不同的个人相互竞争。无疑,这种市场存在着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或制度因素。

并且,他们还进而详尽分析了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产业分割局面的阻碍因素。一是流动性的个体障碍:不充足的

教育,不充足的培训和技能,工作表现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地理流动的无效性,职业流动的无效性;二是流动性的产业障碍:雇佣与工作中的种族歧视,雇佣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进入的工会障碍,完全以教育水平作为决定工资的手段;最后是流动性的社会障碍,即地理迁移的高费用,自由流动的个人风险,高的总失业水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动市场信息的缺乏。

霍华德·瓦赫特尔是激进的双元劳动理论的集大成者,并构筑了关于贫困一般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关于贫困的三个制度性决定因素:社会阶级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而贫困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制度性因素正常作用的结果,并且主要是这三个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如布卢斯通所概括的那样,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非均衡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寡头垄断和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他们看来,社会阶级结构这一制度因素意味着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此与贫困无缘,因为资本所有者靠股票和债券获利,而不必被工作能力和技能所限;生病和年老并不构成对资产阶级生计的直接威胁。而恰恰相反,工资劳动者则严重依赖他们持续的健康和技能,生病、怀孕、残疾、缺少流动——总而言之,任何降低工资者工作能力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收入的消失和向贫困地位的转移。

第二个制度因素即劳动市场结构的层次化。六类贫困人员(老年人、城市工作穷人、失业者、病残患者、农村工作穷人,以妇女为首的单亲家庭)构成以低工资和随时解雇为特征的第二市场的总和。他们不可能向具有高工资、高效率特征的第一市场转移。

政府是第三个制度因素。政府应对贫困的形成和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广义上讲,政府资助有钱的企业家,有产者和养家糊口者两者之间,仅规定很小的税收差别;从狭义上讲,政府行为至少是三类贫困人口(城市工作穷人、老年穷人、农村工作穷人)加剧贫困的重要因素。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这三大社会制度因素的联合作用,使贫困根深蒂固;并且,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机构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体系是不断地产生和复制贫困的根源。

激进派的贫困理论不仅批判了正统派的人力资本理论,并且批判了所谓加强劳动的自由流动会消除贫困的观点。理由在于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努力本身并不能导致贫困的消失。自由流动仅能达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种族和性别不再构成工作进入的障碍,并且好的工作将有可能给予那些拥有较多知识、较高技能的人们。但是,大量的低工资部分并不会减少,贫困并不会根除。更确切地说,贫困只是实现了在种族上、性别上的平等。并且他们还对美国政府应付贫困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行分析批判,强调要解决贫穷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调整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分化”情况。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贫困理论尽管有某些缺陷,但它确实在许多方面击中了正统派贫困理论的要害,以至于保罗·阿特韦尔在《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中,强调指出:“这一理论显著的成功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对手的胜利,是向建立学术霸主地位迈进了关键的一步。”^①

^① 保罗·阿特韦尔:《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第92页,Rutgers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贫困问题的代表作有瓦赫特尔的《激进派视野中的贫困问题》(1971年)、《美国资本主义和贫困:反论抑或矛盾?》(1972年)、皮奥里的《双元劳动市场》(1970年)、多林格的《国内劳动市场和人力资本分析》(1971年)、布卢斯通的《有工作的穷人》(1968年)、《低工资产业和工作穷人》(1968年)和《低层经济: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穷人》(1970年)、爱德华兹、赖克和戈登的《劳动市场分割》(1978年)以及阿特韦尔的《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等。

二、歧视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种族与性别歧视,人们与其工作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异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激进派着重批判主流派经济学家在歧视问题上的辩护理论。后者所持的理由是:在纯粹的竞争条件下,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资本家最终将因其单位成本高而被逐出企业经营,因此,竞争将结束种族歧视,把黑人的工资推向愈益接近白人工资的水平。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分析了导致歧视的原因:一是社会反复灌输,其中包括教育、大众传播媒介和政治领导人的灌输;二是由于歧视在支持维持现状方面起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体制直接地和间接地受益。例如:种族主义的经济作用之一是制造一支唾手可得但又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劳动力队伍;黑人在美国既作为内部的侨民,又作为工人而遭受剥削;如今,黑人构成全部工业劳动力的1/3,在低技术的体力劳动者中占的比例更高;种族歧

视使他们“安分守己”，作为缺少技术与经常失业的工人的大型储备队，以便在对劳动力需求高涨时用于压低工资水平。种族偏见使这种歧视具有合法的根据。因此，在这方面，种族歧视只是为攫取额外利润提供另一种辩护依据，而这种额外利润是从牺牲美国工人阶级中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种族主义的另一个政治作用是分裂受压迫者以便使权贵集团得以巩固统治。此外，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特别有用的工具。例如，英国长期以来尤其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资本家又是如何从性别歧视中得到好处呢？很显然，他们利用它作为向妇女支付低报酬的借口，更重要的是，性别歧视的偏见在男女工人之间造成分裂，使得组织强大的工会变得更为困难。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巴巴拉·德卡德的《妇女运动》(1983年)、米切尔·赖克的《种族不平等，经济理论和阶级冲突》(1980年)以及刊登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5年秋季号)上，总标题为《种族与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一组文章。

三、异化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三种表现：

第一，工人为其产品所支配。例如：工人生产出产品，它们被拿去变成资本，然后用这些资本雇用工人。

第二，工人与他们的生产活动分开。工人并不拥有他们工作所依赖的生产资料，也不拥有他们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他们的生产活动只是变成满足自己需要之外的东西的手段。工人变得非人化，成为为别人生产利润的一部机器里的一个齿轮。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与“人人为自己,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道德有关。并且,人们中的这种异化是与人吃人的竞争相联系的,从而使得美国充满着犯罪、娼妓、赌博、少年犯罪、酗酒、吸毒、离婚、凶杀和精神失常等等。

激进派把异化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并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使异化问题大大恶化。另一方面,他们预言:一个异化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这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力图用异化理论来诠释当代无产阶级受剥削地位的加深,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加剧的根源,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伯特尔·奥尔曼的《异化》(1971年)、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87年)以及赫伯特·金蒂斯的《异化和权化》等。

四、浪费和污染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谢尔曼给浪费所下的定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完全滥用资源或利用人力与资源生产对人们的现行消费或未来增长无贡献的产品的活动。并且列举浪费的12种典型表现:

①广告泛滥成灾;②高度的垄断意味着资源的错误配置;③竞争可能会造成一种变相的浪费或不必要的重复;④竞争鼓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这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⑤物质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正常现象;⑥污染环境的有害产品(如烟草等)有极高的利润率;⑦超级富

翁的穷奢极欲,从而意味着其他人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⑧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的浪费的典型表现,是大量的经常性失业以及大规模的周期性失业;⑨美国的种族与性别歧视意味着大量的人的才能被浪费而得不到发挥;⑩容许贫穷存在导致儿童得不到足够营养和住房,以及很差的医疗条件和很坏的儿童环境,这还会对未来的人力资源造成巨大的损害;⑪美国社会的普遍异化及其后果(如吸毒、酗酒、精神异常),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⑫对资源大量浪费起巨大影响的是军事开支庞大。

作为浪费的突出表现之一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污染,它产生和加剧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感兴趣的问题。他们把这一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私人获利动机;扩大与推动私人(尤其是富人)的消费,但却忽视公共消费领域;既定利益集团的干涉等。因此激进派主张: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人利润制度,代之以一种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不要把经济增长视为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的目标。他们认为主流派经济学的主张——通过一些关于污染的法律、限制产量和技术、控制人口,尤其是在美国穷人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控制人口——是治标不治本,强调:防止和根除污染的根本解决办法“只能在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道的社会之后”才能出现。^①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马修·伊德尔的《经济和环境》(1973年),他在污染问题分析上做了突出的开创性工作。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1966年)和《帝国主义理论》(1966年)两本书中,对资本主义浪费作了较透彻的分析。

^① 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五、经济滞胀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自 60 年代末期以来出现“滞胀”现象,这已成为定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进而探讨了滞胀产生的根源。

谢尔曼认为,停滞膨胀早就被解释为在停滞或生产下降和严重失业之中的价格膨胀情况。滞胀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垄断企业利润下降。解决办法或者是提高价格而造成通货膨胀,或者是降低工资则因减少需求从而妨碍利润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

大卫·科兹也将滞胀形成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力量的加强,其后果招致经济收缩,乃至经济停滞。但垄断企业仍然维持原来的价格甚至提高价格,从而产生滞胀现象。

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普夫批判了下述关于 70 年代美国经济衰退原因的分析:①资本短缺论;②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③政府对工商业和个人增加纳税负担过重,政府对私人企业管得太多,政府预算中社会福利开支过大等;④工人的工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从而压低了公司利润并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⑤公司所得的利润过多;⑥垄断力量的增长,影响生产效率并使通货膨胀加剧。作者认为,这些分析难免失之片面和简单化,应该采用制度分析方法,即运用战后“社会体系”的变化,考察美国经济滞胀的根源。

在作者看来,美国战后一段时间的繁荣,究其根源,是因为美国“社团体系”主要建立在各个权力关系相对协调的制度化结构之上,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处于压倒优势的经济上、军事上

的强国；国内资本与劳动间处于一定限度内的协调状态；国内资本家与广大公民间也取得一定的协调。60年代后期，这种“社团体系”受到多方面的侵蚀而渐渐瓦解。这些侵蚀包括关于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卫生保健、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立法等等。其结果是从1968年起，美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不再是以相反方向变动，反而共同组合成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滞胀状况。

这三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最后推出一个以下述四项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权益法案”。即①经济上的安全与平等；②民主的、生产性的劳动关系，③民主的计划化，④享有更好的日子的权利。显然这个可供选择的民主法案是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的方案，因而是无法根治经济滞胀这个老大难问题的。

谢尔曼则明确宣称：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在《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76年）的最后一章中，以“怎么办？需要社会主义和民主”为标题，提出当前怎么办、长期怎么办、更长时期怎么办三套方案，设想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永远消除停滞膨胀的弊病。这无疑只是一个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已。

第二节 关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大论战

正统派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及其内部各流派，它们之间长期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涉及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资本、剥削、劳动和资本关系等基

本范畴的价值—分配理论。

正统派经济学是建立在传统新古典主义主要支柱——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利润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激进派认为,这种理论否认劳动价值论,其前提条件和基本假设是前后矛盾、不现实的,它否认阶级冲突和阶级剥削,缺乏质的分析和内在的不一致性,并把经济发展视为可以撇开社会关系的纯技术过程。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价格)、工资和利润等范畴,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人、社会和阶级关系;大多数人认为利润可以被看成是工人向资本家所提供的劳动中超过再生产耗费的资本货物与工人所使用的消费品所需要的劳动的剩余劳动,剥削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制度的权力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因此,产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是一定的阶级关系、一定的规则制度、一定的社会制度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生产的技术条件的结果。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西方文献称为正统的、古典的、教条的、庸俗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激进派及其内部,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价值论。正统派经济学家坚决否认劳动价值论。激进政治经济学内部对于价值理论没有共同一致的看法,反对者、拥护者、综合者、修正者各持己见,论争不已。他们之间的大论战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一、关于价值问题的大论战

包括激进派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关于价值问题的大论战在

20世纪70、80年代最为激烈。70年代初的价值大论战是正统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挑起来的,其同盟者有新斯拉法主义者伊恩·斯蒂德曼和杰弗·霍奇森等,而其对立面是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德赛、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安沃·赛克以及赖特等人(他们是力图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代表)。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伊藤诚可划入肯定劳动价值论的阵营;激进派人士苏珊·希梅尔魏特和西蒙·莫恩则是力图重新解释、扩展和修正马克思价值论的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论战,则主要围绕新斯拉法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而展开的,其论战圈子大多局限于左派或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之内。这些争论虽然大多背离劳动价值论,但在某些论点上推进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不失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可自成一体的新的解释。

凯恩斯主义者保罗·萨缪尔森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早在50年代,他就把劳动价值论比喻为一条多余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他在70年代爆发的大论战中首先发难,其导火线是他在《经济学文献杂志》(1971年6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形问题的概述》。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把劳动价值论看作纯粹多余的概念,认为价格可以直接由技术的生产函数引出,因而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是一个多余的步骤或者是一种不必要的迂回过程。他指出,劳动价值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等的条件下,难以成立。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理论,只是在整个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都相等的情况下才有效,因而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有机构成不同这一现实。因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也就失去意义,缺乏一般性。他还提出了

摆脱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模型,把资本主义剥削仅仅归结为一种流通中存在的现象。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德曼是一个力图“整个地甩掉劳动价值论”的新斯拉法主义者。^①他在1977年出版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一书中,集中地攻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本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扭转了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的看法——把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视为一本批判新古典学派从而支持、弥补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作——从而用斯拉法理论批判和改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斯蒂德曼用斯拉法理论为武器,力图用关于实物数量关系的“价值的非劳动理论”,即着眼于具体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物质要素意义上的实际的劳动投入,从而抹煞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价值关系,力图用物质技术价值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他在书中探讨联合生产及固定资本存在条件下的负价值问题、异质劳动的还原问题以及转形问题和负剩余价值问题,公然声称:“与其让劳动价值论缠着脖子阻碍思考,不如干脆将它丢在一边而集中精力发展一种内部连贯一致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②

此外,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提出了“真正价值”论(即按最小量劳动或生产商品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耗费来计算的价值)。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J·E·金和米契尔·霍华德也持相同看法,并认为这是避免在多种技术选用和联合生产条件下产生负价值的好办法。斯潘塞·配克、阿伦·鲍斯和杰弗·霍奇森等则在宣扬“商品价值论”这种阐述价值源泉多因素

^{①②} 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的理论——价值量由生产出各种商品时所需的全部商品投入来决定——的同时,也遭到西方庸俗经济学家的责难,其倡导者被称为“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讲师德赛是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涉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其任务是解释和揭示交换关系所掩盖的剥削关系,但不是一种关于相对价格或资源分配的理论。他还指责斯威齐和巴兰在所谓“经济剩余”理论中实际上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在转形问题上无法驳斥萨缪尔森和斯拉法的观点,因而认为,马克思价值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把价值关系视为可以观察到的并可直接加以度量的。

70、80年代的大论战,起初只局限于少数经济学专家所组织的相当狭小的圈子里,随后在左派中相当大的范围内展开了,并具有国际性质。《科学和社会》、《新左派评论》等杂志刊登了谢克、大卫·兰伯曼、埃里克·赖特等撰写的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1978年11月,由《新左派评论》、《剑桥经济学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等在伦敦联合发起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会,并由维尔索和新左派图书公司出版了《价值问题的论战》一书,收入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日本等一批激进经济学家提交的讨论文章。

这场论战的中心是围绕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和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而展开的。美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经济学教授安沃·赛克认为,价值、剩余价值是本质范畴,价格、利润是现象范畴,价值决定价格,剩余价值支配或调节利润。他以《代数学的贫困》为题,对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关于利润率的决定先于价值决定的观点提出了反

批评。鉴于新李嘉图主义者往往是以生产过程中多种技术的选用和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为由,否定劳动价值论,赛克则明确指出了这种分析方法的两大根本弱点:一是具有唯心主义性质,二是倾向于把生产看作一种技术过程,当作实物数据,而不是人类劳动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过程。他不仅批判新李嘉图主义者关于价值概念冗余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并且还对苏珊·希梅尔魏特和西蒙·莫恩提交讨论会的论文《价值论和当代分析》的折衷主义观点进行抨击。因为这两位作者虽然批评斯蒂德曼,却并不打算无批判地捍卫马克思所写的每一个词句;虽然这篇论文的作者把斯蒂德曼所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视为整个地抛弃了价值范畴的庸俗经济学和成本价格论,但又力图提出一种“展开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矛盾的处理方法”,用以解决所谓李嘉图的“凝结劳动价值论”、新李嘉图主义者的“价格的成本总合论”和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而“解释并扩展马克思的价值论”的目的在于给“有关价值论的性质和意义的大多数争论提供一个归类的框架”。^①赛克的结论是这两个人最终还是向新李嘉图主义的声讨“全盘投降”。

霍奇森作为马克思价值论的反对者,将其论战对手分成好几派,即一派是信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原教旨主义者”,另一派是具有创造精神的高明的价值论的捍卫者。在他看来,埃里克·赖特属于后者,因为赖特所选择的是重新改造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而并非是从根本上将其抛弃。赖特先后在《关于价值的争论和价值研究》、《反思》这两篇论战性文章中与霍奇森、普瑞迪普·班德约帕德海亚展开激烈的争论。霍奇森在《反

^① 《价值问题的论战》,第249,247页。

赖特论之一——《劳动的利润》一文中指斥赖特企图把当今资本主义现实纳入劳动价值论的陈旧框架之中。班德约帕德海亚则在《反赖特论之二——为后一种斯拉法的观点辩护》一文中，极力为后斯拉法主义辩解，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只能是一种拖累而无用的工具，并针对赖特关于斯拉法模型只是中等抽象层次上马克思主义模型的特例的论点，力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只能作为一个受到限制的特例被包容在斯拉法模型之中。赖特在论战中一方面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实质和出发点，强调：劳动价值论之所以经受得起攻击并继续成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恰恰就在于它集中了作为政治、科学、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于一身。除非确定无疑地证明它的科学性理论性内容是不适当的，否则劳动价值论就会继续理直气壮地发挥它的这种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改造”和“完善”劳动价值论，重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型，目的在于将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辩论中的各种不同的立场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概念和框架之中。

70、80年代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以往争论的继续，其特点是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琼·罗宾逊是公开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典型。而斯拉法主义者、新(后)斯拉法主义者，即广义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如配克、霍奇森、斯蒂德曼等则用斯拉法理论来重建没有劳动价值理论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则出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改写或改造劳动价值论的动向，其中包括力图结合新的情况、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研究成果来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如斯威齐。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即新的热点和难题归纳起来，一是价值向生产价格转移是否意味着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二

是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问题,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天赋才能所造成的劳动力价值与工资报酬不相符合的矛盾;三是多种技术选用(同一产品可使用多种生产方法或技术)或联合生产(同一生产过程可提供多种产品)及固定资本存在条件下的价值决定;此外如何解释价值的所谓非唯一性和负价值问题,以及关于价值的定义和价值源泉的再探讨问题,等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论战和探讨过程中产生了分化:有的始终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的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或换了新的观察角度,有的以重新思考的名义,整个地抛弃了劳动价值论。

二、关于转形问题的大论战

价值如何向生产价格转形并且价值规律如何继续起支配作用的问题,实质上是价值问题论战的延伸。庞巴维克是挑起价值转形论战的始作俑者,其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一书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争论则始于对俄国统计学家鲍特基维茨两篇论文即《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1906年)、《〈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基本理论体系的修正》(1907年)的再评价。鲍特基维茨用一个联立方程组表达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力图把全部投入资本与产出一样转化为生产价格,这被认为是在转形问题上最早提出的一种古典解法。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中,对鲍特基维茨的联立方程组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用一个新的联立方程组,对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作了新的解释,但放弃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

程中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的这一基本命题。多布、米克、丁·温特尼茨、弗兰西·塞顿等人对斯威齐的解释提出过批评。

转形问题上的论战在70年代又掀起高潮。萨缪尔森与对劳动价值论持同情态度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威尔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上首先开战。萨缪尔森把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视为互不相容的,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不过是关于价值—价格的“擦抹和替换法”。鲍威尔的回答是:萨缪尔森必须做的就是承认马克思本人并不特别关心这些数量的决定,马克思认为这些数量是表面现象,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找出隐藏在数量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

70、80年代转形问题大论战的特点之一,是以曼彻斯特大学的斯蒂德曼、剑桥大学的约翰·伊特韦尔、罗马大学的皮罗·加兰格纳尼等为代表的新斯拉法主义的崛起。斯拉法在转形问题上另辟蹊径,因而影响很大,他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构筑了标准商品和标准生产体系,从商品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物质数量关系,而不是从价值出发导引出商品的相对价格,使之成为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剩余产品在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的函数,这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原意。多布、米克等认为斯拉法体系为转形问题的正确解答提供了分析工具,因而强调斯拉法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复兴”和“发展”。而新斯拉法主义者则用斯拉法理论为武器,批判和抛弃劳动价值论,进而批判和攻击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则是新斯拉法主义的代表作。在斯蒂德曼看来,价值是一个虚假的冗余的概念,因此没有必要从价值量出发,而应从一定的投入产出所表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工资水平出发,导引出商品的相对价格与社会平均利润。

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伊藤诚、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以及法国经济学家阿兰·利皮茨等在转形问题上都提出了与斯拉法主义者不同的见解。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主张应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中去解释转形问题,在他看来,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这个内容的形式,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具体形式,而形式对内容的偏离决不会影响和削弱马克思关于总价值等于总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的基本命题。神户大学数理经济学教授置盐信雄主张按时间的连续性不断修正平均利润和相应的生产价格的数值,从而最终接近使社会各部门利润率保持一致的生产价格。长期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森岛通夫通过数学计算,确认两个恒等式(总剩余价值=总利润、总价值=总价格)成立,证明马克思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并非不相容,从而否定了萨缪尔森的“擦抹和替换法”。

三、巴兰、斯威齐的“经济剩余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者乃至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对作为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其表现之一就是用剩余价值的外观或物质形态如用利润、剩余产品来取代具有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内涵的剩余价值本身。用“经济剩余”术语来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首先见之于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巴兰在50年代撰写的《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1953年)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则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即关于经济剩余产生和吸收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成为他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一个中心概

念,而且还成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

他们给经济剩余所下的最简短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①这种经济剩余中有一部分是财产收入,如企业利润、个人租金收入、利润收入以及大公司上层管理人员收入。财产收入这一概念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息及地租的总和。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两本书中还提到剩余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以及商品转化为货币时的支出等。但在斯威齐看来,马克思是把这些项目作为次要因素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而马克思舍弃掉的这些次要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中却显得十分重要;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出现,工会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和剩余价值概念的性质,因而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有必要进行“术语的更换”,从而提出“经济剩余”这个概念。

巴兰还考察了经济剩余的三种变形,从而将经济剩余区分为三类。一类是实际经济剩余,即社会现行的实际产品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其中并不包括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政府及国防开支等部分,相当于马克思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因而在概念上小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另一类是潜在的经济剩余,即在一定技术和自然环境下借助于生产性资源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同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其价值的实现要求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或多或少的根本性的改组,意味着社会结构深刻的改变。必须考虑到下述情况:一是社会中的过分消费,二是社会因非生产工人的存在而丧失的产出,三是因现有生产设备的不

^① 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第14--15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合理和挥霍性的配置而丧失的产出,四是因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失业而未能带来的产出。潜在经济剩余和实际经济剩余的差额由于垄断资本的腐朽性而日益扩大。第三类是指计划中的经济剩余,系指社会在历史既定的自然和技术环境下,在有计划地对所有可用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产出,同被选定的最佳消费额之间的差额。这个概念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的经济剩余的增长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发展的程度,取决于生产人类需要的结构及其增长的程度。

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经济剩余”概念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想要以此证明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在他们看来,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仅在绝对量而且在相对量(指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以此说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财产收入在经济剩余中所占比重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亦即社会财富浪费的增加趋势,由此表明经济剩余中相当大一部分(指财产收入之外的部分)被用于浪费性的用途上,诸如庞大的政府开支、军费支出以及广告和推销费用等。并且,经济剩余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日益增加,而垄断资本却没有能力吸收这部分剩余,从而陷入长期停滞和萧条的泥潭之中。但是,巴兰、斯威齐的经济剩余理论在实际上是借资本主义的演变而对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作了错误的修正,尽管他们多次声称经济剩余概念是术语性质的改换。美国经济学家郎·斯坦菲尔德和波兰经济学家亨赖克·斯撒费尔也把这一概念视为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的派生词或补充。毋庸置疑,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经济停滞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

矛盾的激化,而并非取决于经济剩余处理或吸收的困难程度。某些西方激进经济学家也认为巴兰、斯威齐的剩余吸收论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相类似,其要害是模糊和割断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内在联系。

由此可见,激进政治经济学在剩余价值理论上的通病是承认剩余产品而否认剩余价值,因而抹煞了剩余劳动作为其唯一来源的性质,因为经济剩余,可以被解释为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额。

四、赖特的“马克思主义利润确定模型”

利润来源、利润决定或确定问题是西方学术界 80 年代大论战的又一个焦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赖特批判了以安东尼·卡特勒、巴里·欣迪斯、保罗·赫斯特和阿萨·哈塞为代表的“利润原因不可知论”,以及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斯拉法式的观点及其斯拉法利润确定模型,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确定模型”。

利润来源不可知论又称之为“多元因果论”。在他们看来,剩余劳动在分析利润决定问题时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因为利润是许多决定因素或众多原因(如机器、集体劳动、技术和知识、资本家的金融活动、天气等)的产物,而不能仅仅归结为劳动或劳动时间,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剩余劳动放在中心地位纯粹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即有助于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剥削制度。

斯拉法派的利润决定观又称之为“二元论的利润论”。在他们看来,利润应视为两个因素(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支付给工

人的实际工资)作用的直接结果,即这两大因素构成确定利润的实际机制,所有其他因素都要通过影响实际工资和技术条件的方式来对利润产生影响,并认为仅依据实际工资和技术条件就可以计算出唯一的利润率,所以剩余劳动在斯拉法利润确定模型中不能起任何作用。

赖特大体上坚持马克思的利润—剩余价值理论。他强调指出,在解释利润时应始终围绕着剩余劳动这个理论中心展开。他认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不能仅仅看作是利润确定的许多原因之一,更不能被看成是与利润确定毫不相干的范畴;剩余劳动(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利润确定模型中应是根本性的确定因素,而剩余价值可视为确定利润的绝对界限,应该放在首位。他指出,实际工资和生产的技術条件通过对产生剩余价值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利润;对剩余价值没有影响的商品组合、实际工资、社会技术条件的变化,对利润总量的大小没有影响;只有当它们影响到剩余价值时才能影响总利润。正是依据对利润确定过程的这种整体结构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才把剩余价值称为利润的“起源”。在赖特看来,利润原因不可知论者和斯拉法派的关键是轻视或抛弃劳动价值论,因而未能科学地解释价值、剩余劳动调节、确定或限定价格以及利润的因果机制。

同时,赖特认为把利润仅仅归结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单向型的认识路线,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工资、生产的技術条件乃至阶级斗争对利润(率)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现实不尽符合。他因而提出对传统马克思利润理论稍加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利润确定模型。

这一模型的特点是采用“限制”和“选择”两个术语,用以说明,剩余价值仍被视为系统地限定了利润的变动范围,而生产的

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只能在此范围或界限内对利润起着选择确定因素的作用。这种选择机制意味着在限制范围内再选择一个变动幅度。另一个特点是采用“转换”或“改造”的术语,用以说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对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利润率。如在基本的生产社会技术条件所限定的界限之内,阶级斗争的形式起着实际工资的转换确定因素的作用。在给定的技术的约束条件下,只可能发生在某一范围内的实际工资水平的转换。阶级斗争反过来又受到阶级结构的结构性限制,并且受到利润水平的选择性影响:当利润率偏低时,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实践是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同时为增加剩余价值而改造生产的技术条件;当利润率偏高时,工人阶级将能更有效地为增加实际工资水平和在劳动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化而斗争,从这种意义上说,利润率对阶级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具有某种选择机制。在由阶级结构确定的界限之内,实际工资和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也对阶级斗争起着选择确定因素的作用。

赖特的观点是激进经济学的一种典型,反映了剩余价值问题大论战的一个重要侧面。

五、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

70、80年代的大论战一般被称之为关于价值和剥削问题的争论,可见关于剥削问题也是论战中一个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是以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的存在与否,作为资本主义剥削是否存在的标准;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反对者或否定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着重提出了所谓“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

或在“一般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口号下加以修改。

萨缪尔森、霍奇森以及斯蒂德曼等人都提出了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萨缪尔森在《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1971年)一文中指出:剥削模型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术语来表达,可以摆脱马克思第一卷创新的术语的束缚。他认为,利润是在流通领域资本品所有者同工人讨价还价的结果。资本家因为节俭、等待而作了牺牲,因而得到利润形式的报酬,其利润率变动范围为: $0.06 = \rho < r^{00} < r^* = 0.20$ 。其中, r^{00} 为利润率,最低利润率0.06即现在效用比将来效用为 ρ ,最高利润率 r^* 为0.20,由此规定工人得到的最低限度消费品。萨缪尔森的剥削模型是用西尼耳的节欲论、马尔萨斯人口论、边际效用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等来取代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马克思的剥削—利润—剩余价值理论。

霍奇森在论文《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1980年)和专著《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中,提出既不同于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剥削论,也不同于建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基础上的新古典剥削论。他给剥削下了新的定义:剥削是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对剩余产品(即在劳动者已经分配到了他们的那一部分和所有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已经被补偿或者得到修补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物质纯产品)的占用,资本主义剥削是通过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对货币的剩余的占用。他明确宣称,他的剥削论并不仰仗劳动价值论,也许可表明重建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全部《资本论》的可能性,并由此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霍奇森的剥削理论否认隐藏在交换价值这一现象形态背后的“共同体”即人类抽象劳动,从而放弃劳动价值论;其次用采取货币形式的剩余产品取代剩余价值,从而放弃

剩余价值,抹煞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即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他同时用归谬法批判古典学派的剥削概念——剥削就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提供者所得到的报酬少于其边际产量。霍奇森认为,由此可推断出两个荒谬结论:一是资本家或工人都可能遭受到剥削,二是通过适当的公平分配可消除工资和利润的“不公平”,从而消除剥削。他强调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怕获得更多的边际产量也是被剥削者,资本家从来不是被剥削者而是剥削者。

斯蒂德曼也是主张脱离商品价值关系来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而闭口不谈利润的实体、利润的来源,从而把剥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利润量的表述或决定问题。斯蒂德曼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等用语。他认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既有可能正剩余价值和负利润并存,也有可能负剩余价值和正利润并存,从而否定正的剩余价值(率)是正利润(率)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因而在70年代引发出一场大论战。

所谓“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又称“森岛通夫—塞顿—置盐信雄定理”,源出于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等三人于60年代初提出的命题:剥削率唯有是正值时,均衡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才表现为正数;这是马克思力图证实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定理,决不能设想剥削乃至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为负值的情况下存在或发展。

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1973年)一书第五章《剩余价值和剥削》中,对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作了论证。伏尔夫斯坦特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剩余劳动、同步劳动的成本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1973年)一文,也持相似观点。

斯蒂德曼认为,上述著述未考虑到联合生产——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出两种以上的联合产品,并且未予折旧的固定资本也被视为联合产品之一时,即使生产过程最终只提供一种产品,也被当作是联合生产;根据他的推导,在联合生产条件下,按照马克思加总计算商品价值量的方法会得出负价值,并且无法解决如何在联合产品之内分配劳动即同一生产过程的劳动总量的问题。斯蒂德曼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负剩余价值时的正利润》和《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1977年)等著述中,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的概念,并由此证明这一基本的马克思定理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失效。

伊藤诚(1981年出版《联合生产:斯蒂德曼遗留的问题》)、森岛通夫、凯特福斯(1978年出版《价值、剥削和增长》)、置盐信雄(1976年出版《马克思的基本定理——在联合生产条件下》)等,纷纷驳斥斯蒂德曼的观点。森岛通夫采用线性规则的方法来计算商品价值——他所讲的价值是指生产商品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耗费,并且认为使用剩余劳动率(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比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更能全面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得出的结论是正的剥削率即剩余劳动率是保证资本家得到正利润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置盐信雄则从剩余产品的角度对联合生产条件下的剥削作了新的规定。他用数学方式证明:即使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工人的生产只要有剩余产品也是一种剥削,用以说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定理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也能成立。

英国牛津大学的科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约翰·罗默和芝加哥大学的埃尔斯脱也是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的鼓吹者。科恩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入探讨剥削问题几

乎成了绊脚石；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们与其千方百计地使劳动价值论自圆其说而收效甚微，倒不如直接去讨论个人占有资本在道德上是否合法这一核心问题。罗默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年）、《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年）和《价值、剥削与阶级》（1986年）中构筑了一个广义的即可以不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剥削理论。在他看来，由于劳动供应对财富的弹性关系，有时剥削与财富的相关性往往不够好；因此有必要直接用财产关系给剥削下定义，而不必通过剩余价值的计算，即判断一个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标准。这种定义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拥有或取得社会资产中他所应得的份额，即如果一个人或一批人在可转让的社会生产手段中不能占有其应得的份额，则可判定他们受到剥削。他进而指出，这一定义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非物质劳动的难题；因为在此定义下，劳动价值在其正的剥削理论中已成为多余的拜物教。他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剥削现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但由于个人（不可转让的）天赋、技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等并不尽相同，故仍存在着一种不平等；也可以将此种不平等称为社会主义剥削。罗默还强调不必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础，即不必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也能消灭剥削。

此外，埃尔斯脱和罗默主张回避价值、价格问题，而用“经济最优区”来定义剥削。他们指出，如果某种分配制度位于资产平均分配后的经济最优区之外，则该分配制度中有剥削存在；若一种经济集合可能成为更优的集合，则该集合在原来的经济中受到剥削，而与该集合互补的集合为剥削者。赖特则根据假想的财

产平均分配制度来定义剥削概念。他将人们分为不同财产的所有者：资本财产、技能财产和组织财产（即对组织机构的控制程度、或管理多少下属等等）。与每种财产相对应的各有一类剥削。一个具体当事人可能在一类财产中被剥削，而在另外一类财产中为剥削者。例如，一个既无资本的又无技能的管理人员可能在组织财产方面是剥削者，而在资本与技能财产的领域内被剥削。但赖特强调，阶级意识确实是与剥削关系相联系的物质利益的一种效应。他与其他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成员一样，强调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其中包括剥削现象）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三节 帝国主义理论

西方颇具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中指出：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是激进派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60年代，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和知识分子发现正统派新古典理论在阐释这一问题时，不是内容贫乏就是辩护拙劣，于是他们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寻求答案，从而促成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和繁荣。

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并相继经历了一般垄断主义、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尤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提出了各种繁纷复杂思想和理论。这些新的结论、见解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一、美国垄断资本学派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垄断资本学派。它渊源于 60 年代中期的美国。巴兰和斯威齐是旨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垄断资本学派的创立者,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之作,并对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起过重要作用,从而成为美国垄断资本学派或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还有哈里·马格多夫、詹姆斯·奥康纳、哈里·布雷弗曼等年轻一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经济学家。

马格多夫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主要成员,《每月评论》杂志主编。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1968 年)。该书及其摘引的大量统计资料有助于说明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以及“对外政策的经济学”,并且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作了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对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

马格多夫崇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学说。指出,“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是什么选择的问题;它是这种社会的生活方式”;^①并在强调列宁的学说仍然是“适用的”的同时,力图阐述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特征,并冠之以“新帝国主义”。

这些实际经济政治的具体变化有:大型企业的兴起,争夺原

^① 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第 21 页,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

料的新势头,海洋运输的进步和世界市场,资本国际化倾向,绝大多数国家都按帝国主义的行径办事(如以军国主义和新保护主义抬头为标志的国家干预的加强),即新殖民主义倾向等。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①主要的重点已从分割世界的竞争转移到防止帝国主义体系缩小的斗争;②美国充当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新角色;③性质上具有国际性的技术的出现。但是,马格多夫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国家垄断主义的命题。

马格多夫进而详细探讨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问题。第一是金融业的国际化问题。其标志是使世界金融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元随之成为世界货币,并成为美国控制世界并加强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目的的有力工具。这种金融权力还进一步扩大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第二是对外经济援助是成为美国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国外尤其不发达地区的手段,使国内企业易于攫取到丰厚的利润,并使不发达国家居于附庸的地位。第三是海外投资和军事活动与国内垄断资本的关系。在马格多夫看来,海外投资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摇钱树,它只不过是国内垄断趋势的延伸从而成为垄断控制的手段。而军事活动和军费开支对垄断资本经济也有特殊的好处和重要影响。

奥康纳(1930年—)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和年轻一代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曾就读于圣劳伦斯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巴纳德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约瑟)执教,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任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以及《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1970年)、《企业和

国家》(1974年)、《积累危机》(1984年)和《危机的意义》等。西方学者认为《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产生了同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同样重要的影响。奥康纳通过对5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研究,从私人消费和国家消费之间关系入手,着重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三大部门——政府(国有产业部门)、竞争(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竞争产业部门)和垄断(由大企业组成的垄断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阐释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提出了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关于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结果的新见解。奥康纳的理论尤其是“财政危机”理论,对巴兰和斯威齐关于垄断资本停滞趋势的论断和消费不足危机论,作了重大的补充。

奥康纳首先界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即维持或创造使资本积累具有可能条件的经济功能,以及使社会安定的法律功能。前者主要指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如调节税收、控制货币量和信贷规模,以及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等经济功能。与此相对应,政府财政预算也应划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这两大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是用于促进政府经济功能的货币开支,用于间接地扩大剩余价值,它主要包括个别资本或私人企业所无法承担的物质资本投资(如修筑道路、水库、输油管、发展通讯卫星)和用于教育设施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开支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社会支出项目包括社会福利、失业保险、维持法制所需费用等。这种开支虽然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不起直接作用,也不会直接带来利润,但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安定。

在奥康纳看来,社会经济三大部门中存在下述关系:第一,

国有产业部门和政府财政预算开支(包括社会资本和社会开支)的增长有益于竞争产业部门,更有益于垄断产业部门;第二,垄断产业部门和竞争产业部门增长得越快,政府在社会资本上的支出也随之增长;第三,政府财政预算中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的矛盾运动孕育着危机。它表现为一方面,社会资本的投入间接地增加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社会支出并不增加生产能力,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社会支出都在提高总需求;因此,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抑或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增长,取决于政府财政预算中这两大开支的组成情况和发展趋势。这一矛盾运动又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开支或消费(包括社会投资和社会支出)越来越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剩余不断地被私人占有,由此而形成的政府开支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促成了以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缺口(即政府开支增大与税收减少)为特征的财政危机。这种财政危机还由于各产业部门、各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斗争而进一步加剧。如私人资本需求加大政府预算中社会投资的比重,失业者和破产者要求扩大社会支出,从而酿成各部门各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即从何处削减政府的开支,又向何处去提高政府税收,因此这种财政上的经济危机,又进而转化为政治上的危机,从而进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财政能力,乃至生产剩余的能力。奥康纳的结论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财政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亦即生产是社会的,而生产资料却为私人占有”的矛盾。^①

布雷弗曼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他是美国工

^① 奥康纳:《政府的财政危机》,第40页,纽约 St·Morlin's 出版社1973年版。

人出身的“新左派”经济学家。50年代起先后任《美国社会主义者》杂志主编、《每月评论》出版社社长及主编等职。主要著作是《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1974年）以及《俄国的未来》等。《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则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这一角度，对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斯威齐承认：“我们尤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变化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没有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持有的各种技术对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即：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等。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全面研究时，这些显然都是必需加以论述的重要问题。”^①

布雷弗曼认为，《资本论》把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劳资关系、劳动者地位的论断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布雷弗曼深入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领域中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如劳动人民的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公司、办公室劳动的演变，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其中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与工人阶级和旧中等阶级相区别的“职业的中间阶层”），尤其是企业管理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影响，等等。他强调指出，上述变化或发展的原因，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并且，他认为自马克思逝世后，至今尚无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①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在布雷弗曼看来,劳动过程在19世纪末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这一时期正是西方“管理革命”崛起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时代。前者为劳动过程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后者促成以技能为基础的劳动向以科学为基础的劳动的转化,从而使劳动过程的内容产生了实质性的变革。他强调指出,劳动过程的重大变革和发展与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在时间上是正相吻合的,促成劳动过程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革的管理和新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部分,它们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而又使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但是,布雷弗曼强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它们不仅不会导致劳动者体力上和脑力上的“解放”,相反却会加剧劳动者日趋严重的异化。其根源在于劳动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对立的两极,并表现为支配社会结构的一种巨大的“阶级二元性”;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处处利用国家权力使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而“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多种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保证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的财产分配的保护人。”^①

二、法国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

保罗·博卡拉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他与《人道报》总编辑让·法布勒等人,以法国共产党中央经济部和《经济和政治》

^①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251页。

杂志的名义,主持编纂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1年)。该书以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背景,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表现形式、运作机制内在矛盾,以及国家和垄断资本的辩证关系。

这部著作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划分为原始阶段(始于16世纪中叶)、古典或自由阶段(始于18世纪末)和始于19世纪末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并进而把垄断阶段细分为“简单垄断”(古典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发展时期。该书对初步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特征作了界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包括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且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国家投资、国营部门、国家消费以及垄断的计划性,固然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但是,经济的军事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强制性、反动势力的集结、政治专制主义的趋势,也都同样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中真正独特的时期。国家和垄断组织之间建立的新关系,就是这个时期的特殊标志”。^①

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化的必然性是该书分析的一个重点。该书指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转化的一般原因,但还应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国际环境等各种矛盾的运动上综合加以分析。1929—1933年大萧条无疑是这种转化的催化剂,但应着重从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中来加以说明。详而言

^① 法共中央经济部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册,第25—26页。

之,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过剩趋势,生产社会化和国家投资的需要,积累过剩,尤其是国家资本(如国有企业)以资本贬值方式进行国家干预,促成简单垄断让位于国家垄断,从而使国家与垄断资本集团结成新的经济关系。

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贬值”方式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新形式。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作用下,国家资本“贬值”是缓和私人垄断资本过剩的唯一出路,就是说,国家资本只有在“技术上”发挥作用,但不再为资本直接带来剩余价值,或者使国家资本在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乃至“负增殖”条件下经营,从而提高私人垄断资本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不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标,因此在发展大生产尤其是先进技术方面(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一旦获得平均利润率,政府就会把这种有利可图的国营部门的活动“私有化”,即转归私人垄断部门经营。此外,国家干预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国家资本给私人垄断组织以各种名目的资助、补助、信贷或投资,以及通过国有部门、国家预算和国家合同进行直接投资。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能保证整个垄断资本的共同的利益,但还应看到国家和私人垄断组织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垄断资本的长远利益(如实施有利于非垄断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政策)而不可能兼顾各个私人垄断资本的具体利益。该书作者反对 50 年代流行的“服从”论(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利益),也反对 60 年代盛行的“结合”论(垄断组织的力量和国家力量结合为一体)。但他们却因此滋生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幻想,并力图从计划化和国有化这两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寻找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过渡形式。在他们看来,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或民主性质的国有化措施,促使国家干预

经济的政策,逐渐变得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使国家向反垄断资本的方向发展,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日趋成熟。

该书还详细分析国家垄断资本的表现形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全面干预,国家经济职能和经济作用大大加强,具体表现为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计划化;考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剥削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即由国家统一组织对劳动者的剥削,从而使资本的矛盾达到更高的程度;剖析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阶级分化加强,领取工薪的中间阶层壮大,从而有利于工人阶级争取建立广泛的反垄断同盟。并阐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危机的特殊性,强调指出:一般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的转变,一方面表明资本关系进一步社会化,国家调节经济作用空前加强,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一定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反对劳动者,因此使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受到限制。生产力的社会化和客观发展要求根本变革社会关系,而垄断组织支配社会的能力的加强则阻碍这种变革,两者之间对抗性的根本矛盾正在加深。

三、英国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是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合著的《重读〈资本论〉》(1979年)。他们与美国垄断资本学派、法国的博卡拉和比利时的曼德尔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力图遵循《资本论》中的基本范畴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既反对一种生产方式不能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的僵化的理论倾向,也反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阶段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向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理论倾向;并且指责布雷弗曼等人局限于研究英、美等特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而忽视对其一般发展规律、特征和性质的研究;强调国家垄断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界限内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和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综合性的干预所造成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式上”的新变化,并应着重探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化背后所隐藏的必然性或动力问题;同时在方法论上,既应严格区分不同质的两种社会形态,也应把握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和具体层次上“社会形态”的异同点。因而对拓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重读〈资本论〉》的作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三个相连的阶段,指出其相互转化的一般原因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具体考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转化关系,其中主要有:①对剩余价值占有和控制方式上的转化;②包括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在内的社会化形式的变化;③由以上两个方面造成的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政治关系和国家形式的变化等等。因此,他们围绕这些转化关系重点阐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

在法因等人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较之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其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更高,它是以一种控制生

产过程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化机制为特征的,亦即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前二个阶段中,控制生产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机制是市场交换和信用制度这些强制的力量,在现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机制却是国家全面干预。国家对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过程管理”、“核算管理”和“金融管理”实现了完全的控制;国家空前强化了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作用,并渗透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而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结合,前者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整个过程中,与后者结合在一起运动,资产阶级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日益社会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应运而生。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国家经济在再生产中地位的变化,势必导致剩余价值占有和控制方式的变化。在法因等人看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主要通过税收制度和征税政策来占有剩余价值;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最终还是以资本积累的形式重新投入私人资本循环中去。同这种税收制度相联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资本各部分之间在利息或企业利润形式上占有剩余价值的竞争性的斗争,也由于国家的作用而逐渐地社会化。

他们指出,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总和,决定由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国家最初只是体现政治关系的国家。但在现阶段,国家则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的具体体现。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切形式的经济活动、经济斗争,例如,工人在

工资斗争中的直接对立面就是管理并决定收入和税收政策的国家机构,而不再是资本家阶级。这种政治上的转化还必然导致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制。

但是,法因等人强调,这些变化或转化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和本质特征。资本运动规律,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以及资本积累过程不断被危机打断的规律及其固有矛盾,还继续存在和发生作用。这就需要严格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的两种不同的转化关系: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各个阶段之间的转化,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另一种在性质上迥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转化。

四、比利时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

曼德尔(1923年—)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曾就读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巴黎大学文学院,获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书记。主要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1980年)、《马克思的经济学》(1983年)等。曼德尔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从18世纪末至1847年的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以及1847年至19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革命“长波”相吻合;所谓“长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每隔约50年为一周期的长期经济波动,用以区别周期为7—10年的经济波动)、“古典的”帝国主义(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次技术革命“长波”相吻合)和晚期资本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持续至今),而晚期资

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①,亦即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的第三个阶段”。^②他认为这一术语较之“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提法更为合理。并且强调它“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③

哈贝马斯(1929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先后任职于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他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证明问题》(1973年)等著作中,对晚期资本主义作了阐释。他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的社会形态和始于19世纪末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特征在于:国家干预的强化使国家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现象,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不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科学和技术成了社会主要的生产力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成了剩余价值的一个独立来源;无产阶级已经发生分化,其革命性已经蜕化,阶级对立处在一种潜伏状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范畴应予废除,改造社会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可见,哈贝马斯已抛弃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悬挂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传统,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曼德尔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力图使马克

①③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第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上,第34页。

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诸种抽象规律,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展开。他并且强调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动力,应该是“所有发展基本规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到“这一种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基本变量”,而并非是“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假设”所能加以概括和阐述的。^①他批判了罗莎·卢森堡和希法亭一类经济学家,因为前者把单一因素概括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而后者则归结为竞争规律。曼德尔还列举了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六个主要因素或变量:总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这些主要变量、因素和基本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毋须于诉诸外在的因素”),并且可以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亦即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中),推导出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从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作用出发(亦即不再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当作既定的前提),再以此为出发点逆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

曼德尔用整整九章的篇幅详尽阐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和总的性质。这些特征包括:

(1)最初的特征是资本增殖的条件和方式的根本性的改进。晚期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一所伟大的学校,它教育无产阶级不但要关心工资和利润之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眼前分配问题,而且要关心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尤其要关心包

^①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第3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括在劳动组织、生产过程和政治权利的运用等等之中的一切问题。

(2)生产力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有了迅速的增长。

(3)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缩短、技术发明的加速(在资本主义晚期,技术发明的“租金”成了垄断性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永久性重整军备对剩余资本的吸收,构成了资本发展新阶段的特点。

(4)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积聚和集中,使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同时产生生产力的国际差异并扩大这种差异,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成了新殖民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特殊关系。

(5)劳务部门的扩大使闲置资本转化为劳务资本,因而对资本增殖没有直接的作用,仅仅缩短资本的周转期而略为间接地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对以资本增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扬弃和突破。

(6)持久的通货膨胀和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循环、信用循环和贸易周期本身,构成其经济运作的特有机制和运动形式。

(7)国家功能的进一步扩大(它意味着国家经济计划化倾向、一部分资本国有化倾向、生产经营的冒险费用和损失的社会化倾向的扩大),亦即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日趋膨胀和日趋自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资本顺利增值和剩余价值顺利实现越来越感困难的必然结果。

(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采取了爆炸性的形式,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散性危机。“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固有

的矛盾不仅仍在继续起作用,而且实际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得到了最消极的发挥。”^①

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末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终历史结局:生产者联合起来取得政治权力并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废除,将是国际工人阶级群众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这个目标正在一天天接近。总的来看,《晚期资本主义》虽然有许多缺陷,但仍不失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本有份量的著作,在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五、关于经济危机根源和类型的探讨

经济危机学说是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潮,但在70、80年代又再度进入繁荣时期。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尤其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从而危机的分类等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背景是70年代西方经济进入连续周期波动、失业和滞胀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根据其重要著述的发表年代,先后有奥康纳(1973年)、曼德尔(1975年)、伊藤诚(1978年)、谢尔曼(1979年)、韦斯科夫(1979年)、哈维(1982年)、阿特韦尔(1984年)等人。

《价值和危机》(1980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形成》(1978年)、《世界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性经济危机》(1978年)的作者伊藤诚,因袭了40年代琼·罗宾逊等人的观点,认为马克

^①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第3页。

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不完善的,但他又强调,《资本论》在实际上创立了一个成熟的、特有的和崭新的经济危机理论即资本过剩危机论,因为它从劳动力短缺和资本有机构成两个方面(并辅之以可贷货币、资本、信贷机制)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其不完善性则表现在未把价值规律和危机理论相沟通,危机理论应是价值规律和资本运动(积累)规律的具体结合。并指出,马克思在这之前的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则主要从流通领域中去寻找危机产生的根源,前者提出了消费不足论,并且与价值规律作用缺乏联系;后者提出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相结合的商品过剩论。总之,“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四个不同的未完成的理论,”^①即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论,以及劳动力短缺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伊藤诚根据引起危机的原因,又进而把前两者归纳为“商品过剩论”,后两者归结为“资本过剩论”。并认为这是两类不同的彼此难以调和的理论。

但是,与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伊藤诚把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局限于某一种类型。在他看来,应该舍弃资本过剩危机理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论,因为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出发,很难准确推断周期性危机,尤其无法运用于短期周期运动。他倾向于“利润挤压危机论”[有的译成“利润缩减论”——笔者注]亦即“工资提高论”,指出:“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的上升,原则上不可能避免一场由于

^①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07—10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通过信贷制度的资本主义竞争作用而引起的尖锐和普遍的危机。”^①他以日本为例加以说明：日本资本主义不得不遭受到因工资上升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提高而造成的利润缩减这种困难。利润挤压理论作为研究包括日本情况在内的资本主义当前危机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十分恰当的。但是，这种利润挤压论遭到约翰·威克斯和法因、哈里斯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大倒退”，并斥之为支持李嘉图的利润-工资对立论的“新李嘉图学派观点”。^②

伊藤诚还企图从方法论角度寻找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完善的根源。在他看来，《资本论》一书中阐述的危机理论，是从基本原理的角度来证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其经验根据是19世纪中期典型的有规律的工业周期性危机，并且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系统批判的焦点。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已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他进而借口历史时期的变化，企图完善和推进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及其信用理论。因此，一方面必须“应以19世纪中叶典型的有规律的工业周期的经验为基础来完成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另一方面，“把抽象观念的经验根据扩大到前一段或晚一些历史时期，我们就或者必须考虑到极其不同的条件和因素，或者要借助于十分抽象的逻辑表述，以便显示繁荣、危机与萧条的明显必然性，以及它们重复出现的机制。不用

^①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03页。

^② 威克斯：《积累过程和“利润挤压”的假设》，英文版第259页，载《科学与社会》1979年秋季号；法因、哈里斯：《重读〈资本论〉》，英文版第80页，伦敦1970年版。

准备明确的周期性危机的原理作为研究的基本准则,我们就可以在更具体的研究水平上更准确地进行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的危机变态的经验研究。”^①应该指出,伊藤诚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指责基本上应予以否定。但他能从马克思理论自身的发展来分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形成,并且提出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予以丰富和发展的观点还是可取的。

霍华德·谢尔曼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其主要著述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1979年)、《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76年)、《垄断势力和停滞膨胀》(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78年)。

谢尔曼的许多观点与伊藤诚相近。他从根源入手,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三种经济危机学说,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后备军耗竭(或工资推动理论)和消费不足理论。并且也认为马克思未将它们统一起来,从而在其追随者中造成彼此对立、冲突和混乱的观点。谢尔曼与伊藤诚的区别在于,他并不把产生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某一类型的经济危机理论,而是多种原因或矛盾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他力图把这三种危机论综合起来。他指出:“这些理论的综合可以发现,最近这次扩张中不仅有成本提高的问题,而且存在需求缺乏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既面临着成本问题,又面临着需求问题,因而难以摆脱困境。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就会内生地引起周期性收缩。当然,政府的税收、支出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并缓和资本主义商业周期。但是,只有一场革命

^①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11—112页。

才能结束它。”^①他认为美国学者托姆·韦斯科夫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理论上最成功的“新突破”。谢尔曼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制定了一个可容纳三大危机论的周期模型,这一模型既重视与消费不足论相关的需求或实现问题,又不忽视与工资推动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相关的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一产出率,但他认为这一模型的缺陷是尚未把长期增长趋势、通货膨胀、垄断程度和资本主义政府的周期作用以及存货周期、折旧和替换投资周期明确地综合进去。

西方学者戴维·哈维与谢尔曼一样,力图把马克思散见于各处著述中关于危机问题各部分的见解,构筑成具有三大层次的动态的统一的当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他在其代表作《〈资本论〉的限度》中指出:第一层次的危机论是马克思所表述的危机理论。在哈维看来,马克思虽然指出危机根源来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但是《资本论》前二卷与第三卷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见解是不统一的。第二层次的危机理论加入信用和信用周期因素,因为货币金融危机(如通货膨胀)可加剧生产周期乃至整个周期的波动。第三层次的危机理论加入资本的地域布局和资源配因素。在哈维看来,可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建立世界性的均衡的生产布局,从而通过空间转移而避免危机。他认为,这个三层次理论体系可弥补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总的来看,哈维的理论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但其中许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向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从而从根本上避免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① 谢尔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22页。

美国学者阿特韦尔是在 80 年代对西方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作了系统概括和总结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危机理论：

(1)比例失调论(Disproportionality Theory)。比例失调论者论证了两大部类的平衡在理论上的可行性。第一部类指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机器和中间产品)的部门,第二部类系生产最终消费品(工资品)的部门。但是无数私人资本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的,带有盲目性的,因此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必将使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酿成足以摧毁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

(2)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tion Theory)。它与比例失调论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消费不足论者所讲的比例失调,是经济体系总需求和总供给长期存在的失衡现象,即后者始终大于前者。米切尔·布利尼在其消费不足思想史著作即《消费不足论:历史的和批判的分析》(1976年)中,区分了两种消费不足论。以西斯蒙第和罗伯塔斯为代表,他们把消费不足归咎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和有限的购买力,因而造成生产过剩、实现困难和经济停滞。马尔萨斯则认为资本家储蓄过度引起消费不足的危机,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进一步拓宽了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陷。阿特韦尔补充指出,第三种消费不足论则假定两大部类需求的长期失衡。

(3)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Theory of 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或利润率下降趋势论(Theory of the Falling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学派”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探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解决了这个问题;二是考察有机构成提高与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产生之间的联系。但周期危机

论者和长期危机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略有不同。这个学派的理论在广泛被接受的同时,也受到广泛的批评和修正。

(4)工资提高论(Rising Wage Theory)。工资提高论也被称为利润挤压论或新李嘉图主义。它与有机构成提高论有类似之处,也提出了驱使利润率下降的机制,用以说明经济危机,然而,工资提高被认为是利润缩减的根源,并且也有周期危机说和长期危机说(英国为此类分析的典型)两种不同的观点。长期危机论者指出,英国资本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国内强大的工会,使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力的收益;另一方面国际激烈的竞争阻止资本家提高价格用以转移增加的工资成本,这种利润挤压势必造成长期的滞胀危机。

(5)国家财政危机论(Theory of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国家财政危机理论代表作是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它用国家政权及其作用这一因素来阐释以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为典型的政府的财政危机。

他进而把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归结为实现危机学说,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工资提高论则合并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学说;进而指出,可以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两大变量中演绎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经济的两大基本变量,那么,我们必将发现所有的可能已被包揽无遗。”^①

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韦斯科夫则早在70年代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危机产生的根本根源,并以此

^① 阿特韦尔:《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第200页,Rutgers州立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

说明和区别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不同流派。首先,韦斯科夫依照平均利润率下降的不同根源而划分为三种不同的论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工实力增强论和实现失败论。并进而据此划分出利润率下降趋势下的三种大流派:①ROC(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流派,即有机构成提高论。其论证主要立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有机构成理论。认为对利润的威胁来自由于技术变化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资本成本。代表人物有多布、耶菲、马蒂克、科戈依、谢克、斯特拉彻等。②RSL(Rising Strength of Labours)流派,即劳工实力增强论或工资导致利润挤压(Wage-induced Profit Squeeze)论,代表人物有博迪、克罗蒂、格林、苏特克利弗、拉宾。他们侧重于从阶级斗争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去加以论证,认为劳动成本的提高导致利润挤压,而不仅仅导致通货膨胀。③RF(Realization Failure)流派,即实现失败论。他们认为,对赢利的威胁不是来自生产领域,而是流通领域。代表人物斯威齐和巴兰力主两种类型的实现失败论即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并进而发展成为长期的经济停滞论。最后,韦斯科夫在收集了美国 NFCB 部门(1949—1975年)提供的利润率下降的有关经验数据,用以验证和比较这三大流派的用以诠释利润率下降的不同机制。其结论是,这些机制有可能同时发生作用而相继压低利润率,(其中,劳工实力增强对利润下降的作用最大),但都可以演绎为一种利润率短期周期下降的理论模式,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或者一种利润率长期下降的理论模式,用以解释下降的“长波”时期或者永久性停滞。

阿特韦尔和韦斯科夫抓住剩余价值率、有机构成或利润率的变化(并辅之以经验数据的实证方法)来阐释经济危机,并由

此出发,把其他危机理论统一于其构筑的理论模型之中,这与哈维的三层次危机理论模型、谢尔曼的计量化周期模型有类似之处。但是,阿特韦尔和韦斯科夫既没有把剩余价值率、有机构成或利润率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也没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各个层次和环节上的具体表现(如阶级斗争、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等)都视为造成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必然以偏概全,从而把马克思对其危机理论某一方面的论证看成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唯一和主要的内容,这也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研究中的通病。曼德尔(他反对从个别因素和单一变量入手,并力主从各个因素和六大基本变量的相互作用和综合结果来阐释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也许是一个例外。

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史的考察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理论史的研究,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史的研究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危机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保罗·阿特韦尔(1949年—)在其代表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中,对此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第一阶段(1940—1970年)

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加强了美国学者在危机问题上的发言权。他把危机理论分成两大类,即

利润率下降危机论和实现(销售)危机论,并对前者持批判态度,并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论证属于后者的消费不足论,而把杜冈·巴拉洛夫斯基的比例失调危机论贬入次要地位。所谓消费不足危机的命题,是指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工资及其消费的限制,与通过剩余价值再投资的无限循环所造成的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过度的生产能力造成商品积压、价格下降乃至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要么是过多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从而导致周期性停滞和萧条。斯威齐进而指出两种抵制和消除消费不足倾向的反趋势或起反作用的因素,其一是在短期内可减缓新投资增长从而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其二是提高相对被约束的消费需求的新因素,如人口增长,非生产性消费和政府开支的增长。斯威齐甚至把国家看成是提供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强有力的工具。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重申了上述观点。强调指出,垄断组织通过领导价格制形成的垄断价格形成大量垄断剩余,利润率下降趋势已遏止,这些剩余又为非生产消费、军费支出、促销支出等所吸收,因而美国战后有一段发展的繁荣期;但消费不足仍然是美国战后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最终无法摆脱过剩的社会生产能力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

斯威齐的理论影响了好几代的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并在几十年内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定下了基调:消费不足问题(并非是利润率下降趋势)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讨论的中心,从而把格罗斯曼掀起的关于利润率的争论再度转向消费不足论。

第一个把资本有机构成或利润率变动从逻辑推断转向度量化的,正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曼在他的《利润

率下降》(1957年)一书中提出的。他整理的大量经验数据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工业化发展时期确实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利润率下降,而战后的统计资料却否定了利润率递减规律,资本有机构成发展平稳,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上升。他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种历史的特例,它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的阶段,可是当马克思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应用于经济高度发达与高度工业化的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它自身难以应用,无法被证明;因为通过现代技术提高了生产力,但此举并不要求投入大量资本——因为科学技术的变化涉及质量与设备类型或品种的变化而并非数量与成本的变化,即为了获取较高的生产力并非一定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他觉察到垄断资本的第一个特征即实现成本(Realization Cost)的上升,它缓解了生产能力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平衡是暂时的,资本家的利益以消费为代价提高利润,消费者的利益则正好相反,这将是一场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平衡消费与提高利润之间的拉锯战。除吉尔曼之外,维克多·珀洛是美国消费不足理论家集团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阿特韦尔认为,珀洛其人代表美国政治经济学正统路线。他并不反对有机构成或利润率下降规律,并在其《不稳定的经济:1945年后的美国的繁荣与衰退》(1973年)一书中,采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而摒弃了斯威齐的剩余概念,着重分析了美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篇著述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70年代的美国的经济仍是在危机和波动状态下持续发展的,但他没有强调利润率下降规律,其结论仍然是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归结为停滞的消费需求与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冲突。总的来讲,斯威齐、吉尔曼和珀洛这三个人的著作“表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至 70 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消费不足理论占牢固的领导权与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形下,其著作引述了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递增的经济资料。作者把这些资料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经验证明,而且也将国营部门的活动与非生产性工人的扩展视为对其结论的支持。”^①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家。但同时也受到反对派的下述指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如“有效需求”、国家干预消除就业不足危机等观点)太深,以至于采纳凯恩斯“流动偏好”术语的珀洛被称为左派凯恩斯主义者。阿特韦尔强调指出: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并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消费不足的命题也散见于马克思、考茨基、卢森堡、卡莱茨基的著作里;但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把国家干预视为暂时的或有限的反危机倾向,最终以加剧经济危机为代价;新右派、货币主义者、平衡预算论者也从某种意义上接受这一观点。

第二阶段(1970 年至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确立,新的一代马克思经济学者开始突破斯威齐的传统危机理论,涌现了一批创新性理论,如财政危机论、垄断性通货膨胀论、利润挤压论、长波理论、剩余价值—利润率下降论等,从而步入危机理论的繁荣时期。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也开始让位于一种“国际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激进政治经济学。

奥康纳是 70 年代早期试图沟通美国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① 阿特韦尔:《80 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英文版,第 180 页。

学术关系的核心人物。他的代表作《国家财政危机》(1973年)强调成本的社会化与利润的私人化造成了财政危机或结构性缺口,即国家支出与收益之间的缺口,从而把财政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他的危机理论已显示出对斯威齐传统危机理论的离心倾向,而与德国学者的观点相近。

但是,斯威齐仍坚持他的观点,仍然低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意义。他说:马克思并未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特别的危机理论,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了。……对马克思来说,利润率下降趋势不过表现了资本主义许多矛盾中的一个矛盾;而且我看没有理由相信,假如他预见到未来技术变革的方向会减轻甚至消除这种在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转变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矛盾,他将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活力”^①。

拉夫德·博迪和詹姆斯·克罗蒂在《阶级冲突和宏观政策:政治性的经济周期》(1975年)、《工资驱动和工人阶级力量:答霍华德·谢尔曼》(1976年)等文章中,对消费不足论进行了公开的系统的批判,并把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利润挤压理论应用于美国。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和鲍勃·萨克利夫曾在其撰写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与利润挤压》(1972年)中指出,英国企业处在两难境地:相对充分的就业和工会化使工人开始成功地超越生产力来增加工资;又因外国竞争,英国公司难以通过价格来补偿这种损失,公司的利润正被挤出,利润率下降;并且,工会组织对工资削减的抵制,

^① 斯威齐:《资本积累理论中的一些问题》,第49页,载《每月评论》26卷,1974年第1期。

被指责为加剧通货膨胀、破坏英国产业的和谐,以及恶化赢利能力。博迪和克罗蒂引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在每个经济扩展的后半期已下降而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或者说,每一次经济的跌落总是用劳动挤压或侵蚀利润的倾向而诱发的。他们甚至得出下述奇怪的结论:经济萧条或衰退的产生,是资本家出于旨在阻止工资上涨的长期目标而愿意承受的痛苦。并且有意回避或掩饰经济萧条会损害利润这一事实。因此他们的理论在美国遭致许多人的指责。

谢尔曼就是指责者之一。他大体上接受斯威齐和巴兰的观点,既反对利润下降学派,也反对利润挤压学派。在他看来,经济周期中的萧条根源于暂时的利润率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利润率变化并未显示出下降趋势;工资增加也不会挤压利润,利润率下降恰恰是原材料成本上升、需求不旺和信贷紧缩的结果。其理论特点是把消费不足与有机构成增加结合起来,用以阐释经济周期。他打破凯恩斯学派的通货膨胀旧模式,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所谓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代之以因工资增加形成的成本推进通货膨胀模式,并认为垄断组织力图加剧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谢尔曼强调指出:通货膨胀是治理垄断性危机的一个特殊手段,一种无意识的毁灭,即随着垄断公司在萧条期间更努力地尝试避免利润损失,结果情况更日趋恶化。

美籍德国学者保罗·马蒂克及其追随者的加入使这场争论更趋复杂化。马蒂克是格鲁斯曼崩溃理论(“一个有机构成上升、利润率下降命题的变种”)的追随者。在他看来,垄断资本并非像斯威齐和巴兰所说的有大量剩余,相反地,剩余资本量严重的周期性短缺状态,以及国家干预(如国家通过征税扩大国家支出),只会恶化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总崩溃,因而资本主义的

唯一解决方式便是攻击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通过削减工资来提高其利润。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还从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中汲取营养,其中有戴维·戈登、理查德·爱德华兹、迈克尔·赖克和沃勒斯坦等。在他们看来,“古典周期”或小周期理论以及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等危机理论总是不能解释,而长波理论却能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近30年的长期繁荣,以及随后70年代以来的滞胀和衰退。因此,“尽管长波理论自身并不是危机理论,但它为危机的不规范性提供了解释,从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①

这一时期较为系统地考察经济危机理论及其论战史的激进派人士,首推阿特韦尔。首先,他强调危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危机理论和政治革命的特殊关系。他认为,危机理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危机不仅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性特征的社会再生产的危机,而且促进阶级分化和政治分化,是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原动力,因而危机也是一种“将经济萧条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的机制”,危机理论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理论”,并且英美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均把危机理论当做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知识性世界观组成部分”,^②甚至也是左派理论家或激进派人士世界观的核心部分。而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如新古典经济学,既不能科学地预见也不能正确地解释危机。他们精巧构筑其均衡与和谐的模型,而完全忽略和否定利益冲突和系统内在对立的任何可

^① 阿特韦尔:《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英文版,第192页。

^② 同上,第147、203、205页。

能性,徒然地求助于外生因素(如气候、政府的无能),因而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危机。在阿特韦尔看来,唯有包括危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一个在科学上更具说服力的学说。

其次,他以论战内容作为划分的依据,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危机理论史(1850年至今)划分为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马克思、恩格斯危机理论的形成时期,它大致形成于1850—1862年期间,1857—1858年的大危机使其关于危机理论的研究达到高峰。

第二阶段(1860年至1900年的俄国),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次在半封建的资本主义俄国引起激烈的论战。俄国民粹派鼓吹消费不足危机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倡导比例失调危机论。

第三阶段(1890至1914年的德国和奥地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首次受到公开的修正和激烈攻击。第一轮攻击来自伯恩斯坦,继之有庞巴维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罗莎·卢森堡把帝国主义与危机相联系,考茨基则砍断了这种联系。

第四阶段(1918至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休整时期),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使“崩溃”理论再次成为研究和论战的焦点。其中,论战的第一回合是在列宁、布哈林、格罗斯曼等人与罗莎·卢森堡之间就帝国主义与总危机(总崩溃)相互关系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第二回合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固守传统的比例失例危机论,用以反对德国学者的危机理论。第三回合是法兰克福开始探讨国家干预和垄断组织防止和减轻危机的问题。

第五阶段(1940年至今),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掀起热潮;而马克思逝世的第一个50年,一般是德国与俄国的危机理论占主导地位。

最后,阿特韦尔对激进的英美危机理论的差异作了比较:即①两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都把马克思危机理论视为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知识性世界观。②英国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理论派别(如“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论争之风甚盛。③美国经济危机理论颇多折衷主义,看重经验和经验证据分析工具,注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在学术上的合法性与在实践上的适用性,理论创新或者“离经叛道”之风颇盛。④美国理论界在前期一度流行消费不足论而排挤利润挤压论,战后美国资本的能量、良好的盈利能力及恢复力,已减少人们对有机构成一利润率下降观点的信仰,而对浪费与过剩生产力的批判,比批判利润率下降概念更接近于美国的现实。相反,受国际收支危机与通货膨胀之困扰和工会对抗达20年之久的英国,利润率下降观点及利润挤压观点更有经验的说服力,而大量剩余利润闲置的概念似乎太不现实。

第四节 激进的政策纲领和社会模式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政策建议、施政方案和社会模式是五花八门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一类反对或者起码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制度。后者以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如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居多。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所讲的“社会主义”大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但应予说明的是,其中不乏可供借鉴的合理因素。

一、“新社会主义”

新制度学派领袖——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异端者”、“激进派”、“哈佛大学支持激进经济学的三大名教授之一”——加尔布雷思否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居；否认自己是革命论者，而以“改革论者”自居。他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模式，并未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

所谓新社会主义就是从所谓“公共利益”出发，在市场系统、非垄断组织或中小企业与计划系统、垄断组织、大企业之间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比例和平等关系，并通过国家干预弥补这二个系统各自的缺陷，消除权力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等。具体政策主张包括：(1)建立技术专家体制或社会工程体系；(2)通过累进所得税制消除收入不均等，主张通过国家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主张各民族工人的工资不受歧视，等等；(3)反对通货膨胀，主张政府应实行对工资与物价直接管制的政策；(4)通过立法手段，清除环境污染；(5)增加国家预算拨款，用于增进社会福利；(6)保证各部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7)实行最大公司的国有化，主张军事工业公司应首先实行国有化，等等。

新剑桥学派也提出类似的一套激进的改良主义纲领和政策主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在于收入分配失调，并由此而引起社会一系列矛盾，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经济政策的根本点，应立足于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实现收入“均等化”，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片面地以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也反对他们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收入政策。但他们

热衷于抨击某一特定的社会靶标如“吃租资本家”，但不是攻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琼·罗宾逊的社会理论的实质，就是关于“通过废除吃租资本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并不要求在社会制度结构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而只是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兜圈子，力图完善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大力主张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亦即主张混合经济，而无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倾向于推进和执行新制度学派所设想的技术专家体制或社会工程体系一类的激进政策。

具体的政策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从加强福利措施和改进现行税制入手，用以实现收入均等化，减轻所谓“富裕中的贫困”。另一类是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社会管制，即通过投资社会化，调整就业结构和方向，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避免和消除战后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种种弊端。鉴于新剑桥学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和纲领是其理论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保守派、自由派，以及激进派中的许多人对此表示失望。保守派会对关于收入的分配可以在不削弱经济体系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大大改变这一结论，感到不高兴；自由派会对关于竞争性市场对于经济体系的有效活动并非是不可少的这一看法不高兴；而激进主义者会对关于即使在机构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可以保持稳定的看法感到不高兴。激进政治经济学家 M·布劳格在《剑桥革命》一书中，抨击了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的所谓“社会主义”；她对著名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同样拿不出多少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总而言之，这种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但究其本质只是一种以维护私有制为前提的，只在分配领域兜圈子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

综上所述,属于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新制度学派、新剑桥学派所谓的“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缺陷及其不良后果,但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假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二、民主社会主义

激进政治经济学内部曾开展了一场关于“可行性社会主义”与“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前者以谢尔曼、诺夫等为代表,强调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后者以曼德尔、安德森等为代表,强调民主政治和中央计划的最佳结合。他们的共同点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搞社会主义,并且都把民主政治以及公有制、充分就业、非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和平等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因此这种社会模式又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靠谁实现社会主义?激进派在这方面的论述较少。

谢尔曼设想,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可以自然而然地由公民通过合法选举途径的抉择中产生出来。并且设想通过实施三个“怎么办”方案来实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首先是实施“当前怎么办”的方案,即举行有限的改革。在谢尔曼看来,相当大数量的人厌恶资本主义,因此,①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压力下,通过一项旨在保证充分就业和使人人有工作的法律,并使政府成为最终的雇主。即使这样的方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施,但为实施它而进行的斗争将导致许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②首先争取某一个部门的公有制,如争取使城市公用事业变为市

政所有制(禁止私人公司插手)以及石油工业的国有化;③免费的公共保健;(4)反对种族歧视。

其次是实施“长期该怎么办”的方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谢尔曼设想,在美国只要把1000家最大的公司收归国家所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主义。这些大企业大约占全部公司财产、销售额和利润的2/3;这些国有化企业的大部分管理权可交由正式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任命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半由政府直接任命,一半由企业工人民主选举产生。这种工人的管理是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

最后是“更长的时期”怎么办的方案。谢尔曼设想这样的社会的特征是:一切产品都是免费供应的,没有工资,每个人都为社会公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显而易见,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是一批对现行制度变革的理想主义者,盖有空想主义的烙印。

激进派一般把社会变革的希望放在工人阶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身上。在60年代,老左派或一部分新左派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排斥暴力革命可能性)的主力。80年代以来,激进派一部分对无产阶级的涵义展开了讨论。有的把无产阶级界定为蓝领工人或产业工人,有的则说成是白领工人或“新工人阶级”;未来社会主义的权力将落入新工人阶级的精华即专业和技术人员之手。有的将无产阶级易名为“工资阶级”,并鼓吹这一阶级将占工作人员的90%。这一论调已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修正”得面目全非了。

三、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其渊源可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阶段),成形于20、30年代,中经40、50年代(20至50年代为第二阶段)的冷寂期后,在70、80年代(第三阶段)又再度复兴。作为激进派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一学派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受到正统经济学的攻击,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到来自激进派内部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其次,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所有,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构成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其方法论特征就是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理论加以综合,有的公开宣扬旨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本质区别的“趋同论”。

此外,这一学派有两大主要理论:

1. 中性机制和联姻理论

这一理论将资源配置视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它主张:资源配置形式(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可从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可从一种经济环境或制度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或制度中去;市场机制(计划机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结合,也可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联姻。

西方学者早在60、7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以及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或工具的思想。而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在80年代提出的“联姻理论”是对“中性机制论”(Neutral Mechanism)或“资源配置手段(工具)

论”的进一步明确化。其宗旨就是既批判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所谓市场与社会主义颇难相容而不能联姻的观点——无论是左派(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处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两极;市场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的结合,纯属胡说八道,因为两个术语是彼此矛盾的——也批判所谓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以及计划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强调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力图“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①

他们在中性机制论的基础上进而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然运用这种市场或那种市场,必然依赖政府干预或计划调节用以克服市场失灵或弥补市场缺陷。如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大公司和国家都使用计划技术,而在现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系中,市场提供了一种辅助性制度。并且还从目的和手段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社会主义有一整套总体目的,如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等,而资源配置方式、交易方式或技术手段(如计划、数量信号调节抑或市场、价格信号调节,政府决策抑或企业决策)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妨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相

^① 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第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信完全可以构筑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

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善于把资源配置的两大主要形式即市场机制及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地位,这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但同时要看到,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又是和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相结合的,并且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侈谈中性机制,是违背关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运动法则的。

2. “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

市场主导机制理论是继中性机制、联姻论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在60、7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学派或某些西方学者还未打破前一阶段形成的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列的折衷主义的二元机制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荷兰的W·凯泽(主张自发的市场机制和中央投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意大利的F·维多(提倡建立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法国的莱·阿隆(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美国的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结合体)等。澳大利亚的J·维京斯基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实质上它表现出这两种机制的和平共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

协调一致的合作。^①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 80 年代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从以往倡导的二元机制论上升为市场主导机制论,强调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明确指出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或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市场主导机制论的主要鼓吹者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不仅应力图克服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反市场倾向,抑制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用中央集权手段和计划方式干涉经济的倾向,而且进而把市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

他们详尽剖析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优点与弊端。在他们看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机制形式,因此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大多数激进学派人士崇尚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正确的答案是:“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两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

^① 参见凯泽:《苏联对经济合理化的探索》(1971年);维多:《集体计划经济中的分散化》;阿隆:《工业社会讲义 18 篇》(1968年);维京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学》(1977年);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第 1 版)。

有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① 换言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或“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计划(而且主要是指导性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而又没有威胁要取代它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即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这种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市场主导机制论无疑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不能因此贬低计划机制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应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是与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家鼓吹的混合经济论有区别的。后者是讲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主导机制论。

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上述理论,与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 年)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脚,提出了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三层分立模式。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是透明度很高的现实,它是指与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交易所、银行、交易会——当然还有市场——相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

市场经济意味着解放、开放和竞争,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不

^① 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第 1、14、144、107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年版。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秩序。市场经济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的不透明层次是资本主义即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是资本家为了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而不惜打乱既定的秩序,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

这种三层分立模式,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念。换言之,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有时是反资本主义的经济。他说:“这个三层分立的模式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可能读者会认为本书中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在这个模式。这样岂不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术语上分得过分清楚,甚至对立起来吗?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犹豫、一下子就接受这种看法的。我后来终于承认,在15—18世纪期间,甚至更早,市场经济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带强制性的秩序(社会、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样,它曾分别朝上和朝下排挤自己的对立面和对抗力。”^①无疑,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与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是一脉相承的。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有市场,而且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有其适宜生长的土壤。其代表人物之一是阿根廷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普雷

^①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0—2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维什(1901—1986年)。他早期是狂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40年代首先提出反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并将其发展成为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论和拉美经委会主义。但在后期推出“体制改革论”和“重新定位论”,并着手改造外围资本主义,使之成为既区别于“正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新古典派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这一综合可能是外围对其改造的特性作出的回答”和“外围发展的新途径”。^①

《外围资本主义》和《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这两部著述集中反映了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观点是:

(1)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有益的基本要素,主要表现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综合。

在他看来,市场是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并可以通过努力使市场改造成为一种兼顾社会效益的适当机制。他批判了新古典学派的下述观点:市场规律(价格体系及其均衡趋势)应该起经济最高调节者的作用。在他看来,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公和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等问题,而计划是一种“体制性机制”,计划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剩余的社会占有”而不是“剩余的私人占有”。因为后者必然导致混乱,阻碍着计划以有意识的、合理的形式对发展的诸种要素施加影响;这样一来,计划就获得一种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不具备的意义,从而成为为达到市场运转不能达到的目的而实行的一种高级干预,以及国家有预见地决定对脱离市场运行的生产结构实行重大改革。他批评正统社会主义的官僚化和臃肿症,主张成立一种有巨大独立

^①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第21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性的制定计划的“技术当局”。

(2)体制改革的涵义就是实现(政治)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综合,在他看来,这种综合不是折衷主义的。它们原是从同一个哲学观念中产生的,然而,巨大的结构性障碍造成了它们的分离,但这决不会是最终的分离,两者在改造过程中必定重新汇合到一起。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指资本积累速度和收入分配应当成为集体决策的目标,以纠正结构性差异;为了保证剩余纳入社会用途,必须有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是指生产和消费的个人决策,但涉及诸如生态保护等重要问题,也必须通过集体决策来决定,只要生产和消费的个别决策应由市场作出,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十分明确地指出,普雷维什已舍弃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选择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经济体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阿伯特·菲什诺指出:普雷维什思想发展的第五阶段的成果,就是选择了“人道的、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把普雷维什列入发展经济学最杰出的少数几个先驱人物的行列,指出后者为了解决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危机问题,而“希望市场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模式作了系统的归类和阐释的一个人,首推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默。他在《社会主义未来》(1994年)一书中,主要对三种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作了概括。第一类是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模式,其中包括雅克·德雷兹方案、托马斯·韦斯科夫方案和马克·弗洛巴依方案等。第二类模式的典型方案是由普拉纳伯·巴丹和罗默设计的,其特征是保留传统管理方式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

性。第三类模式不触及企业所有权归属问题,主张通过企业和银行管理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权力均等和收入均等,其中包括F·布洛克方案和科恩·罗杰斯方案。布洛克方案鼓吹“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主张通过立法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创立公有制商业、投资银行用以加强金融部门的竞争,并以雇员、股东和用户(各占1/3比例)组成董事会。科恩·罗杰斯方案即“联合民主”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给予社会团体(如环境保护协会、调查者协会、工会)以更大的政治权力,从而能有效地干预企业经营行为。这三种模式对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触动程度一个比一个弱,从而充分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改良性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三章 激进的发展理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经济落后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解决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的问題。这是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或“激进主义发展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语出自巴兰的著作即《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952年)，巴兰因此(还有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而被誉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理论因其把外围资本主义特有的依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发达的发展”和摆脱依附状况的出路等问题，放在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背景中加以考察，并批判西方传统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如新古典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因而被视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故称之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新帝国主义论”、“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欧美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大论战中丰富和推进了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或不发达政治经济

学,并在这一理论领域衍生出若干流派和理论,如第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不发达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中心—外围论)、拉美经委会主义、新依附论、结构主义依附论、联系性依附发展论、不平等交换论、世界体系论、殖民地生产方式论、体制改革论等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激进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在 60 年代对拉丁美洲不发达问题的探讨和论战中形成的。60 年代初,一批巴西学者试图用依附理论来解释拉丁美洲与发达国家的关系。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智利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在圣地亚哥发起组织学术讨论会,从而成为依附理论研究中心和集散地。巴西研究和计划中心、中美洲社会科学计划、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拉美研究中心等单位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随后从拉丁美洲扩展到许多地区和国家,其理论派别纷繁多变,盘根错节。依附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列宁对落后国家(其中包括俄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及其帝国主义理论,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三国际对落后国家社会经济特点和革命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分析等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要研究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把不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置于从属地位,因而不可能对后者作出更深入、更系统的论述。多布和巴兰则是早期依附理论的奠基者。依附理论的直接来源,当推 50

年代形成的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义(简称“拉美经委会主义”),亦即结构主义发展主义,其发展全过程大致分成三大阶段,即酝酿阶段(40年代末至50年代)、形成阶段(60年代)、发展和分化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

一、巴兰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巴兰是第一个对当代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并且在发展经济学中最早勾勒了依附理论的轮廓,以至于被称为“依附理论之父”(加布里埃尔·帕尔马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952年)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他的理论还被称为开创了研究帝国主义与不发达经济问题新道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巴兰丰富和发展了多布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发达与不发达两大部分,而加速工业化是不发达国家获得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的出路的观点。他在《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批判了西方传统的所谓资本主义和谐一致的谬论,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格局归结为发达国家(工业化社会)或不发达国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的对立。他认为,这种对立表现在发达国家资本流向落后国家,但主要为了从中攫取利润,并不能改善落后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它带来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条件的因素,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有效地破坏了落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用市场契约替代了世代保留下来

的那种宗法关系,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商品生产的方向,并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实际情况是:封建地主的古老剥削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压迫造成了双重的剥削、变本加厉的腐败和更为明目张胆的不公正。因而其最终结局是落后和停滞。

接着,巴兰探讨了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道路的问题。在他看来,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解决落后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缺点的不发达国家势必阻碍经济增长,唯一的途径是“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并且预言“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必然会走向经济计划和社会集体主义”。^①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则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置于垄断资本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前两章中首次提出经济剩余概念,分析和阐释了垄断资本主义。后三章则以对经济剩余的产出和吸收为分析的出发点,着重探讨了发达社会和不发达国家的特征和相互关系,目的在于寻找解决下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沿着人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中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呢?为什么前进缓慢,甚至根本不前进呢?在巴兰看来,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攫取剩余和吸取剩余双重目的,对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阻止其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并迫使它们从属于不平等贸易关

^① 巴兰:《论关于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第84页,载《曼彻斯特学院学报》1952年1月号。

系和重组适应其需要的经济结构,最终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流向发达国家。巴兰强调指出,发达国家的发展正是在牺牲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不发达国家始终代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不可或缺的“穷乡僻壤”,这是造成世界经济两极化结构的根源。巴兰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以及政府对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来影响和支配不发达国家。商品输出往往无助于商品输出国吸收剩余;对外投资即资本输出就是剩余的外流,但同时也存在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如由资本输出而获得丰厚利润的回流肯定会超过资本的外流,因而无助于剩余的吸纳;唯有政府对外活动费用的支出较之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吸取国内大量剩余,有助于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需求不足的危机。巴兰强调指出,这种支出的“巨大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形式的经济剩余的使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外经济活动所引起的收入和就业效应。与前者相比,后者实际上只具有偶然的意义”。^①

其次,不发达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不发达国家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而对经济剩余的利用不当又是由其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巨大而落后的农业、规模小的工业部门(包括一定数量的涉外资本控制的企业)和大规模的商业部门所组成,它的各个部分都起着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部门剩余的相对量较大,但因投资刺激太少而挪作非生产性使用,或者剩余流向发达国家。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来自国外的竞争、国内市场狭小以及垄断,其症结在于

^① 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246页,1973年纽约版。

缺乏投资刺激而不是剩余匮乏。外资企业则热衷于将大量利润输往国外。商业领域因其资本分散和地方化垄断,因而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发达国家无论是殖民政府、买办政府还是“新政”政府任意处置和浪费剩余,或者因其力不从心,均不能有效地支持本国经济的增长。

巴兰认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各个角度扩张,新的地区主要是并入不发达部分,只有少数加入发达部分。他阐述了印度和日本以不同方式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一个成为不幸的依附者,另一个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强有力的竞争者。不发达国家一旦落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陷阱,就不能摆脱落后和依附状态。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挣脱出来,才能有计划地使用经济剩余,真正形成有利于其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总的来看,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和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依附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巴兰学说的影响。

二、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体系论

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年)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拉美经委会主义的创始人,生于阿根廷的萨尔塔。1923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曾任阿根廷财政部副部长(1930—193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1925—1948年)、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1948—1962年)、拉丁美洲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所长(1962—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1964—1969年)、联合国秘书长发展问题顾问以及《拉美经济委员会评论》的主编。主要著述有《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50年)、

《1949年拉美经济概况》(1950年)、《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革》(1981年)和《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等。他提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即中心—外围不平等结构体系及其发展模式和政策主张,以及对传统或主流派国际贸易理论的批判,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依附学派有直接的广泛的重大影响。

普雷维什早期是狂热的新古典主义者。但是,在40年代末,他首先提出了反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论和拉美经委会主义。在普雷维什看来,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组成的。这种两极格局形成一个排斥性的体系:一极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极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并且限止和阻止外围的发展,中心与外围是不平等的关系;外围资本主义本身也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因而外围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其中包括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的矛盾,最后形成中心国家日益发达、外围国家则无法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国际经济格局。但是,这对立的两极又是相互依存的,并互为条件地密切结合成一个单一体系,其基本性质是动态的。

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是普雷维什分析的重点。他认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是具有同质和多样化的特征;“外围”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异质和专业化。异质表现为生产率显著不同的生产活动同时并存,一端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出口部门,另一端是劳动生产率特别低下的温饱型农业。专业化特征则是因为出口部门集中生产少数初级产品,其特征是生产被限制

在外围经济结构的“飞地”之内，它与其余经济部门的前后联系十分有限。外围国家的失业问题和结构异质相联系；而收支差额不平衡和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则与过度专门化相联系。两者在一起造成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收入差距的日益增长。

普雷维什不仅着重分析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生产水平)，而且也跟踪分析外围国家的国际贸易格局(流通水平)。他批判建立在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基础上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这种理论宣扬世界贸易自然产生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双方而言，具有互利的基本特征，掩盖了外围国家贸易条件、贸易利益不断恶化的趋势。实际上，集中生产制成品的“中心”的贸易利益，无疑要比注定主要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的贸易利益要大得多。并进而提出著名的普雷维什假说或模型。西方学者称之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这个假说着眼于经济增长对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效应和影响，并从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两大要素着手分析，指出，随着中心与外围进行贸易，后者的贸易条件呈现结构性的恶化趋势。在两极同样的增长率条件下，外围对制成品进口(从中心国家)的需求和对初级产品出口(向中心国家)的供给都有增长的趋势。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这势必提高所有这些国家的进口货的价格，并压低它们的出口货的价格，从而导致外围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换言之，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不利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国家，因为初级产品价格低，收入弹性小，以及中心国家偏向于用技术进步来节约原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价格。而避免上述情况的方法就是转变生产结构，其转变的关键就是工业化，它能够提供收入弹性高的进口商品(制成品收入弹性大于1，初级品收入弹性小于1)并最终也能生产价格弹性高和生产率更易传播的出口商品即制成品。

应该指出,普雷维什假说是与包括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内的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后者认为,由于土地、矿产资源稀缺,初级产品生产的效益递减,因此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制成品而言会呈上涨趋势,再加上人口过剩的压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两大因素会使工资和制成品生产成本保持低水平,其结论无疑是:贸易条件在长时期内应转向有利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可见,普雷维什假说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主流派经济学的反动。50年代,在普雷维什和美国学者雅各布·瓦伊纳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者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宣扬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认为随着工业产品有机构成的提高和价格下降,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带来更多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只有保持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其结论是巩固和发展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普雷维什则以大量材料论证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趋势和中心—外围格局的不平等关系,提出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日益不利的“普雷维什假说”。他揭露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一切服从中心利益而牺牲外围利益为特点的,强调必须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他被誉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普雷维什还不断招致来自左右两翼的激烈批判。左翼(如弗兰克、卡普托、皮萨罗)批评他只从“内部”而未能借助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国际贸易论来批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且不能充分指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右翼斥之为异端邪说,并给普雷维什等拉美经委会成员扣上“马克思主义的特洛伊木马”的称号。

普雷维什在后期曾多次阐释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的关系,但他对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把依附概念扩大到全部的

中心—外围关系之中颇有微词。他在《外围资本主义动力》(1980年)一文中对依附性下了定义:关于依附性,我指的是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受制于中心国家的决策,这不但体现在经济事务上,而且包括政治事务以及内、外政策的战略,其结果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这个国家不能自主地决定它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在他看来,外围的“依附”是相对于中心的“霸权”而言,并力图通过结构改革用“自主性”取代“依附性”。他区分和阐释了“依附性”和“相依性”,前者是单向性的外围对中心的依赖和附属,后者是强调相互依赖和依存,并且强调既有积极的相互依赖,也有消极的相互依赖。他还区分了几种依附形式:经济依附(将外围排斥于工业化之外的国际分工格局,从而被赋予的附属地位)、政治依附(中心国家统治集团与外围国家统治集团的勾结,并分享后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否则便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惩罚性措施)、技术依附(不适合外围条件的技术选择和模仿)、文化依附和意识形态依附。并强调依附性会造就外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模仿性资本主义”,但是其结局是永远不能摆脱依附地位。

普雷维什还批判了依附学派中存在的中心—外围“脱钩论”和中心—外围“服从论”。前者忽视中心地区巨大技术进步的影响,强调中心地区的财富基本上是外围地区创造的。在普雷维什看来,应利用外围与中心的联系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发展。后者则强调无条件地服从中心地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外围资本主义现象及其发展必须置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之中,否则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在他看来,不应盲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而应选择或者创造符合外围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

在中心—外围体系结构基本分析的前提下,以普雷维什为

领袖的拉美经委会学派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了“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力图构筑一种“把中心外围格局及其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战略方针和发展模式,如结构失衡的外围国家出路在于工业化,适度和适当的保护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发挥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主张地区经济一体化,在维护自主权原则基础上利用外资等,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拉美经委会主义体系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除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外,还有二元结构主义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外部失衡理论(胡安·诺约拉)等。这一学派在6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并在70、80年代转向“体制改革论”和“重新定位论”,彻底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两大神话,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把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带到世界各地的神话,另一个是外围按照先进国家的模式发展的神话。并着手改造外围资本主义,寻找新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亦即既区别于“正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新古典派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这一综合可能是外围对其改造的特性作出的回答”和“外围发展的新途径”。^①

依附学派直接从普雷维什的理论吸取营养(其政策主张却大多遭到批评)。不可否认,普雷维什的理论对促进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把剩余论作为中心—外围体系的理论基础,大肆兜售巴兰、斯威齐的经济剩余理论,这无疑是错误的。另一重大错误,是他强调马克思和凯恩斯理论没有涉及外围,凯恩斯注重研究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储蓄过

^①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第21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度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英国资本主义(中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的曲解和贬低。

三、依附学派的理论派别和基本观点

依附理论形成于60年代,70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一般认为,依附论直接来源于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以至于把依附学派人士称之为第二代“外围”理论家。依附学派及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张,以及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从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种新的变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从而出现理论危机。一批激进的巴西学者和智利学者(多斯·桑托斯领导的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自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到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期间,一直是依附学派的大本营),以及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的弗兰克,力图用依附论来解释拉美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的新变化。他们还同美国和欧洲的有关学术团体建立联系。依附论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派别。主要理论派别有:

(1)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论”,并主张“停滞论”和“脱钩论”。其成员还有圭亚那的沃尔特·罗德尼,他在《欧洲怎样使非洲不发达》(1972年)一书中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被列入依附论学者中持强硬立场的激进派,并受到“封建派”和依附论主流派的批判,从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2)结构主义依附论。其前身是40、50年代形成的中心—外围理论(普雷维什),主要有在拉美经委会内部形成的结构异类化理论(阿尼瓦尔·平托)、收入集中理论(佩德罗·布斯科维奇)、支配—从属关系论(奥斯瓦尔多·森克尔)和外部依附论(塞尔索·富尔塔多)。这一派被认为是具有保守的温和的改良主义的色彩,较多地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成分,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工业化和群众参与来改造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经济的自主性发展。

(3)依附论主流派(也称狭义依附论、新依附性论)。包括以多斯·桑托斯为其主要理论代表的“新依附论”。此外,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在《巴西次帝国主义》(1972年)中提出超级剥削理论,力图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提出边缘化理论;瓦尼娅·班比拉提出关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分类方法。他们与巴兰、弗兰克一脉相承,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烈批判资本主义和追求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较多,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内部结构从而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

(4)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索提出与不发达发展论相反的观点,即强调发展和依附相联系的一面,注重分析依附性的国内结构和政治因素,认为它们较之经济因素和国外因素对于依附形式更具决定性作用,因而也称为国内依附论者。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善于将结构主义依附论和狭义依附论加以综合。其代表人物还有智利的恩佐·法莱托。

(5)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和希腊学者阿吉里·伊曼纽尔被誉为第三世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

们对依附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依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分支。阿明的理论是对自巴兰以来关于不发达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大综合,形成一个有一定创见的首尾一贯的整体。伊曼纽尔率先提出不平等交换理论。他力图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和生产价格论的基础上,用国际生产价格公式(着眼于工资和利润率的国际差异)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为阐明不平等交换、国际剥削,以及依附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上述理论派别并非是详尽无遗的谱系图,仅仅粗线条地勾勒了一条依附理论发展的主线,因此远远不能包括依附流派中其他学者或派别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研究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和成果。

依附理论虽然派别林立,论战纷繁,对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依附形式、依附和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摆脱依附的方向和具体政策,存在许多分歧,但基本观点大体一致。其一,依附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主要是探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后者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所制约的依附状况,以及制定摆脱依附走上自主发展的途径和政策主张。其二,依附的界定和依附的表现形式。依附学派大多接受多斯·桑托斯所下的定义: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这种扩展对依附国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

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依附形式则随不同历史时期而变化。其三,依附的性质和结构。大多认为,中心—外围或宗主—卫星两极结构、外围积累模式和中心积累模式的对立模式,以及外围国家内中心(城市)—外围(乡村)二元结构,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格局之中;发达与不发达、霸权和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第三世界是一种依附性或外围资本主义。其四,依附、不发达和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形成的旧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经济秩序。其五,摆脱依附地位的途径。大多主张反对简单模仿中心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理论和政策,反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即西方化理论,以及一味模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而照搬和依附西方文明。应注重研究对阻碍落后国家自主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来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其六,依附理论作为一种激进色彩浓厚的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或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般都反对西方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而对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传统观点、方法论或分析工具,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却能兼收并蓄,并因侧重点不同而形成各种依附论流派。

四、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

弗兰克(1929年—)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派依附论以及不发达的发展理论的创始人。他出生于柏林,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密歇

根大学、巴西巴西利亚大学、墨西哥国民自立大学、智利大学、柏林大学、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等。现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发展中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述有《不发达的发展》(1966年)、《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1967年)、《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1969年)、《买办资产阶级：买办的发展》(1972年)、《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1975年)、《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年)、《依附积累和不发达》(1978年)、《世界经济危机》(1980年)、《第三世界危机》(1981年)和《危机与反危机》(1984年)等。

“不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命题是弗兰克在60年代发表《不发达的发展》一文中率先提出的。他吸收巴兰、斯威齐的剩余论和停滞论的观点,并批判地吸收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中心)—卫星(外围)以及卫星国内的中心—农村双重结构格局下,由于宗主国从自身的卫星国榨取资本或经济剩余,第三世界不可能取得真正自主的发展。他断言:“这种发展是正处于目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之内,看来也注定是有限的或者不发达状况的发展”,亦即“不发达的发展和发展的不发达”。^①因此,今天最不发达和看来最封建的地区,是过去与宗主(中心)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反之,当卫星国同其宗主国的联系削弱时才能使其经济得到最大的发展。弗兰克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卫星国无历史进步性以及卫星国发展停滞的分析中,逻辑地引出激进的结论:“宗主(中心)的那些陈规老套是不符合卫星的经

^① 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转引自C.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的政治经济学》,第151、158—1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济现实的,也不会满足它们要求解放的政治需要”,“归根到底正是它们的人民将负责改变这种再也不能接受的过程,并消除这种悲惨的现实”,^①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弗兰克还着重批判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论。这种理论认为,组成外围社会和经济的两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历史、结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另一部分的动力。其中只有一个部分的经济和社会由于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而受到重大影响;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接触,那个部分才成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另一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则被人普遍视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孤立的、以维持生计为基础的、封建的或者前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比较不发达的经济和社会。这种理论无疑否认了外围(卫星)国家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并把这种二元社会或封建体制残余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障碍和落后的根源。弗兰克则强调指出,不发达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在他看来,当代发达国家曾经历了“未开发”(Undeveloped)阶段,但从未经历过“不发达”(Underdeveloped)阶段。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并非是由其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封建的古老体制和资本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造成的。而且这些关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个结构和发展的一个本质的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弗兰克在这里有力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他(以加斯林·贝夫为代表的新依附论派也加盟其间)与以埃尔内斯托·拉克拉伍为代表的“封建派”展开的关于“依附和封建的大论战”。后者认为,拉丁美

^①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158页。

洲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是雇佣劳动制而是以奴隶式劳动为基础的,殖民地的生产关系是庄园式的封建体制。弗兰克则认为其性质无疑是已把殖民地经济一元化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另一场论战是在弗兰克与依附论主流派之间展开的。后者则从重视国内的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立场出发,批评弗兰克把宗主—卫星关系过于简单化,并未弄清楚依附国内独特的依附性结构,并对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了温和的批评。弗兰克为此而撰写了兼具辩解性和论战性的著作《买办资产阶级:买办的发展》(1972年)和《依附已经死亡:依附和阶级斗争万岁;对批评的回答》(1972年),着重探讨了殖民地结构及其农业结构、政治结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及当代帝国主义和新依附等问题。弗兰克在该书中对其基本理论并未作太大改变,但加强了阶级分析,强调依附性结构(不发达)是根源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是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的或前近代的状况,因此,其性质不能归咎于不发达国家的“封建性”和“前近代性”,并承认“不发达”不等于完全不发展,它只是不发达的发展的结构,不可能只是停滞性的结构,并随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其具体形态。但是,他未能从理论上更为深入地分析造成依附或不平等的具体原因和运作机制或过程,这一点是由桑托斯、伊曼纽尔和阿明等人来完成的。总的来说,弗兰克是依附理论早期代表人物和理论奠基者。他矛头直指主流派现代化理论,促成不发达问题研究的根本性变革,在他的带动下,依附理论的涓涓溪流从60年代中期起,已汇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滔滔洪流。

五、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

巴西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依附论主流派的代表人物,曾任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新依附理论”是在《依附论的新特点》(1968年)中率先提出的,也是他潜心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他潜心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的产物并在《帝国主义与依附》(1978年)一书中得到较系统的阐述,内容涉及当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依附的新形式、依附的性质和结构、依附的生产、第三世界发展道路和方法论等问题。尽管该书某些论点已过时,但它体现了这一时期依附理论的研究水平和理论贡献,奠定了依附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桑托斯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性质作了界定。他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即拉美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在其“血统上”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进而指出,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附性资本主义”。

他还从历史的动态角度考察了三大依附形式。在他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依附应确立为一种历史状况,它造成了一种世界经济结构,即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这种历史状况不仅决定着拉美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决定着其内部结构,即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再生产及其他社会和政治结构,从而形成了它们的经济—社会现实。在他看来,依附的类型随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存在二种

依附形式。其一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殖民地型依附的本质是外贸出口,在这种形态内,与殖民主义国家机构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欧洲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殖民地国家,对贸易的垄断还伴随着对土地、矿藏和劳动力(农奴和奴隶)的殖民垄断。其二是金融—工业依附。这种依附形态在19世纪末得以巩固,其特点是垄断性大资本在各统治中心居领导地位并大肆对外扩张,向原料和农产品生产部门投资,以满足各统治中心的消费需求。这种依附在依附国造成了一种从事这类产品出口的生产结构即“出口经济”或“外向型发展”经济。第三种新依附形式,是桑托斯着重分析的对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技术—工业依附,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业统治,即垄断资本转而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他认为这三种依附形式反映了下述两种情况:一是世界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关系,即一部分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的。贸易关系的基础是对市场进行垄断性控制,把在依附国生产的盈余转移到统治国,从而把不平等变成世界经济中心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因素。另一情况是国际分工所产生的“限定性状况”即依附性。在前两种依附形式中,由于生产趋向出口商品(在殖民地时期为金、银与热带产品,在工业—金融依附时期为原料与农产品),生产由“中心”国家的需求所限定,因此“外围”国家国内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僵硬的专业化和单一生产。在第三种依附形式中,生产由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需求所限定,工业发展依赖出口部门的外汇收入来购买工业部门需要的投入,所以工业发展受国际收支波动的制约,也受“中心”国家技术垄断的制约。这种依附形式对生产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则表现在生产结构的不平衡,国内市场发展

备受限制,资本积累的特点则是扩大国内工资差别以及在国外购买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桑托斯认为,这种新依附形式的产生是与战后的历史状况的特点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形式发生重要变化,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并伴随技术进步成果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进入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新阶段。桑托斯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作了理论概括:“当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垄断性大资本的集中、联合、集权和国际化的广泛发展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而这一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在它的组织细胞——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垄断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增加和深化上。”^①并深刻地指出,依附性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并非来自由于未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造成的所谓落后,恰恰相反,限制这些国家充分发展的最大障碍正是来自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结合方式及其本身的发展规律。”^②

桑托斯还强调指出,只有既从依附性生产又从依附性再生产进程中的动态性总体框架中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理解依附问题的实质以及不发达、不平等和国际剥削形成的机制。他分析了生产领域对国际劳动力的直接剥夺的机制。指出:大量利润或剩余抽回,正是中心国家资本输出(这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结果,国际剥削(通过国际资产转移形式)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对

^① 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同上,第326页。

雇佣劳动力的剥削本质,以及帝国主义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垄断,从而把外围劳动者置于国际资本的剥削网络之中。而流通领域的两大吞占机制就是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价格和服务费用的支出(主要是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等),而这些运作机制在国际收支上的反映是巨额逆差和外汇亏欠,作为弥补这些逆差和亏欠而提供的外债和外援,又成为依附的积累机制。

桑托斯进而指出,这种依附性生产体系或结构(包括流通体制或结构)及其造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世界经济关系体制或结构的一部分,其基础是大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一些经济金融中心对另一些经济金融中心的统治、对高级复杂技术的垄断,这一切在国际和国内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联合发展。因此,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并被迫建立一种对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的生产关系,以便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分配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他进而强调指出,这种生产体系和结构的依附性,还在于再生产出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和结构,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再生产那些阻碍它在国内外取得有利地位的因素,给自己国内再生产落后、贫困和社会边际现象,其结果是所获得的发展,只给极少数阶层和很有限的部门得到好处,经济的继续增长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不间断的阻碍,并导致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增加,这又进一步产生更大程度的依附和剥削,并引发国内政治的社会危机。这一点已为70年代拉美国家政权频繁更迭、新权威主义现象,以及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现象所证实。

桑托斯还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批判了建立在比较成本学说基础上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化发展理论。他在《依附的

结构》(1968年)一文中指出:那种把落后看成是对先进生产方式吸收的失败或是现代化努力的失败的说法,无非是在科学的外衣掩盖下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一批评同样也适用于那些试图用自由竞争如比较成本理论来解释依附这个现象的努力,这种努力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辩护,并掩盖了基于这个体系的剥削关系。他还批评伊曼纽尔和普雷维什等人用交换机制来解释不发达和依附现象的理论错误。前者把不平等的根源归咎于低工资,但是产品的价值不是在市场上形成的,工资也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而工资差别与其说是不平等贸易的原因,不如说是不平等交换的产物;后者则归咎于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从而使不发达国家在交换过程中处于劣势。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依附论学者经久不衰的主题。桑托斯认为“发展主义主题”或现代化发展主题,应让位于“社会主义主题”,因为前者要么宣扬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要么鼓吹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们都不会导致改变或摧毁依附性发展所造成的贫困、不发达以及依附的再生产过程,并且使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唯一必然的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说:“拉美深刻的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找到出路。不是在革命中前进并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开辟一条发展和进步的道路,就是诉诸法西斯野蛮统治。”^①,但是,这种“激进的分析”并未具体展开因而失之单薄。

桑托斯为依附理论奠定了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基础。他力图

^① 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4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着重剖析当代帝国主义垄断的组织细胞即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新的依附形式和生产结构,并从当代帝国主义矛盾的总和中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他批评了弗兰克的非辩证的缺乏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论,指出:弗兰克的殖民地分析模式不能同他所期望的阶级分析“结合起来”,殖民地分析模式必须从属于一种阶级分析,而这种阶级分析应能解释阶级结构,解释由依附状况及其矛盾的发展所造成的内部结构。并批判普雷维什、伊曼纽尔热衷于从流通领域、交换机制而未能从生产领域、生产机制来阐释依附和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不可能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发展理论一定要表明发展过程的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某种内在的、能把整个社会引向更高组织形式的力量。发展模式不可能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单线过渡”的模式。发展的条件不是一般性的抽象条件,而是通过理论分析概括出来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他把上述这种方法论定为“辩证的抽象研究”方法,强调指出:“不能把社会科学的普遍观点‘应用’于不发达国家,因为社会科学的观点不涉及表面上的共性,而是涉及现实的。这些历史现实具有一种结构形态,因而可以对之进行抽象研究,但这是一种辩证的抽象研究,就是说,是在对某种具体历史现实的运动规律进行概括的基础上的研究。总而言之,支配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规律是特殊的规律,所以应该予以特殊的研究,就像研究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规律及其各种类型那样。故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把普遍性观点‘用于’特殊情况,而是根据某些特殊情况重新确立普遍性观点。”

结果就是一种新观点。”^①

六、阿明对依附理论的发展

依附学派在 70 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并呈现分化趋势。阿明、卡尔多索、沃勒斯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阿明(1931 年—)是出生于开罗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鼎盛时期的依附理论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1957 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埃及计划机构研究员、马里政府技术顾问,以及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法国的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1970 年起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主要著述有《世界范围的积累》(1974 年)、《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6 年),以及《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7 年)、《自力更生与新国际经济秩序》(1977 年)、《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 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 年)等。阿明的理论是对以前的依附理论的补充、综合和发展,并形成一定创见的有机整体,从而集中反映了鼎盛时期依附理论的研究成果。

阿明主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可归纳如下:

1. 关于新发展经济学的论述

在阿明看来,形成于 1945—1960 年期间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国际范围的自由竞争哲学即比较利益说和国际分工说。但是要抛弃西方学术界信奉的这一教条,就必须怀疑

^① 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 314 页。

和否定西方“新边际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否则,发展经济学仅仅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条件下的严格应用而已”^①,最终变成无用之物。他认为“新发展经济学”产生之日正是与这种教条决裂之时。这种分歧或决裂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的列宁、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而不发达和发达理论以及旨在改变发展结构的应用理论,正是这种新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内容。

2. 关于方法论

阿明方法论的突出特点就是把不发达问题置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考察不发达问题,因而有所创新。60 年代依附理论一般从单个国家角度考察不发达问题,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或者是某一不发达国家与另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或者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的并列。阿明则初步打破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的旧框架,强调资本主义“这个体系的世界性质”。例如,他提出下述命题:当一个制度发展过快和新陈代谢时,这个进程首先不是从它的中心,而是从它的外围开始发生的,因此从今以后,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在外围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区。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核心,这不是列宁主义的看法,因为它否认这个体系的世界性质;提出所谓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对立的论点,也是否认这个体系的世界性质。”^②

^① 阿明:《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第 14 页,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 年版。

^② 阿明:《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第 309 页,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 年版。

应该指出,《世界规模的积累》一书是他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初步尝试,该书提出了“不发达和发达理论仅仅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精辟见解,而《不平等的发展》一书则是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①从而构筑了一个建立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的综合性极强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论述。

阿明力图遵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阐述,并进而指出,“垄断资本把这个矛盾推到最高程度;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加以社会化的时机成熟了。这种成熟反映在垄断资本家日益求助于国家干预,需要协调垄断资本的活动并给以支持。”^②不过,国家仍然是垄断资本的国家,制度的理性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没有消失。他遵循马克思关于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基本原理,进而指出,“但是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但是这个世界资产阶级与这个世界无产阶级并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它们属于一个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形态的体系。”^③他遵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表述,认为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规律”,^④进而力图从“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探寻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运动

^① 同上,第20页,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

^{②③}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30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④ 同上,第320页。

规律”，并具体衍化为旨在扩充世界市场的“中心”资本积累的“扩张性”（中心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以及服从国外市场需求的“外围”的“外向性”或依附性（外围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并由此构成以不平衡、不发达、依附性为特征的外围与中心这一对特殊矛盾，从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它表现为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倾向，以及用以克服这一倾向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①最终酿成帝国主义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克服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因为外围是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产物，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标志，因此其前景只能是在世界范围出现的社会主义。上述分析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具有较强综合性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体系。

阿明批判了新古典主义者的均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否认矛盾、不平衡，强调发展过程的和谐性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排除了以和谐的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并使我们认识到：要求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以补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使得和谐的发展不可能。……因此，在中心地区所取得的‘和谐’（在那里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必须由外围地区日益增加的‘不和谐’（在那里，要为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付出代价）所抗衡。这种不和谐是在许多‘贫穷化’的现象中表露出来的，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表现。”^②

①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157页。

② 同上，第312页。

3. 关于中心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

阿明继承普雷维什和弗兰克的中心(宗主)-外围(卫星)体系论,指出,与这种两极格局相适应,资本积累也分为中心积累型和外围积累型,其对立性表现在外围剩余不断流向中心,从而造成中心发达的资本积累以及外围不发达的积累或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进而分析了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特点、机制和运动规律。首先,“自主中心式积累”是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特征。详而言之,①积累的排它性,即摧毁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往往同它的主导生产方式相一致,而一切以前的社会形态则是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稳定结合体。②这种积累的客观要求是劳动力报酬(工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平行增长。这种要求在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更为强烈。③积累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积累是在内部力量(资本本性)的基础上自我发展的,但是,它基于工资的增加,而要求市场对外扩张作为补偿。这种扩张主义在19世纪末采取新的形式(帝国主义和输出资本),并使外围地区发挥新的职能,即这种扩展对中心国家的增长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从而使扩张性上升为把握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关键点。④扩张性或扩张主义(扩大市场的倾向乃至形成国际市场)的原动力或基础是对利润的追逐,但也是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根本的、永久和不断加深的矛盾的结果。这一矛盾采取利润率下降的表现形式。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办法,第一,提高剩余价值率即增加对本国工人的剥削,从而意味着相对贫困化;第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剩余价值率较高因而通过不等价交换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外围地区;第三,制造各种形式的消费。他认为

这三种途径中每一种手段都会构成积累的动力,从而再度促使帝国主义向外扩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勾勒了中心资本主义积累运动从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阶级,并试图从中找出各个时期所呈现的规律性现象和特征。

第一阶段是商业扩张主义(1880年以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尤其是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矛盾以及遏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办法,一是提高国内剩余价值率从而使工资保持在相对低下和停滞的水平上,二是依靠商品输出形态的对外贸易和市场扩张,用以吸收剩余和实现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阶段或旧帝国主义阶段(1880—1945年)。垄断、资本输出以及中心国家工人的工资随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成了这一阶段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工资提高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输出从而使大量利润从外围回流而得到解决。资本输出导致中心与外围在生产率相等情况下的工资差异(外围廉价的劳动力形成低工资成本),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由此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基础。这就形成新的结论:中心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

第三阶段即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年—)亦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帝国主义的第二次膨胀时期(1945—1968年)和接踵而来的结构性危机时期(1968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在世界范围活动的巨型跨国公司;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使工业重心转向新的部门,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特点

的古典积累方式被“高技术劳动力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取代,从而使资本积累的基础和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一种新型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从而掀起向外围扩展的新高潮,亦即中心国家将专门从事最现代化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而至今尚为它们所保留的传统工业则转移到外围国家去。外围国家使自己适应于中心国家的要求,将再次在世界范围的积累机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利润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的回流将大幅度增加,外围将成为中心的利润和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基于不平等国际专业化的积累机制,一方面,这对中心国家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因为总的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克服。另一方面,这种机制(表现为劳动力报酬日益增大的差距)使外围地区的不发达永久化并且加剧。与此同时,这种“不发达的发展”表现为外围形态所特有的国内矛盾的加剧:外围国家各经济部门生产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即出口部门凌驾于整个经济结构之上。这表明中心—外围的对立和矛盾已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

4.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

阿明认为,与自主式中心积累型相对立的依附性或外向性外围积累型的特征就是贫困和不发达的积累,亦即外向性积累并表现为外向性外围经济,并且在运行中能再生产它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其根源在于中心和外围的“不对称”或“不平衡”,主动权操纵在中心资本主义手里,外围处于被统治的依附地位。外围是按照中心的需求而被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口部门和奢侈品供应部门凌驾于经济结构之上,这种为中心服务的外向

性是由中心的需要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所决定的。其结果是贫困化,高级的依附,畸形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在外围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阿明总结了外向性或依附性外围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特征,并从经济结构角度概括了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畸形:趋向出口活动的一种严重畸形,它吸收了来自中心的大部分资金;趋向第三产业活动的畸形,它来自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和外围形态原来的结构;选择工业部门方面的畸形,即趋向轻工业部门,并在这些部门中使用现代化技术。这三重畸形反映外围结合进世界市场的不对称方式。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乘数机制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因而使中心的积累能不断积聚地进行。由于这种转移,导致了不发达经济的脱节即比例失调、二元结构、经济增长受阻,从而导致贫困化、外向性积累或不发达的增长。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阿明描述了外向性或依附性的外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运动的三大阶段及其发展规律。

阿明提出了一份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清单,其中包括美洲外围形态、非洲外围形态以及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它们共同的特征是:①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②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③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④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亦即劳动生产率在各个部门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价格结构从中心传到外围(表现为不平等的利润率和较大差距的工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的不合理和“脱节”)以及中心的经济统治(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亦即中心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外围的世界贸易结构)。阿明由此规定了外围的性

质,即外向性或依附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它按照中心资本主义的需求而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是一种不充分发展并且永远不能充分发展的包含前资本主义残余在内的综合体。

阿明还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其早期阶段即殖民主义阶段,后期阶段即新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亦即更高形式的依附性发展阶段乃至非常高级的依附性发展阶段。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早期阶段,中心与外围的技术差距不大,因此占统治地位的中心资本必须直接控制它所推动的现代化部门,并辅之以政治控制手段,扶植一批“大庄园买办资产阶级”。在后期阶段,技术差距扩大,可以在不控制投资和不进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把外围纳入其世界体系,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取代买办资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独立的统治阶级。这种所谓的外围型“国家资本主义”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并未取得真正的独立,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形式的依附或高级不发达的主要形式,并未改变中心(霸权)—外围(依附)的两极对立格局,仍然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传送带”。^① 他的结论是:外围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创造超越自身的条件,不可能向发达的自主的中心资本主义模式转化,最终“依附性外围发展的深化所走的道路在将来会构成高级不发达的主要形式”。^② 阿明进而阐述了外围发展的第三阶段。认为外围不会出现一种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它在客观上必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同资本主义体系决裂,真正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

^①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326,297页。

^② 同上,第326页。

序。这种新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1. 在依靠自己资源的原则基础上选择“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2. 优先考虑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集体的自力更生”）；3. 要求提高原料价格，控制自然资源，第三世界的制成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以及加速技术转让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国际经济秩序。

5.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的出路和抉择问题

阿明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出发，分析了中心资本主义（扩张机制）和外围资本主义（外向或依附机制）的运动规律，把中心—外围的矛盾，亦即资本主义体系为解决阻碍其资本积累进程而造成的一系列矛盾，推到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的位置，并把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身上。他认为外围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后者是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的，而摆脱对中心的依附从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唯一方式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预言：“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出现”，而“在经济增长和建设世界性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是不会存在矛盾的”。^①

此外，阿明还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

^①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329、331页。

七、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

70年代的依附理论已出现分化或自我扬弃的趋势,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巴西社会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索。他曾任巴西研究和计划中心主任。其主要著述有《依附论还是对具体依附形势的分析》(1971年)、《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1972年)、《联系性依附理论:理论与实践的意义》(1973年)、《美国依附理论的毁灭》(1972年)以及与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1979年)。卡尔多索理论是对依附理论的补充和扬弃,从而成为依附论走向世界体系论的一个过渡环节。卡尔多索不同意当时流行的不发达的发展论亦即停滞论和脱钩论,这与后者不能很好地阐释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以及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关。这一段时间,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在依附环境条件下取得的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外围石油输出国运用石油武器反抗中心石油垄断资本的斗争取得很大进展,并且积聚了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资金,中心与外围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显示出以“对话”取代“对抗”的重大迹象。它集中表现为中心工业化向外围传播的结构性变动趋势,以及取得政治独立的外围,由自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卡尔多索因此提出与以前的依附论有所区别的“联系性依附发展”论,并且极力将辩证方法、社会学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来丰富经济分析方法,着重从历史阶级关系和国内现实状况入手,来剖析依附性资本主义,强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狭义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之间的联系和综合,以

及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依附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联系性依附发展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方法论基础,是把以往视为根本对立的彼此矛盾的两个概念“发展”和“依附”加以联系和综合。卡尔多索之前的激进的依附理论,强调中心与外围的基本关系是国际剥削关系并使后期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而依附是导致外围不发达的主要根源,唯一的选择就是摆脱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联系性依附发展论则是对这种停滞论、脱钩论或不发达的发展论的扬弃和脱离。在卡尔多索看来,发展和依附是并存的同时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第三世界在依附条件下还是能够使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特点是:①这种依附中的发展是在依附中求得发展,并不改变依附的经济结构,因而它是依附的一个“特例”;②这种依附中的发展道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是它造成一种跛足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如缺乏“自主性技术”而不得不利用进口技术,缺少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品部门,其自身无法完成其资本积累的循环周期,而必须求助于外部动力;二是不能避免阶级摩擦,收入分配集中化和相对贫困化,并导致重视耐用消费品而忽视基本必需品的倾向,以及外债丛生、人力资源使用不当和备受剥削等;③这种依附中的发展,是中心资本主义垄断扩张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并表现为经济体系的三个部门即国内私有资本、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并存和扩张。卡尔多索认为,这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其原因在于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造就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国内资本有赖于跨国公司提供资金、技术、组织和市场联系,中心国家一部分工业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转移到工业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外围国家”,从而出现“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现象。外国资本也

有赖于依附国某些关键部门相当迅速的经济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大部门资本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④这种联系性依附发展道路,强调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关系来发展经济,并应该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提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脱钩”来求得自身的发展。

与此相适应,卡尔多索方法论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卡尔多索力图用马克思、列宁的基本观点和辩证方法来分析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指出:积累和贫困化的一般规律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倾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反对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外围地区和任何时间的可供选择的机械的、形式的发展理论,而是集中研究“依附的具体状况”即对发展具体分析,亦即以依附论阐述和补充帝国主义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语)。其二,强调事物发展过程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卡尔多索实际上批判了现代化理论的内部因素决定论。后者把第三世界国家未能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即所谓“传统性”,忽略外部因素的作用,并极力主张照搬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同时,他又批判了依附学派的外部因素决定论,后者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归咎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即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控制这一外部关系,忽略内部因素的作用,极力主张脱离中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其三,力图把“激进的”狭义依附论和“温和的”结构主义依附论各自的优点加以综合和完善,并纠正其缺陷,并程度不同地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不发达问题。

卡尔多索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扬弃了依附论的片面性和某些不足之处,并成为向世界体系理论过渡的直接中介。

八、现代化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

旨在研究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的经济发展理论,经历过三大演进阶段。现代化论是它的最初形式,流行于50—60年代,它的对立面即依附论崛起于60年代中期,作为依附理论的扬弃、补充和发展的世界体系论则兴起于70年代中期,这时的现代化理论虽已丧失其正统和主导地位,但却以新现代化论的面貌与世界体系论并存。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在于其理论基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信奉机械的社会发展单线论,把社会发展过程简化为“传统”(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发展阶段,要求不发达国家走全盘西方化的发展道路;而30多年来第三世界经济实践的实践,却使它们以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外围”或“卫星”国角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依附状况已成为自身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依附理论的衰微和分化在于它陷入外部因素决定论,单纯地从外部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寻找不发达的根源,其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一国经济发展问题,或者中心国与外围国之间经济关系问题,其考虑范围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或部分非洲国家,其发展模式或政策主张或者陷入不发达的发展的停滞论或宿命论,或者走向忽视具体可行性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完全脱离联系的脱钩论或自主发展论、自力更生论。因而不能解释70年代以来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依附中发展或低度增长的现实。可是,尽管依附论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却打破了对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和西方现代

化理论的迷信,突破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并对第三世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以及摆脱依附的途径和方法,提出许多有意义的见解,它自身也成为世界体系论的前奏曲(世界体系论吸收了依附论的若干概念、范畴和“世界体系观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出版第1卷,1982年出版第2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年)、《历史上的资本主义》(1983年)、《世界的政治学》(1984年)等。沃勒斯坦受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国年鉴学派影响颇深,因而把社会看成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自我调节的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并善于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的角度,重视综合性的动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同时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以至于其代表作被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外,与依附论的方法论相比较而言,依附论虽然有“世界体系的观点”,即把外围—中心二元结构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其分析单位是国家,因而其世界体系结构实际上是中心—外围二元结构的体系。沃勒斯坦则把世界作为分析单位,这种总体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突破了一国或国与国之间的依附关系的狭窄视野,把世界体系视为一种纵横交错的有内在联系的自我调节的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从而把依附理论的“世界体系观点”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从动态的整体的角度剖析了世界体系的三种历史

形态：“互惠的小体系”，即自给自足的不存在剩余和剥削的氏族社会；“再分配的世界帝国”，即国家诉诸政治权力并以纳贡形式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掠夺剩余的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利用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机制把剩余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体系。并且进而详细剖析了自15世纪以来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

世界体系论是在依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借用和发展了依附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沃勒斯坦发展了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的观点，亦即中心的发展能促成外围的低度发展的论点，提出了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半外围”概念。在他看来，半外围兼有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特征，并且在中心和外围的矛盾冲突中起缓冲作用；各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半外围国家可能升格为中心国家，而中心国家也可能沦为半外围国家，从而以一种以半外围为过渡的动态分析来否定和取代了依附论中具有静态和宿命论色彩的停滞论。他还指出，各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决定其发展因素已无内因（国家内部关系）和外因（国家外部关系）之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世界体系中诸国共同受世界体系的整体规律即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世界体系并非是二元结构，而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自我调节的系统，依附和不发达是这一系统在资本积累规律支配下运行的产物。

沃勒斯坦在发展道路和政策主张方面，主张激进的革命战略。世界体系论的最终目标不是加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是主张旨在由外围上升为中心的追赶型路线（Catching-up Line）或“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ist）亦即现代化理论和政

策,而是建立作为“反体系运动”的产物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 World Government)。他认为这种革命战略是建立在关于当代世界体系危机论的牢靠基石之上的。这种危机形成的原因在于使当代世界体系恢复常态的机制(即克服世界经济周期性停滞的机制)运转已经失灵,亦即除技术革命机制外,无产阶级化(工资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机制和地区扩大化(向外围转嫁危机)机制均已失灵。在他看来,随着外围地区的低度开发以及外围向半外围的转化从而低工资结构的消失,资产阶级的总剩余随之减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将面临全面危机。一旦发展到顶点,经济危机将以世界规模总爆发,其结局不只是脱离世界体系这种形态,而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并且是通过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而崩溃的形式来实现。沃勒斯坦因此在西方遭到近似围攻式的批判和指责,被称之为激进的现代帝国主义论或新马克思主义者。

显而易见,与依附论有渊源关系的世界体系论是一种激进的经济发展理论,并由于自身的缺陷(如缺乏政策的可操作性,把世界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和现代化理论一样,未能成为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主导性发展理论。在发展经济学或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领域,它与现代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等共同形成一种并存共存(即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的)的理论多元化格局。

与此同时,某些依附论学者深受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而在某些理论观点上有所改变。普雷维什在80年代继续探讨外围发展的新途径,提出关于外围资本主义的改造理论。他反对新古典学派和正统社会主义,但是,他主张可将其长处——重视市场和经济效益以及重视计划和社会效益——加以综合。他说“寻求社会

主义和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综合、从而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哲学本质的统一性”。^① 被普雷维什重新加以定位和抉择的这种模式,被西方学者称为市场社会主义。弗兰克在80年代对原先的主张——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彻底决裂——作了反省。他认为,目前尚无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割断联系的先例,因为尚急需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阿明则在《论脱钩》(1987年)一文中,对争议颇多的“脱钩论”作了新的阐释。他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脱钩”),即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但是,“脱钩”完全不是“闭关自守”的同义语,也根本不是拒绝参与世界科学与思想潮流的同义语,其含义是根据价值规律组织一个经济选择合理性标准的体系,它具有民族的基础和民众的内容,不受世界范围活动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统治所产生的经济合理性标准的影响。综上所述,依附论已基本纳入相对较为成熟和系统化的世界体系论的框架。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交换规律的论战发生过多。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掀起的国际价值大论战,1960年前后在东欧

^① 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转引自迈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第19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贸等价交换问题的辩论。而 60、70 年代关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关系问题的大论战,主要是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被称为法国学派的阿吉里·伊曼纽尔、阿明、查理·贝特尔海姆等人,以及被称为德国学派的诺埃舒斯、布什、施莫勒、曼德尔等人。英国学派的杰沃费里·凯、巴巴拉·布雷德比等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们力图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学说入手,探讨不发达和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和国际剥削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分化、深化和发展。这场论战有力地推动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一、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阿吉里·伊曼纽尔(1911 年—)是不平等交换大论战中的风云人物,激进派发展经济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希腊的帕特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参加中东希腊解放阵线而被捕入狱,曾获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巴黎第七大学研究院院长。其主要著作有《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1969 年)。他在这本书中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并以论战的形式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学说和比较成本理论,详细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以及价值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过程,强调工资差异和剩余价值率的不均衡是形成国际剥削的主要原因,解决了以往激进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未能解决的贸易条件恶化和劳动价值规律的矛盾,从而在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激

进主义发展经济学领域建立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国际价值和不等交换理论。

伊曼纽尔认为,西方自由贸易学说的理论支柱即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基本假设,是与国际贸易的现实不相符合的。这一基本假设是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不如在国内市场上那样具有流动性和竞争性,其他的假设则包括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相同的技术水平),劳动有机构成相等(各地工资都等于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均衡的不变成本,不存在失业和社会因素,相同的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等。他认为,这些假设引出的逻辑结论,就是国际(市场)价值决定不同于国内(市场)价值决定,因此国际价值和价格决定于交换双方的相互需求即国际需求,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他不仅批判了李嘉图关于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完全不流动的基本假设,而且批判了和扬弃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资本的国际非竞争性假说”,提出了独特的具有一定现实性的假设:“劳动要素的非竞争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剩余价值,它与资本的竞争性一起导致利润率的平衡。”^①

《不平等交换》[有些译本把“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误译为“不等价交换”(exchange of non-equivalents)]一书的基本观点就是: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是两个基本前提或假设;前者即“资本的竞争性”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后者即“劳动要素的非竞争性”则形成不均等的工资水平,和剩余价值率;发达国家与

^① 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第33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版。

不发达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超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不发达国家由于低下的工资水平,因而其剩余价值率高于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商品价格(作为独立自变量的工资水平在国际贸易中决定作为因变量的价格),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换言之,工资差异是不平等交换、富国剥削穷国(即价值无偿转移)以及依附产生的主要原因。

伊曼纽尔进而根据马克思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思路,设计了8个国际生产价格或“均衡价格”图表,区分了平等的或等价的交换形式、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形式和狭义的不平等交换形式。

在他看来,在其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下,平等的或等价交换形式,意味着交换双方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率都相等;而广义的或初级形态的不平等交换形式的特点,则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工资率相等(详见表一);狭义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形式的特征,则是交换双方国家的有机构成和工资率均不相同(详见表二)。后两种形式的国际贸易交换都会导致价值从不发达国家(B国)向发达国家(A国)的转移。

表一表明,两国投入国内劳动总值均为170个单位,而在广义不平等交换中,A国以170单位的国内劳动换取190单位的国际劳动,而B国却以同样单位的国内劳动换取了150单位的国际劳动,因此,B国的剩余价值有20个单位转移到A国。

表二表明,B国的剩余价值有60个单位转移到A国。但是,他认为表二体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而广义不平等交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因为这种交换的前提条件即有机构成的差异(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所造成的,因而是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都会产生的

情况,而不是国际贸易所独有的。因此不能由此来说明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现象。而把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相等作为前提条件的狭义不平等交换,是国际间劳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产生的特有现象。交换双方国家所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都相等,但由于国际范围内劳动力不能自由转移从而工资不能平均化,所以工资和剩余价值率不相同,发达国家工资水平高于不发达国家,亦即其剩余价值率低于不发达国家。这时的交换是按国际生产价格而不是按价值进行的,A、B两国价值相等的产品交换不是平等地进行,因而出现价值或剩余价值从B国向A国的转移。“这样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条件”,并进而指出,“不平等的精确意义”就是“剩余价值率的不平等”或“各地区剩余价值率的‘制度性的’差异”^①。可见,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以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偿转移形式表现出来的不等价交换和国际剥削的涵义。

表一

国别	K 投入 资本 总额	C 不变 资本 消耗	v 可变 资本	m 剩余 价值	V 价 值 c+v+m	R 生产 费用 C+v	T 利润率 $\frac{\sum m}{\sum K}$	P 利润 TK	L 生产价格 R+P
A	240	50	60	60	170	110	33 $\frac{1}{3}$ %	80	190
B	120	50	60	60	170	110		40	150
	360	100	120	120	340			120	340

^① 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第89、91页。

表二

国 别	K 投入 资本 总额	C 不变 资本 消耗	v 可变 资本	m 剩余 价值	V 价 值 c+v+m	R 生 产 费 用 C+v	T 利 润 率 $\frac{\sum m}{\sum K}$	P 利 润 TK	L 生 产 价 格 R+P
A	240	50	100	20	170	150	33 $\frac{1}{3}$ %	80	230
B	120	50	20	100	170	70		40	110
	360	100	120	120	340			120	340

伊曼纽尔强调指出,狭义不平等交换理论是对马克思价值、生产价格、有机构成理论及国际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他看来,马克思所阐述的生产价格形成理论,是以一国内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而在国际生产价格中,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却不能自由移动,因此有必要根据这个新的变化加以修正,即把作为独立变量的工资差异而不是以有机构成形式反映出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或者说工资水平的差异超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作为产生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应该指出,马克思虽然对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应用,未作明确而系统的阐述,但他提出了下述有重大意义的见解:价值规律在国际上应用时应予“修正”,并提出“国际价值”的术语;世界市场的价值尺度或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价值规律的重大变化在于: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

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或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等等。尽管伊曼纽尔在价值规律的修正问题上有许多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力图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论基础上,探讨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关系的新的思路。因此,他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一场国际学术大论战。

二、关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大论战

60、70年代关于国际贸易领域不平等交换问题的大论战是以往国际价值问题大论战的继续。这场大论战的导火线是伊曼纽尔和贝特尔海姆在1962年发表的题为《不平等交换与开发政策》的一篇论文。伊曼纽尔反对布哈林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性的观点,因袭了格罗斯曼和鲍尔关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而劳动要素则无竞争性的论点。这场论战最初是在法国学派内部展开的。直至1977年奥拉尔出版《不平等交换论》止,前后持续近15年。1969年伊曼纽尔发表《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一书后,德国学派和其他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参与其间,酿成一场国际学术大论战。

论战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涉及:

(1)形成国际生产价格的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即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世界市场。伊曼纽尔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存在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导致国际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使生产价格的形成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对马克思关于一国资本和劳动自由转移的两个前提条件作了修正,提出关于价值在国际间的转移和不平等交换的新见解,即国际贸易中的超额利润不是发达国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而是不发达国家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转移形式。他的反对者抓住了伊曼纽尔国际生产价格理论的基本前提即国际平均利润率问题,认为伊曼纽尔没有看到平均利润率被垄断利润所取代的现实情况。

(2)关于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法国学派共同的理论观点就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为依据,来论证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但是在不平等交换形成原因的问题上,这一学派成员各持己见。贝特尔海姆反对伊曼纽尔关于工资是单独变量从而是引起不平等交换唯一原因的论点,强调不容忽视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平衡和国际生产关系的复杂结合等重要因素。阿明同意贝特尔海姆的观点,但又认为贝特尔海姆的方法有局限性;他还把“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交换过程,完全等同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曼德尔也认为工资不是自变量而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工资差异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强调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不应抛弃生产过程而跑到流通过程中去寻找,而应从不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探寻。

(3)国际价值问题。德国学派大多把国际价值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他们认为,以伊曼纽尔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忽视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修正问题的论述。但是,德国学派内部,在关于国际价值这一范畴是否成立以及如何理解不平等交换等问题,也是各持己见的。如布什认为,参加世界市场贸易的

某种商品是与国际需求相联系的,所以为满足国际需求生产的商品所花费的国民劳动时间(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规定的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规定性)才形成了国际价值。施莫勒认为这并不能足以形成国际价值,因此,他只承认国民价值,并用“世界市场价格”来取代“国际价值”。参与这场论战的阿明承认国际价值范畴的存在,他指出,尽管劳动力不可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世界价值或国际价值确实存在,亦即在全球各地投入并凝结在这些产品中的等量劳动,仍会生产出单一的世界价值。此种观点被称之为“世界价值优于国民价值”论。贝特尔海姆对此提出质疑,如果世界各国所提供的产品是按世界价值交换的,就应废弃“不平等交换”这一术语。因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交换,其根源在于各国为获得等量产品必须投入的劳动是不等量的。最早批评法国学派的不平等交换提法的是曼德尔。他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归根到底是不等量劳动交换,这种交换不仅没有违背价值规律而且恰恰符合价值规律。德国学派大多承袭了曼德尔的观点。曼德尔与其他德国学派成员的分歧仅仅在于:后者把这种不等量劳动交换视为等价的交换(exchange of equivalents),因为随着价值规律应用于国际市场,它自身不仅要修正,等价交换的某些规定性也要加以纠正。而曼德尔则把这种不等量劳动交换视为不等价交换(exchange of non-equivalents)。他认为,发达国家只有以相同的劳动时间与不发达国家相交换,才能中止价值的转移,等价交换才能得以实现。英国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凯,则把这种不平等交换解释为不等价交换。在他看来,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靠不等价交换获得利润,后者靠等价交换获得利润;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

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不等价交换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利润,即以高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工业品,而以低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买进廉价工业原料和粮食,这就是不平等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中川信义提出了“国际等价交换”和“国际不等价交换”这两大概念,并阐述了它们与不平等交换、国际剥削的关系。在他看来,法国学派的不平等交换概念混淆了这两大概念,因而未能很好把握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和修正问题,对国际剥削的含义也未能加以明确阐述。他指出,“国际等价交换”即“等价物的国际交换”或“国际等价物的交换”,它意味着具有等量国际价值的各种商品互相交换,亦即各种商品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国际价值是由世界或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要进行这种“国际等价交换”,就会产生先进民族对后进民族的剥削,因为这种交换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就是国际剥削。而“国际不等价交换”即“不等价的国际交换”或“国际不等价物的交换”,则意味着不是按照国际价值,而是按照某种国际价格进行的国际不等价物的交换。如按照跨国公司和大企业所规定的垄断价格,强制地进行国际不等价的交换,强制地压低某种资源的价格或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价格进行交换。国际剥削就是在国际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即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不等量劳动交换,这种剥削的基础就是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这场由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唱主角的大论战,已超出国际贸易的范围而涉及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问题,诸如价值、生产价格、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工资等基本范畴和理论。其理论深度已远远超出关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争论。伊曼纽尔别树一帜地把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

格理论应用于国际市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论战双方提出的某些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是无疑有益于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学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议

西方文献中所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并无严格的界定和统一的规定性,迄今还未形成一个严谨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未对该派成员作严格的筛选。他们有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同于激进政治经济学,有时又加以区别;有时把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圈进激进政治经济学圈子内,有时又撵出这个圈子。这表明这一学派还未趋于成熟,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对其性质、地位、意义或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第一节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贡献

一、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

激进政治经济学从其本来意义上讲,实质上是一种左翼小资产阶级思潮。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另一方面宣扬重新研究、重新改造、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方案、措施、政策主张和社会主义模式,又

具有改良的或空想的性质。但这并不排除从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中,可能分化出一部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它与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并不真正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鼓吹旨在模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二者区别的“沟通论”,以及旨在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者区别的“趋同论”。但是,它们在反对正统派经济学、揭露资本主义弊端和改造资本主义(激进派的左翼和右翼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方面却是同盟者。正是基于这种联系,一部分西方经济学文献把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斯拉法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或左派凯恩斯等统称为激进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这些学派列入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范畴。

激进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再度崛起,并已形成一股国际性思潮。这无疑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第三世界或“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中心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同时也是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该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顽症和社会不良现象找不出治理的药方——失去信心的反映。同时,这也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对正统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发起挑战,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具备问鼎的实力,但是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出“睡犬觉醒”的警告。

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贡献

(1)他们基本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原著以及介绍性、解释性和辅助性著述,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抨击现实问题,跟踪报道全世界社会主

义的发展,召开各种研讨会和纪念性学术活动,在各高等院校开设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因而在客观上起到宣扬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1985年)一书中指出,斯威齐等人的著作成了年轻一代美国人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入门书。黛安娜·弗蒂厄蒂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中强调: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正是从弗兰克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7年)、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年)、巴兰及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以及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9年)等著述中吸取养料,从而转向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斯威齐创办的《每月评论》出版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仅在1991年春夏二季出版的新书和重版书就不下81种。其中包括:

①《共产党宣言》;②德雷帕:《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三卷本);③奥尔瑟姆:《列宁和哲学》;④塞塞利:《论马克思主义》;⑤*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⑥哈蒙德:《建立人民政权》;⑦艾森斯坦主编:《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状况》;⑧津巴利斯特主编:《劳动过程研究状况》;⑨弗洛拉、托里斯·里瓦斯主编:《中美洲》;⑩泰伯主编:《争斗不已的教派》;⑪*马格多夫、斯威齐:《日益加深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⑫*托马斯:《依附和转化》;⑬索尔主编:《困难的道路》;⑭特克:《剥夺继承权》;⑮查夫金主编:《两次曝光》;⑯阿明、阿里吉、弗兰克、沃勒斯坦:《地球危机动力学》;⑰杜波依斯:《黑人教育》;⑱艾森斯坦:《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⑲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年》;⑳拉勒:《资本主义

是如何运转的》；②①卡梅伦：《人性和社会》；②②*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经济学危机》（二卷本）；②③阿拉维、沙尼姆主编：《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导论》；②④马格多夫、斯威齐：《不可逆转的危机》；②⑤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崛起》；②⑥休伯曼：《人类财产》；②⑦阿萨德、欧文主编：《中东》；②⑧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②⑨马姆丹尼：《人口控制的神话》；③⑩利科克：《男性王国的神话》；③⑪贝西、普拉哥主编：《我们的争辩》；③⑫梅茨依：《人民的补救方法》；③⑬*巴兰：《增长政治经济学》；③⑭米尔顿：《美国劳动力政治学》；③⑮托马斯：《贫穷和失势》；③⑯斯威齐：《后革命社会》；③⑰比奇洛、戴蒙德：《手中的权力》（学生手册）；③⑱森达拉姆：《阶级问题》；③⑲亨特、亚伯拉罕：《种族、阶级和世界体系》；④⑩多布可斯基、沃林曼：《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激进观点》；④⑪柯林斯：《形形色色的挑战》；④⑫托马斯：《外围社会独裁主义国家的兴起》；④⑬塔克斯：《妇女的崛起》；④⑭哈利戴·阿拉维主编：《中东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和思想体系》；④⑮*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④⑯*福斯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④⑰拉勒：《世界经济中的第三世界》；④⑱法根、迪尔、科拉基欧主编：《过渡和发展》；④⑲*阿明：《不平等的发展》；⑤⑩卡布拉尔：《团结和斗争》；⑤⑪休伯曼：《我们，人民》；⑤⑫奥本海默：《白领政治学》。①

(2)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的批判,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特点。其一,力图站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高度,揭露源于私有制的以异化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不平等的关系,倡导阶级“冲突动力学”;其二,

① 笔者注:打*号者系斯威齐圈定的重点书籍,这是笔者在美国当高访学者期间,斯威齐1991年5月致笔者函中,重点介绍的具有代表性的激进派著作。

批判面较广泛,涉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城市贫困化和滞胀等等;其三,他们从这种批判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最终消除资本主义运行不稳定及各种弊端的出路,就是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倡导“历史动态学”。这对于启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思想觉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他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也具有可供借鉴的因素。例如关于群众参与管理、经济民主、非集中化的计划制度与市场相结合(宏观决策和少量重要的微观决策应实行中央计划或控制)、环境保护、真正均等地再分配收入和财富、重视利他主义的道德力量(不能过多依赖经济刺激和行政命令)等等。

应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一模式反对把“计划社会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凝固化,指出,计划或者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形式、手段或工具,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反对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平起平坐的二元机制论,倡导市场取向的(Market-Oriented)“主导机制”(计划机制为辅)理论。剔除其折衷主义的趋同论等错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提供了许多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有助于对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4)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批判正统或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值得肯定的理论观点。

如前所述,谢尔曼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派经济学的对立以及前者的新颖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我们在这里仅就几个主要理论作简要的概括和说明。

方法论。 激进政治经济学一般推崇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强

调历史的动态分析、辩证分析、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强调过程、矛盾和质变,强调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他们近几年有一种抛弃简化主义(reductionist)、经济主义的倾向,在内部还展开了“一元决定论”和“二元决定论”、“决定论”和“超决定论”之争。正统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则是强调均衡、平衡和量变,强调人与物的技术关系,否认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

价值论。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一部分人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并且对挑战者提出的难题(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转化问题,以及多种技术选用、联合生产或固定资本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问题等),作了探索性的解答。

分配论。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强调分配不均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掩饰剥削和不平等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剥削理论、贫困理论和分配理论,其中包括著名的双元劳动市场学说和产业分割学说。

帝国主义论。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颇多建树。他们对置身其中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十分敏感,他们的一些新结论、新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诸如垄断资本学派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其中包括“长波理论”),阿特韦尔危机理论史以及对五大危机理论类型的概括,等等。

激进主义的发展理论。 这一理论实际是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欧美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外围资本主义”(普雷维什语)特有的依附现象,放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中心—外围框架的总背景中加以考察,批判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推出了激进主义的发

展理论即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中心—外围说、新依附论、不平等交换论、世界体系论,从而对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缺陷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具有二重性,既有科学因素、理论贡献或合理性,也有庸俗因素、理论缺陷或局限性。

这一学派鱼龙混杂,思想渊源繁杂,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他们批判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又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他们大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但又大多强调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大多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有空想成份,并有一部分人主张改造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想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具有明显的错误。例如,相当一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尽管信奉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但是背离、修正或抛弃劳动价值论,因而在激进派内部多次引起激烈的争论。其中,商品价值理论是80年代流行的反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论。其代表作是斯拉法马克思主义者斯潘塞·配克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85年)。商品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大区别,在于创造价值的因素是多个还是一个。前者认为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配克看来,商品并非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商品有价值并非在生产中使用了人类劳动,而是它们使用

了别的商品；商品价值量决定于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出各种商品时所需的全部商品投入量；鼓吹不能离开使用价值，也不能离开生产过程、生产条件尤其是投入产出技术系数，抽象地谈论商品价值量。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的一个通病：见物不见人，用人和物的关系取代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价值源泉多因素论的始作俑者，正是马克思批判过的 19 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翻版。

“经济剩余”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中占有很大的市场。其倡导者巴兰、斯威齐，实际上用超历史的“剩余”概念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并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解为经济剩余“吸纳”或“处理”的“自由”程度与“困难”程度的矛盾，从而抹煞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陷入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一点连美国激进派中的明智人士也有所觉察：“经济剩余概念的使用向我们提出剩余增长趋势这一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却缺乏解决的推动力，从而在真空中运动。”^①

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理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危机理论中很有影响。这种理论观点是把危机的根源，从而把资本主义矛盾仅仅归结为停滞的消费需求与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冲突。其理论渊源可上溯到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无独有偶，殊途同归，与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相对立的凯恩

^① 小威廉·吉·巴尔克莱、米切尔·斯坦益尔：《剩余与剩余价值》，第 58 页，《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5 年冬季号。

斯主义者,则把“消费不足萧条论”上溯到 19 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派创始人马尔萨斯的危机理论。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近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论坛上很活跃。这一理论善于把资源配置形式从社会制度中剥离或抽象出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排除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规定性之外。但往往又因此模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犯折衷主义的趋同论的错误。因为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的一级本质(生产力层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级本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次)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亦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同市场“联姻”,亦即向资本主义借鉴其擅长的市场机制及其运作规范和操作技术,正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本质特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同计划“联姻”,亦即把社会主义擅长的计划机制移植到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某些部门所有制的“国有化”、“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分配制度的“合理化”、“收入社会化”,其目的在于使资本主义苟延残喘,企图用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不可能最终放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因此,这两大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相容和趋同的。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或严格意义上讲,激进政治经济学是在某种程度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具有一定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思潮。这一学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批判具有浓厚辩护色彩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宣扬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又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还未割断与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思想体系相联系的脐带。这一学派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其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因而

也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学派。激进派的左翼(狭义政治经济学派)有可能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羁绊,转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其右翼(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则左右摇摆,也有可能完全滑向正统经济学营垒。

人名对照表

(本表人名按在书中出现先后排列)

- 艾琳·阿佩尔鲍姆 Eileen Applebaum
布鲁斯·麦克法莱恩 Bruce McFarlane
霍吉斯金 Thomas Hodgskin
汤普森 William Thompson
西斯蒙第 J. C. Sismondi
凡勃伦 T. Bunde Veblen
李嘉图 David Ricardo
马尔萨斯 T. R. Malthus
萨伊 J. B. Say
霍华德·谢尔曼 Howard J. Sherman
皮罗·斯拉法 P. Sraffa
琼·罗宾逊 J. Robinson
马尔科姆·索耶 Malcolm C. Sawyer
卡尔多 N. Kaldor
帕西内蒂 L. Pasineit
巴兰 Paul Baran
斯威齐 Paul Sweezy
马格多夫 Harry Magdoff
多布 Maurice Dobb
米克 Ronald Lindley Meek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 Martin Bronfenbrenner

- 鲍尔斯 Samuel Bowles
爱德华兹 Richard Edwards
雷蒙德·富兰克林 Raymond S. Franklin
威廉·泰伯 William K. Tabb
马克·林德 Mark Linder
布鲁斯·罗伯茨 Bruce Roberts
苏珊·法勒尔 Susan Feiner
赫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entis
林德贝克 Assar Lindbeck
曼德尔 Ernest Mandel
亚历克·诺夫 Alec Nove
约翰·罗默 John Roemer
马尔科斯 Herbert Marcuse
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阿瑟·麦克尤恩 Arthur MacEwan
托马斯·韦斯科夫 Thomas Weisskopf
斯蒂芬·马格林 Stephen Marglin
迈克尔·赫德林 Michael Hudson
斯蒂芬·海梅尔 Stephen Hymer
爱德华·内尔 Edward Nell
托马斯·维托里斯 Thomas Vietorisz
詹姆斯·韦弗 James Weaver
迈克尔·兹韦格 Michael Zweig
道格拉斯·多德 Douglas Dowd
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 罗伯特·菲奇 Robert Fitch
玛利·奥本海默 Mary Oppenheimer
罗伯特·博耶 Robert Boyer
威廉·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斯蒂芬·海默 Stephen Hymer
弗兰克·罗斯福 Frank Roosevelt
斯蒂芬·雷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
伊莱恩·麦克雷特 Elaine Mccrate
拉弗德·博迪 Raford Boddy
詹姆斯·克罗蒂 James Crotty
卡门·黛安娜·迪尔 Carmen Diana Deere
戴维·戈登 David Gordon
迈克尔·赖克 Michael Reick
安沃·谢克 Anwar Shaikh
迈克尔·斯通 Michael Stone
肯尼思·福克斯 Kenneth Fox
詹姆·赛佛 Jame Cypher
汉克·弗鲁恩特 Hank Frundt
丹尼尔·富斯菲尔德 Daniel Fusfeld
霍华德·瓦赫特尔 Howard M. Wachtel
哈维·萨戈尔 Harvey Salgo
曼纽尔·卡斯泰尔斯 Manuel Castells
保罗·马蒂克 Paul Mattick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利奥·休伯曼 Leo Huberman

- 保罗·阿特韦尔 Paul A. Attewell
米恩斯 G. C. Means
艾尔斯 C. E. Ayres
克拉克 J. M. Clark
加尔布雷思 J. K. Galbraith
鲍尔丁 K. E. Boulding
海尔布罗纳 R. L. Heilbroner
沃德 B. Ward
格鲁奇 A. G. Gruchy
缪尔达尔 G. Myrdal
查尔斯·威尔伯 Charles K. Wilber
肯尼思·詹姆森 Kemeth P. Jameson
科斯 Coase
诺斯 North
巴巴拉·布雷德拜伊 Barbara Bradby
本·法因 Ben Fine
劳伦斯·哈里斯 Lawrence Harris
约翰·哈里森 John Harrison
约翰·霍洛韦 John Holloway
休·希梅尔韦特 Sue Himmelweit
索尔·皮奇奥托 Sol Picciotto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卢卡奇 George Lukacs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罗宾·布莱克本 Robin Blackburn
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Thompson

-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赖特 Erik Olin Wright
伊恩·斯蒂德曼 Ian Steedman
杰弗·霍奇森 Geoff Hodgson
普瑞迪普·班德约帕德海亚 Pradeep Bandyopadhyay
伊藤诚 Makoto Itoh
米歇尔·德弗鲁依 Michel De Vroey
科恩 G·A·Cohen
苏珊·希梅尔魏特 Himmelweit
西蒙·莫恩 Simon Mohu
安瓦·赛克 Anwar Shaikh
菲立浦·艾里斯蒂斯 Philip Arestis
杰弗里·皮林 Geoffrey Pilling
鲍勃·罗松 Bob Rowthorn
梅赫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朱南卡 P. N. Junankar
格林 A. Glyn
萨特克利菲 B. Sutcliffe
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拉尔夫·米利班德 Ralph Miliband
金 J. E. King
帕西内蒂 Luigi Pasinetti
米塞斯 L. Mises
哈耶克 F. Hayek
罗宾斯 L. Robbins
施莱费尔 Andrei Shleifer

- 伯格森 A. Bergson
兰格 O. Lange
阿瑟·奥肯 A. Okun
巴德汉 Pranab Bardhan
贝特兰 C. Bettelheim
林德布洛姆 C. Lindbolm
勒纳 A. Lerner
埃斯特林 S. Estrin
米勒 D. Miller
普兰特 R. Plant
霍尔瓦特 H. Horvat
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沃德 B. Ward
格雷戈里 P. Gregory
斯图尔特 R. Stuart
德宾 E. Durbin
盖茨克尔 Gaitskell
配克 S. J. Pack
河上肇 H. Kawakami
都留重人 Shigeto Tsuru
宇野弘藏 Kōzō Uno
森岛道夫 Michio Morishim
置盐信雄 Nobuo Okishio
巴里巴尔 Etienne Balibar
保罗·博卡拉 Paul Boccara
皮埃·雅莱 Pierre Jalée

- 加里·贝克尔 Gray Becker
莱斯特·瑟罗 Lester Thurow
赖特·巴基 E. Wright Bakke
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约翰·邓洛普 John Dunlop
迈克尔·皮奥里 Michael Piore
彼得·多林格 Peter Doeringer
巴里·布卢斯通 Barry Bluestone
霍华德·瓦赫特尔 Haward Wachtel
兰德尔·霍德森 Randall Hodson
巴巴拉·德卡德 Barbara S. Deckard
伯特尔·奥尔曼 Bartell Ollman
马修·伊德尔 Mathew Edel

主要参考书目

- 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麦克法莱恩：《激进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 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 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 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
- 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激进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斯蒂德曼、斯威齐等著：《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林德贝克：《新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 Rruce Roberts, Susan Feiner：《激进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1992.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3 volumes],1989.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U. S. Capitalism in Crisis”,
1978.
- J. E. KING:《马克思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3
volumes],1990.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H. Magdoff. Sweezy:《日益加深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The
Deepening Crisis of U. S. Capitalism”,1981. Monthly Re-
view Press.
- B. Mcfarlane :《激进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1982,
Billing and Sons Limited.
- Paul A. Attewell :《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1984. M. E. Sharpe,
Inc.
- Paul Sweezy:《资本主义发展理论》,“Theory of Capitalist of
Development”,1964,Monthly Review Press.
- D. M. Gordon :《贫困和就业不足理论》,“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1972. D. C. Heath and Company.
- Perry Anderson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Co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1976. Humanities Press.
- Malcolm C. Sawyer :《米哈尔·卡莱茨基的经济学》,“The Eco-
nomics of Michal Kalecki”,1985.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Rober A. Corman :《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涵义》,

“New — Marxism: The Meanings of Modern Radicalism”
1982. Greenwood Press.

John P. Diggins :《20 世纪的美利坚左派》,“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1973.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Malcolm C. Sawyer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 1989, Harvester Wheatsheaf.

Stephen Resnick, Richard Wolff :《马克思主义的再思索》,“Rethinking Marxism”, 1985, Autonomedia, Inc.

Peter Clecak :《激进的反论:美利坚左派的困境,1945—1970》,“Radical Paradoxes: Dilemmas of the American Left, 1945—1970”, 1973, Harper & Row, Publishers.

Sidney Weintraub :《现代经济思想》,“Modern Economic Thought”, 197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Capital and Class”(杂志)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杂志)

“Monthly Review”(杂志)

后 记

我在 1991 年,利用中美经济学教育和交流委员会(CEERC)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资助,赴美国进行考察、研究和学术交流,收集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美国激进政治学联盟(URPE)当年活动最为频繁的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这方面的馆藏材料较多。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第一届大会论文集等珍贵文献资料,正是在密执安大学亚洲图书馆寻到的。密执安大学还为此慷慨提供了专项资助。

尤应提及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和领袖人物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热情为笔者提供了有关资料和研究思路。密执安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顾应昌(Anthony Y. C. Koo)先生以及笔者所在密执安州立大学经济系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还参考或吸收了学术界同行的某些见解,谨致谢意。本书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颜鹏飞

1995 年 8 月

武昌珞珈山